



# 唯物史觀中國史



費明君譯

上海  
群聯書局  
發行

# 唯物史觀 中國史

費明君譯

這是蘇聯大百科全書第三十二卷「中國」部門中關於「歷史」的全譯。

運用唯物史觀的觀點，將中國悠長而浩繁的四千年歷史，把握住每一時期社會發展的根本法則，組織了豐富的資料，具體而扼要地敘述，精微渾厚，正確清晰，這是本書超越了一般史書的獨到的特色。因此，從處理的手法上說，本書值得史家們的參考。從適度的份量上說，本書是中等以上學校的理想教本。又因為譯筆淺達，而文內典故史實，均由譯者附加註釋，所以本書也是青年們自學必備的主要讀物之一。

007052

---

蘇聯大百科全書版

---

唯物史觀

中 國 史

費明君譯

---

永祥印書館印行

目  
次

一 古代 : : : : : : : : : : : : : : : : : : 三二四

周的時代 : : : : : : : : : : : : : : : : : : 六

中國早期專制政治・秦始皇帝的帝國 : : : : : : : : : : : : : : : : : : 三

西漢時代・王莽 : : : : : : : : : : : : : : : : : : 一六

東漢時代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

三國時代 : : : : : : : : : : : : : : : : : : 三三

二 中世 : : : : : : : : : : : : : : : : : : 二七五

唐時代 : : : : : : : : : : : : : : : : : : 三

宋時代 : : : : : : : : : : : : : : : : : : 四

金帝國 : : : : : : : : : : : : : : : : : : 三

蒙古人的征服中國 : : : : : : : : : : : : : : : : : : 四

明時代 : : : : : : : : : : : : : : : : : : 三

十七世紀三〇—四〇年代的農民戰爭 : : : : : : : : : : : : : : : : : : 六

滿洲王朝時期	:	:	:	:	:	:	:	:	:	:	:	:	:	:	:	:	:	:	:	10
清朝時代中國帝國的民族問題	:	:	:	:	:	:	:	:	:	:	:	:	:	:	:	:	:	:	:	14
近代	:	:	:	:	:	:	:	:	:	:	:	:	:	:	:	:	:	:	:	100
鴉片戰爭及十九世紀中葉的農民戰爭	:	:	:	:	:	:	:	:	:	:	:	:	:	:	:	:	:	:	:	17
第一次鴉片戰爭	:	:	:	:	:	:	:	:	:	:	:	:	:	:	:	:	:	:	:	18
太平天國運動	:	:	:	:	:	:	:	:	:	:	:	:	:	:	:	:	:	:	:	20
七〇—九〇年代的中國	:	:	:	:	:	:	:	:	:	:	:	:	:	:	:	:	:	:	:	25
帝國主義在中國支配的動態・一八九五——一九〇〇年的政治危機	:	:	:	:	:	:	:	:	:	:	:	:	:	:	:	:	:	:	:	29
四 一九一〇—二四年間的中國	:	:	:	:	:	:	:	:	:	:	:	:	:	:	:	:	:	:	:	101—111
五 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	:	:	:	:	:	:	:	:	:	:	:	:	:	:	:	:	:	:	:	114—119
六 一九二八—三五年的中國	:	:	:	:	:	:	:	:	:	:	:	:	:	:	:	:	:	:	:	121—126
南京政府的樹立與一九三一年滿洲事變以前的該政府底國內政策	:	:	:	:	:	:	:	:	:	:	:	:	:	:	:	:	:	:	:	127
南京與廣東的鬥爭	:	:	:	:	:	:	:	:	:	:	:	:	:	:	:	:	:	:	:	128

新的革命底發揚 : : : : : : : : : : : : : : : 一七

一九三一年九月滿洲事變以前的國民政府對外政策 : : : : : : : : : : : : : : 一六

譯 後 記 : : : : : : : : : : : : : : : 一六

## 圖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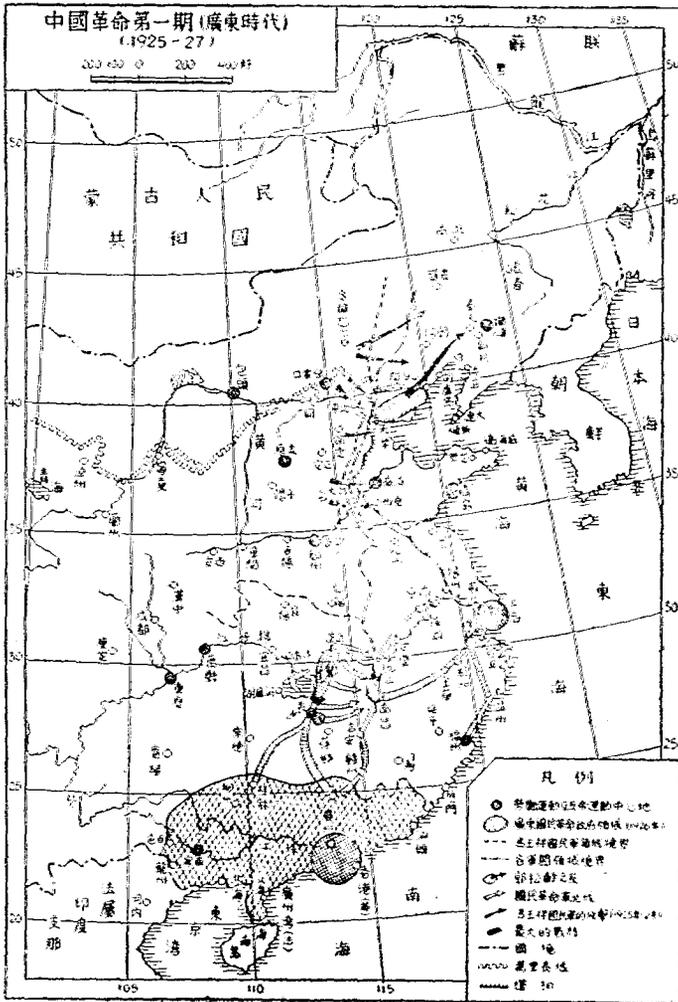
1. 中國革命的第一期 (廣東時代——一九二五——二七年)

2. 中國革命的第二期 (武漢時代——一九二五——二七年)

3. 中華蘇維埃各區域 (一九三五年夏)

中國革命第一期(廣東時代)  
(1925-27)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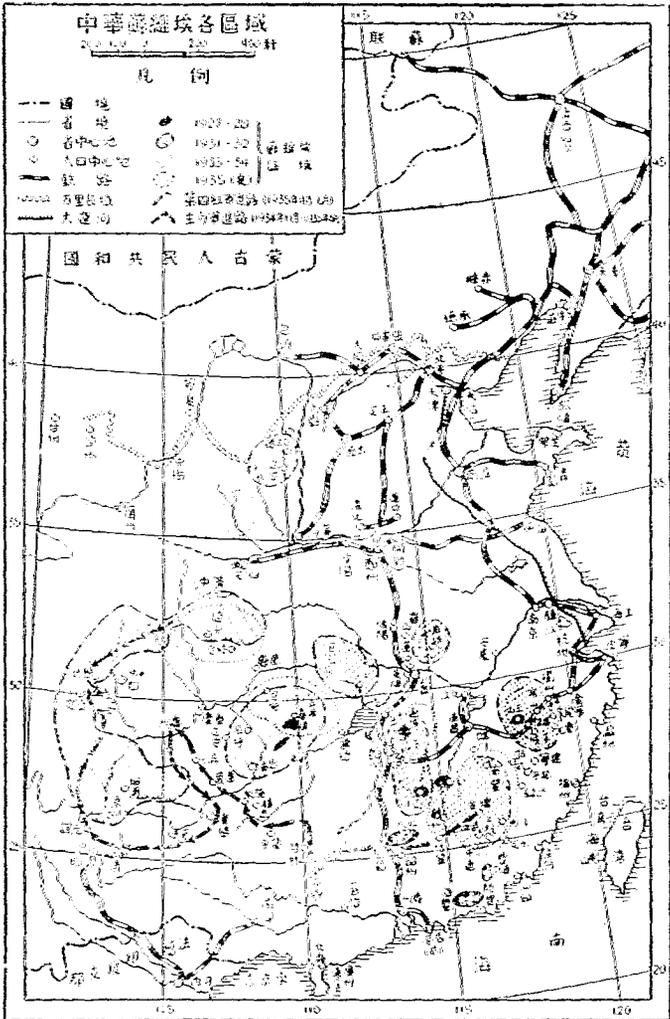
# 中華蘇維埃各區域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2200 2400 2600 2800 3000 3200 3400 3600 3800 4000 4200 4400 4600 4800 5000 5200 5400 5600 5800 6000 6200 6400 6600 6800 7000 7200 7400 7600 7800 8000 8200 8400 8600 8800 9000 9200 9400 9600 9800 10000

## 凡例

- |    |       |   |         |         |
|----|-------|---|---------|---------|
| —— | 國境    | ● | 1927-28 | 蘇維埃     |
| —— | 省地    | ○ | 1929-32 | 蘇維埃     |
| ○  | 省中心地  | ○ | 1933-34 | 蘇維埃     |
| ○  | 人口中心地 | ○ | 1935-36 | 蘇維埃     |
| —— | 鐵路    | ○ | 第四蘇維埃   | 1937-38 |
| —— | 五里長城  | ○ | 第五蘇維埃   | 1939-40 |
| —— | 大邊河   | ○ | 第六蘇維埃   | 1941-42 |

國和共人古家



唯物史觀中國史





# 一 古代

開始依據考古學而得明瞭中國最古代各階段的，還祇在最近的幾十年。一九二八—三二年在北平近郊的周口店，發見了到現在為止大家所知道的屬於人類中最古的人骨（大部份是頭蓋骨）。這種人骨，雖然把它喊作「Sinanthropus」（又叫「北京人」），可是那近乎爪哇猿人——所謂是「Pithecanthropus」的Sinanthropus已經懂得使用火和一見便知道是極其原始的道具。

一九二三年，由於坦拉爾·得·沙爾丁（Teilhard de Chardin）和利孫（E. Licent）發掘鄂爾多斯（內蒙古）和陝西省北部，中國才開始發見到舊石器文化的遺物。那所發見的石英的道具，略略相當於歐洲舊石器時代的中期。看來，在中國燧石不足的這個時代，好像是與歐洲石器時代有了區別。到今日為止，無論是前期舊石器或是中期新石器，差不多還沒有出土。那起因不僅是到如今為止所企圖的發掘尙未充分，也可使人考慮到在舊石器時代的地理上以及氣候上的各種變化，一時期中對居住於現在的華北和西北部中國地域的人類，形成了不適當的各種條件。一九二一—二四年，由着安德孫（J. G. Anders-



son) 等人在河南·甘肅與南滿洲的發掘，發見了屬於最後期新石器時代的各階段以及金石器併用時代（從石器過渡到青銅器）底各種遺物。黃土層的形成便屬於這個時期，於是，因着氣候變成顯著溫暖的結果，對於居住在華北的人類形成文化向上的各種美好條件，而從蒙昧的階段進展到野蠻的下期，所謂「仰韶文化」——依照安德孫在河南省灑池縣發掘的地點，往往是這樣稱謂的——便是呼應着這個。仰韶人與牧畜和狩獵相並，同時也經營原始式的農耕。隨同這次發掘，發見到在石器和青銅器上使用陶工轆轤製作而以金屬染料着色的，極為進步的製陶技術。如果從年代上來着，那麼，仰韶文化（依據安德孫所說，是在紀元前三五〇〇年—一七〇〇年）是和巴比倫·中央亞細亞（安挪，Anan）及歐洲（特里波利，Trigolie）底類似文化的一聯土器的存在，大略是一致的。製陶技術的類似，雖能使人考慮到仰韶文化並沒有從這些土器隔離，但所謂仰韶文化起源於西方的理論，（安德孫及其他）卻還沒有打定基礎。

中國底傳統的文獻，史籍上直追溯到西紀前二三五七年為止。（兩種現存的史籍之中，一種追溯到前二一四五年為止。）如果依照中國的傳說，在那神話式的堯禹舜之後，繼續了夏（西紀前一九八九—一五五七年；或二〇五—一七六六年）的王朝，而到殷朝。（或商）（前一五五七—一〇五〇年；或一七六六—一一二二年）屬於殷的時期以前的各種材料，現在所有的

意義，祇不過是神話的材料而已。那些，在一般上，和大部分的中國資料相同，因了傾向的儒教式的修飾而被歪曲了。假如提到某種程度上可以信任的史籍，那麼，該是在紀元前九—八世紀以下，殷的時期，可以依據考古學的發見——從前世紀末起，在有名的河南省安陽（小屯）所發掘的甲骨文字——而獲得明瞭。由了這些甲骨文字的解讀，以及發掘，（一九二八年以來的。）才被證實關於這一時期的傳說的文獻的知識。不但如此，在這一時期，不在那以後三世紀間，（周的初期）詩經持有了更多而絕大的意義。那意義，正與吠陀<sup>①</sup>對於印度文化史所有的意義是同樣的。

殷文化中心地，是在黃河中流。（現在河南省東北部。）和原始的農耕（黍、大麥、小麥、米）相並，狩獵與牧畜不能不說是佔着優勢而持有重要的意義。生產要具的主要材料是石、木、青銅，於是，道具的製作（車、青銅刀、弩、槍）發達起來。也懂得了窯業、紡紗、織製、青銅器具的製作。在前十二世紀光景，也已經知道了象形文字。殷的社會受到世襲的帝王與限制他權。

① Yeda 或譯「韋陀」「昆陀」。印度婆羅門思想的根本聖典，也是印度最古的宗教文學。狹義的可說分成「梨俱」「娑摩」「夜柔」「阿闍婆」「四吠陀」廣義的可說包括了附屬於各本集的「梵書」「森林書」「奧義書」及「經書」。所謂吠陀意為「知識」，中譯為「智論」「明論」等。相傳係雅利安人所作，其成立年代的最古部分，推定為西紀前一千五百年，一說為前三千年至八百年間。

力的元老會議底支配。既有了僧侶以及官吏層，而在這官吏層中間，也包括了耕作地的管理者以及監督者（田畷）的存在。殷與周圍的各種族毫不間斷的戰爭，到這時期的終末，已變成爲勞働及服役而受利用的奴隸的源泉。一方面是生產力的水準低度的發展，母權及集團婚姻的殘渣，（尤其優勢的，是自兄弟到兄弟的相續制）頻繁的遷都，另一方面是奴隸底勞役的惡化，交換的各要素，在上層部掌握底財富的相當蓄積，後期各帝王之下的氏族底以及軍事底對貴族的頒發土地——這一切，使殷的王朝作爲在崩潰階段的氏族制度的組織，而顯出特徵。

周的時代（紀元前一〇五〇—一〇二二—一〇二五六年）中國歷史其次的時期，是與周族在黃河流域的出現相連繫的。這種族從西方移動過來，大約是在西紀前十二世紀光景，定居於渭水（現在陝西省的黃河支流）。一如可以從詩經中推得的那樣，周族自極遠的古昔便是從事農耕的，在定居到渭水流域以前，種族的經濟已經帶有半定着的性質。移居在土地豐饒的黃土的河谷，使周族更可能從事農耕。最早關於鐵的記載（詩經）是與周族在渭水河谷定居時期相連繫的。殷的歷代帝王不絕和游牧民族衝突，在衝突中將周族當作軍隊而加以利用，這情形強化了周底軍事的家臣、首長、軍隊指揮官的意義。西紀前十二世紀末葉，這個種族和其他隣接各種族結成同盟，推翻了殷朝。依靠征服者獲得土地及被征服

人民，由着周族首領（最初是種族長，後來是國王）將土地頒發給軍事底與氏族底上層及家臣，在共同體內部成長了經濟的不平等，以及佔取共有地等——這一切形成了土地所有。某個青銅器上記着上面那種意味的詞句：

——「賜汝弓一、矢束（一束）、臣五家、田十田。」（成王（周第二代國王）頒發殷族六氏與伯禽<sup>⊙</sup>、殷族七氏與康叔<sup>⊙</sup>。）（左傳）

這樣，從周與那同盟種族的軍事底和氏族底上層，以及殷底貴族的一部，形成了支配階級。

西周社會（西紀前一——八世紀）的性質，是現在論爭中的問題。在最近的中國文獻中，把這社會看作構成奴隸所有者時代的見解，很為普及。特別代表這個見解而加以提倡的，該是現代中國歷史家郭沫若了，郭沫若以及其他中國歷史家底各種勞作，將中國向階級社會移行過程中，周時代底社會的奴隸底巨大勞役，依據具體的歷史底各種資料而加以證實，正如依據詩經以及其他可靠資料而得論定的一般，在這一時代的生產者大眾，是在屬於氏族共同體以及隣接共同體的土地上勞働的。但是，對於這些土地的最高所有權，卻

⊙ 伯禽 周周公子，受封於魯。

⊙ 康叔 周武王同母弟，名封，初封於康，故稱康叔。

是軍事指揮者佔有着的。

這時期所形成的政治底組織，愈加採取了軍事君主政治，而由周的各個帝王以及地方的統治者將那儀式上的各種機能，抓在掌握之中。在西紀前八世紀（春秋初期），政治組織發展到這一時機為止，就以受周王所支配的封建體的統制，獨自的封土底各關係以及臣屬關係作為特徵。這外在地發展起來的封建的組織，卻是被按置在極其原始的基礎（鞏固的土地共同體及氏族共同體，奴隸的巨大的勞役）上面的。甚至黃河流域——在這時期的中國文明的地域，一般上是被限定在這個流域的——持有原始的小地域以及少數人民的諸侯，也當作野蠻種族而被互相隔離開來。七七〇年，周朝從渭水河谷向東方（現在的洛陽）的遷都<sup>①</sup>，便是周朝初期軍事的君主政治的衰微，對周王的反抗，各領主獨立性的成長，游牧民族攻擊的結果。那以後，周為着保持作為獨特的政治底以及宗教底中心的意義，單對諸侯間已被形成的事實上的各種關係，作為名目上的國王給與許可而已。西紀前七世紀以降，有一聯新的諸侯出現，針對集中在黃河中流的大部分舊諸侯，（周·衛·鄭·宋·魯及其他）而在半野蠻的地域上佔定位置。（齊·晉·秦·楚·吳·越·燕）他們成長為大的國家，互相分割了衰弱的舊諸侯底領域。在新諸侯底霸權之下，雖成立了諸侯的聯盟，但那形成，一部分可由着和蠻族的鬭爭而被說明，而且，在中國統一的過程上成爲新的階段。

國內戰爭中的「霸者」們主要是集中注意於現在的河南地方。那因為周朝還依然保持着政治的意義，而且這中心地域的全帶是有軍事上意義的緣故。戰爭的緊張程度和規模，隨着諸侯國的擴大而成長了。諸侯的鬪爭轉化成愈加猛烈的戰爭，以消滅競爭者，佔有領土以及財富，當作他的任務。以笨重武裝，率領乘兵車的農奴以及農民的「騎士」（「士」，「士大夫」）當作基幹的軍隊，到前四—三世紀，早已成爲以輕便武裝而又富於機動力爲主的步兵了，於是，這步兵的得到補充，一部分雖是由封建階級的下層，但那基本的大部分卻由負有義務的農民和都市人民。伴同戰略戰術上的變化的軍隊組織中底這些變化，比任何都來得迅快，在半野蠻的諸侯國底楚及秦——軍事上最強大的兩國——首先加以實施。

西紀前五—三世紀，是中國史上有名的「戰國時代」。三世紀中葉，這鬪爭的結果，中國全土被併合成趙·魏·韓·燕·楚·田齊·秦的七國。這時期雖然有不絕的戰爭，但也毫無疑義地有着高昂的生產力。灌溉作業既有甚大的意義，而又使用家畜從事鋤耕的工作，鐵的使用也普及起來了。這可以看到中國封建主義的形成過程中，表示出新階段的社會的躍進。生產力的發展，及被封建領主所佔有的生產物底分得量的增大，依據着在漸

次崩潰下去的土地共同體的抵抗。六世紀以降，諸侯爲着實施戰爭的手段成爲愈有必要的結果，開始了對於土地的徵收，那和由諸侯頒佈的成文法同樣地，被當時的大部分儒學者認爲是危險的、前代未聞底異端中的異變。這種徵收，在齊達到農民生產額底三分之二。諸侯對於應該怎樣在自己土地上殖民的問題，煩惱着頭腦，在最初之間，首先由了賦與特權，努力從其他侯領中把人民吸引到自己底土地上來。同時，爲了獲得土地的鬪爭，也激烈起來了，那在六—七世紀的史籍中就有着明白的描寫。（左傳）秦（四世紀）以及其他侯國撤廢掉共同體對於土地領有所設的許多限制。在秦侯國中，是以罰則強制着氏族經濟的細分化的。

農業諸關係領域中的躍進，不單是軍事||行政的中心地，也是手工業的及商業的中心地，尤其是與蠻族的交易中心地，被緊密地和都市的成長連結在一起。西紀前三世紀，在齊的首都臨淄一地，依照時人所說，居住着七萬家族。現在山東省的陶都市所記的是：「天下之中（心地），四通諸侯，爲貨物交易之處。」（司馬遷——史記）都市的成長與商人的輩出，在形成中國封建主義的這個初期階段中，已經發生了，而商人的利害，也和諸侯以及諸侯國官僚底利害，緊密地交錯起來。「豪強、富豪」對人民舉行貸款，助長他們滿足政權的要求。所謂與蠻族的交易，在這時期的商業發展中含有甚大的意義，也助長了商人與封建

諸侯的緊密的關聯，商業與手工工業的發達也和諸侯的強大化同樣地依，據着共同體的基本抗，喚起了共有地（鹽田、漁場、森林）的佔取與農民的誅求。然而，這些農民並不單是穀物的生產者，而且更是些絲、紡織品等等的生產者。債奴化、與各蠻族的戰爭以及遠征，補充了奴隸，而這些奴隸不僅是家內的奴隸，也被使役在手工業上，還有一部分是在農業上。經過西紀前六—三世紀，在華北界限內的各蠻族的服屬乃至同化，基本上已經完成了。七—五世紀的內戰中，這些蠻族從事着積極的任務，而相爭的諸侯則苦心於保持他們的支援。由了那外圍半野蠻的諸侯國，（推定的是楚——秦族、吳及越——安南族、燕——通古斯、蒙古族、Tungus Mongolian、秦——西部地方的各種族。中國文明的領域被擴大了。

西紀前五世紀，已經動搖了早期家長制底封建制度。舊氏族底貴族及「士」的廣汎階層，由着高利貸、商人及新官僚之中發生的財富及權力的新的代表者，而受到壓迫。在這時期的末期，一部分高貴身份的代表者，已經淪落了。另一方面，從紀元前五—三世紀起，已經在某侯國中被形成的、東方專制政治底典型的官僚組織，猶如土地及貨幣底財富的新的代表者加入高貴身份的一種形態。專制政治的形成，伴同了上部各階級間的激烈的鬭爭，和階級底各種矛盾的極度強化。當時的一個政略家便會那樣地說過：「與賊徒（暴徒）作戰，乃國主之要務。」那軍隊的編制愈加喪失掉身份制的「騎士的」性質，階級的各种



矛盾也對它侵蝕，戰鬪員大衆在強制的極嚴重的軍紀之下被驅使赴戰。作爲當時社會底各種關係不安定的一個例證，是齊的一位武將，過去本是奴隸；還有，這國家是掌握在最大高利貸田氏底手中的，而他過去也是一個奴隸。當時全中國有名的，在齊之首都的大學校的勤勉的聽講者之中，或者是孔子自身的弟子之間，也被人指摘出「盜賊」。家長制度的崩潰，主要是——可是並不專門——從士大夫之中產生獨得的「知識階級」底多數的階層，在這時期，早期封建主義底官僚的進化的結果，已經不是軍務的，而是「學問」愈加和支配底身份的代表者（士、士大夫）連結起來了。面臨複雜的各種任務之前的諸侯，努力把各個「學者」吸收到手邊來。於是，從他們之間，因這時期的躍進而產生的大部分擔任政治的以及意識形態的各種潮流的人物出現了。這時代，在古代中國的精神文化史中，是被認爲古典的時代的。法家的管子·商鞅·韓非子·李斯等是轉向官僚的專制政治的代表者，孔子在這時期根本代表了保守的見解。

中國早期專制政治（西紀前二二一—二〇六年）·秦始皇帝的帝國（西紀前二二一—二〇六年） 活躍於「戰國時代」的秦國，在西紀前八世紀光景，不過是中國西邊（現在的陝西省）的一個小郡。秦諸侯長時間的努力，集中在所謂脫出北方的晉與西南的楚底包圍的威脅。和各蠻族的同盟及婚姻關係，利用各蠻族間的鬪爭，和對各蠻族的戰爭，以及他

們的漸次同化，擴大了在西方的秦的領土。到西紀前六二三年，秦侯便以「西戎王」而出現了，西紀前四四四年，對各蠻族勝利的結果，秦開通了去獲得現在的甘肅省及陝西省北部的道路。差不多是到三世紀爲止，秦離開爲獲得當時中國中央部及東部支配權的鬭爭，而且還利用這個鬭爭，在紀元四世紀得佔領漢水流域及四川省各個地方。（蜀·巴）秦居肥沃之地，且富家畜，而亦不乏鐵、鹽，秦「於天下……人衆雖僅三分之一，但其富居十分之六。」（史記）

秦最早的宰相商鞅（前三五二—三三八年）的改革，是廢除與土地共同體相連結的各種限制，由了打破氏族底貴族的獨立性，掃清趨向土地所有的新形態的道路，而從隣接的侯國中將淪落的農民，吸引到廣大的秦底領土上來。秦底基本的人口，構成了那軍隊底主要部隊。秦漸次地轉化成強固的封建底官僚底專制政治。肥沃的四川平原的灌溉，以及渭水對秦保障了大軍的補給源泉。將分散的諸侯領地實現統一的，該是秦侯政了。西紀前二二一年，政號稱秦的始皇帝，由於秦的始皇帝，君主早已不單是封建體制底最高代表了。他是權力底唯一的掌握者，至於那獨特性和威力，就是在新稱號（皇帝）上，他底權力的新的發現形態（詔）上，而且還有，于他爲自己所規定的獨特的自己底代名詞（朕）上，也都表現了出來。皇帝「始統一太平，破壞城廓，決通河川，防夷去險。」（秦始皇本紀）

始皇帝區劃國土三十六郡，依靠官僚的襄助而加以統治，試行強化帝國的統一，強制地使大諸侯、大高利貸、大商人從他們氏族底巢窟中，移居到首都以及其他各地。他也主要爲了鞏固邊境地方，而又強制地將庶民大衆移居過去。當時，黃河和淮河已經連接，而且還存在着同樣和揚子江連接的運河。那始皇帝更開拓首都與各地方以及國境相連的記念碑的道路。既試行制定單一的度量衡，也實施簡單化的文字。這個帝國包括了現在的福建、廣東、東京以及安南的各地域。匈奴被驅逐了，國境也以萬里的長城（那一部分是以前就存在的）鞏固起來。從齊及燕派遣出探尋「秘島」的船隻。

始皇帝的帝制，從早期封建主義向官僚專制政治的發展，那動因是極明白的。統一助長了商業的發展。始皇帝使大商人接近自己，而把稱號給與他們。

但是，秦帝國的統一，並沒有鞏固的基礎。中國各地方界限內的經濟底關聯的某種發展階段，在趨向帝國的統一早期中國上，雖是必要的前提條件，可是這個試驗中最爲緊張的，卻不是商品與貨幣各關係底力的反映，而是在于自然經濟底（根本上的）社會組織各條件上。這些各種關係底極度幼弱的出現。這統一，是以封建底生產樣式的發展，以及奴隸底各關係相當普及作爲基礎，而被進行的。這統一比任何都來得重要的，是克服農民依據氏族共同體底關聯的抵抗，約制了封建諸侯及奴隸所有者對在氏族組織的階段上的

地域，想要擴大自己底支配權的慾望。

始皇帝的帝制，並不是後期封建主義底絕對的君主政治，而是早期的東方底專制政治。封建各階級的相當廣汎的部類對始皇帝的帝制，採取了反對的立場。學者們「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最初的宰相李斯說，於是，對取反對態度的學者處刑，焚毀他們的著書。皇帝底長子（扶蘇）因為同情這些學者，也被貶謫到國境的軍隊裏去。始皇帝企圖的工作，以及為戰爭所必要的國力底強度的緊張，在民衆上面變成了沉重負擔。勞役（構築萬里長城・開鑿運河・敷設道路）達到了可驚的程度。國內被游民——敗軍的殘黨、淪落的農民——所充滿了。對皇帝甚至試行過幾次的暗殺。始皇帝於紀元前二一〇年，在東巡途中的沙邱（現在的河北省）逝世，次子就了帝位。二世皇帝執政的第一年度，該帝國已為一貧窮農民陳勝作為首領的叛徒所擾亂。始皇帝逝世一年之後，他已和其他農民一起被送到北部邊境，但從楚（他底鄉國）的途上，現在的安徽起兵，自稱是由始皇帝底後嗣所援助的人。

「陳勝遣諸將徇地。山東郡縣少年之苦於秦吏者，皆殺其守尉、令丞以反，策應陳勝。」  
（司馬遷）

舉兵者——舊貴族的殘滓也跟着他們舉兵了——都在舊的名稱之下復活了侯國。

在現在江西省北部地域，小官吏而與農民相近的劉邦舉兵了。陳勝底前衛部隊接近了首都（咸陽——現在的西安附近，漢時代的長安）；然而在那以後，陳勝的軍隊屢次敗戰，陳勝也終於被殺。成爲舉兵的主要勢力的固是農民，可是儒家們所說的古代承傳下來的家長制度封建制度的組織，不單在於封建諸侯，就是在由於氏族共同體底剝帶的殘滓而被堅固地連結起來的農民，也是除去帝制以外唯一可能想到的形態。那以後，行動的指導權便愈加歸入到封建底諸要素的掌握之中了。西紀前二〇六年，楚底一個武將之子名項羽破秦軍，折服諸將。劉邦與項羽經過數年間攻爭的結果，劉邦樹立了新的王朝——漢。

西漢（前漢）時代（西紀前二〇二—後九年）·王莽（九—三三年）新政權和秦相異，限制干涉社會生活，最初的各個皇帝頒布了應將收穫田租減低至 $\frac{1}{15}$ 或是 $\frac{1}{30}$ 的詔書。然而，除去所謂各項義務以及兵役並不像始皇帝時代那樣大的一點以外，和從來同等的命運等候着農民。「漢氏輕減田租成 $\frac{1}{30}$ 之一，且屢屢免租。」然豪民侵陵，分田劫假（貸貸），其名雖 $\frac{1}{30}$ 之一，實則 $\frac{1}{2}$ 之一。（前漢書：食貨志）

漢治下底基本的人民大衆是農民，而這農民卻要把地租徵付給地主，新王朝的官吏或高官、新王朝的協同者以及獲得復興的舊貴族底子孫。農民付出人頭稅以及其他許多追加的租稅，負責起各項義務。在漢的治下，手工業是不必說了，就是在農業上，也被動用了

奴隸勞働。擁有幾千奴隸的人，也並不怎麼稀有。經過秦以及漢的全時期，與對各蠻族的戰爭，償奴化與「罪人」的奴隸化，成爲大量的奴隸底供給資源。存在了常設的奴隸市場。記述中有爲販賣而使從事生產物底生產的各項經濟之中，使用着幾百名奴隸的情形。西紀前一世紀光景，鑛業上發生過奴隸的暴動，波及到相當廣大的區域。官有奴隸也有多數的存在，並不單是從事於官有穀物的運搬或是家畜的飼養，也製造着農具以及武器。漢朝的詔敕，削低了商人的地位。但是漢興一而海內一統，開關所橋梁，弛山澤之禁。以此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無不相通，得其所欲。」（司馬遷）

製造貨幣是民間的工作。紀元二世紀，是商品貨幣底各關係的暴風的成長時期。在王朝的初期，各地方貴族不單是徵收租稅，也任命官吏。最初的數十年間，在朝廷的內部，劉氏與呂后的一族——依照時人所說：在劉邦的事業上有決定的助力——之間，進行着鬪爭。皇帝死後，呂后排除劉氏，立子攝政，後來卻又庇護自己的擁護者，統治帝國。呂后死後，因着與殘存的劉氏一族相結合的廷臣以及劉邦的戰友們，呂氏被驅除了。這鬪爭促進了朝廷的強化。然而，經濟的發展，富裕而且強化了地方諸侯以及一般的「豪強」。一五四年，以吳侯爲盟主的七侯起兵了。吳開發豐富的地方鑛山，製造鑄貨。這次舉兵，是僅祇約定漢的諸侯返還十倍的金額，便已能獲得黃金的重要的舉兵。但總之，這次叛亂，被鎮壓下

去了。殘餘的諸侯，僅留下他那稱號和以後帝國官吏爲他們徵收的收入而已。諸侯受命將自己的領地不僅對於長子，亦得頒與所有的全部子孫。

面臨帝國的其他任務，是對締結成鞏固的種族同盟的匈奴的鬭爭。漢朝初期，他們越過萬里長城侵入進來。初期皇帝的一個，成爲他們的俘虜。

武帝（前一二一—後八七年）時代，中國帝國及其內在的各種矛盾的成長，化成暴風的外征而出現，那結果，在南方再行擴大帝國的國境，佔領東京·安南。在東北方，一直擴展到南滿洲以及朝鮮。中央部爲止，在西方把匈奴從鄂爾多斯以及陝西驅逐出去。中國的冒險家、有能的外交家、軍隊的指揮者的張騫、乘喀什、噶爾和準噶爾部的小侯國要在中國及中央亞細亞之間設定通商道路的機會，就把這些地方統一在帝國的支配之下。一〇一年，中國的軍力向大宛侵入，於是在大夏·康居·安息之間發生關係。中國帝國由於各蠻帝國底建設者，得能到達印度·近東·歐洲地方，走向通過亞細亞的大歷史底道路的交錯點。也發見了從中國到羅馬的絲的大道。在葉爾羌河谷的帕米爾斜面塔什干地方，中國·小亞細亞·印度以及黑海的隊商相會了。

爲了實施戰爭所必要的貨幣，最近的原因不單使朝廷成爲權力的獨佔者，也爲着要成一切富源的獨佔者，而作新的緊張的試驗。但是，作爲這個試驗底基礎的，是更爲深刻的

原因。由社會底各矛盾的成長——在一極上急速地進行的農民的淪落，在另一極上土地以及財富的集積——所引起的深刻的危機，哺育了封建的無政府性與不絕的民衆行動。

武帝時期，依着當時有名的政治家（桑弘羊——「洛陽鹽商之子」；孔僅——鐵器的大製造者——等等）之手，雖經企圖過完全的政策體系，可是成爲這政策的，是對鹽、鐵、酒、通貨的發行，規定獨佔，試行由官僚的國家之手組織交易，依着其他的許多政策壓制「豪強」而確立帝權。武帝的法律，屬於治安維持法的一千八百八十二條，特殊罪名達一萬三千四百七十二條，課處死刑。——與法家諸家相同，武帝和他的各個宰相，也都想以官僚的專制政治，成爲國內的經濟底、政治底生活的調整者，依據「保護弱者貧者，制御富者強者」的必要，辯護自己的政策。地主以及商人在儒教的旗幟之下，反對站在帝制背後的寡頭制，要求土地所有及奴隸的限制，（這時期中儒教最有名的代表者是董仲舒）但是，作爲意識形態底武器的儒教底意義，在秦滅亡之後，已被一般所認識。武帝將儒教作爲國教。伴同對「豪強」處罰及沒收的武帝的政策，從這一方面雖然減少了威脅帝室的危險，但並沒有排除掉深刻的國內的農業危機。在紀元後的初期，那喚起了王莽所企圖的由改革而脫出危機的新的試驗。

王莽（依婦系）是武帝的一族，也是宰相，但是個在紀元九年自行掌握了政權的人。他

頒發詔敕說：「秦無道……壞聖制，廢井田。以此兼併起而貧鄙生……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地……今者將天下之田更名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滿八人而田過一井（一〇〇畝）者，應分餘田與九族及鄉里鄉黨。」（前漢書——前漢正史）那以後發出關於獨佔國營商業的詔敕。王莽自身不能不撤廢賣買土地奴隸的禁令。那因為不單是匈奴連蹶起的西南部各種族也壓迫着帝國的緣故。改革同樣是由地主以及奴隸所有者來「實施」的，因而使民衆的地位愈加低下了。王莽的軍隊到處戰敗。想以專制政治的手段實現理想的周封建制的這個試驗，僅不過使國內情勢險惡化而已。王莽的武將在各處開始自立了。大衆起來，王莽被殺了。這時候，農民各自編成原始的組織——部隊。那便是「銅馬」「鐵脛」「大槍」等等。

那些之中，由農民大衆認爲權威而最顯著的，是起於山東的「赤眉」。

可是，這運動的組織與水準極爲低下。更使它削弱的，是這行動在整個地方的饑饉的情勢之中所進行的。「赤眉」佔領過首都兩次，長時間地保持現在的河南地方，爲着饑饉、上層部的腐敗、謀叛、無組織，成爲軍事上的弱點，終於敗北了。

東漢（後漢）時代（二五——二〇年）  
漢的宗族劉秀（光武帝）經過與農民及自己的競爭者的兩年鬭爭之後，再興了王朝。

對王莽蹶起的劉秀以及他的戰友們，是武帝時代儒教反對派的支柱中，與家長制相連繫的支配階級的中層，以及下層的典型底代表者。劉秀在與農民的鬭爭中，試行緩和暴力，與階級底各種矛盾。他的治世，將土地所有限制於中地主的標準，限制奴隸，以及爲減輕租稅而頒發許多詔敕。確立了東漢時代的地主地位。

在王莽治下的匈奴將中國的支配權在那進出西域的途上加以阻止。被匈奴從現在的甘肅驅逐出去的月氏——好像是大月氏起源的種族——越過戈壁和伊犁而到西方。紀元前一世紀末，月氏佔領過中部亞細亞諸國之一，在媯水①地方的索格提挨那②。（相傳這地方本來是阿歷山大大大王馬其頓底子孫支配的）。

到七三年③，中國好容易重行將哈密佔領。此後在九一年④，班超佔領了葉爾羌及和闐後，接着將中國的支配擴大到喀什噶爾和準噶爾部爲止。被中國人所驅逐的匈奴逃向西北。班超雖曾派遣使者到羅馬去，但那並不會到達比波斯灣更遠的地方。東漢時代的中

① 現在的阿姆河 (Amu-Daria) 譯爲錫河又稱 [Oxus]

② Sogdiana 康居所屬的一個地方。亦有人誤以索格提挨那即爲康居本土。

③ 東漢明帝永平十六年。

④ 東漢和帝永元三年。

國和那經過中央亞細亞的地方，以及是海路從波斯灣到交趾來航的商人通商。一六六年，所記的有作爲大秦王安敦①底使臣的這一類商人，在朝廷中出現的情形。

漢的復興使儒教確立。那與現實幾乎是無關係地把虛飾的家長制以及偽善的獨自的形態，帶進到任何個所。這社會的安定性被破壞了，正在崩潰中的帝國，愈加喪失掉保障支配階級根本利害的能力，同時對於儒教的思想的反動——這時期的那種現象，主要是道教——也成長起來了。第一世紀（二七—九七年）出了著名的思想家而且是唯物論者的王充。他峻烈地批判過儒教或是道教。從第一世紀初期起，佛教已經侵潤進中國社會的上層部，但那侵潤直到一世紀的末葉，由於與通過中央亞細亞的印度的接觸，方始容易化。那是說：第二世紀的後半以來，在中國進行了佛教的佈教。

「豪強」的成長促使帝國的崩壞。然而，這又使軍司令官把持到更大的權力。在朝廷中愈加強大起來的宦官的集團，對「竇氏」（皇后的一族）以及學者反對派的集團進行鬭爭。在一八四年，勃發了「黃巾」的叛亂。

這騷擾表示出農民運動相當高度的階段。那並不是純粹自然成長的，而是那指導者經過數年間準備工作的所產，比較上是有組織的。他們被區分爲三十六方，各自服從自己的指揮者。行動的期日是早已豫定了的。叛徒雖被指導者底一個兄弟所出賣，而有迫於急

遠起事的必要，可是雖是如此，這舉兵還是急速地在現在的山東·河南·河北的大部分中擴大。終於，叛徒這一次便以由農民的階級底見地上成長的自己的意識形態，當然，在可能達到這些社會底各項條件的唯一的宗教底——神祕底形態之下行動起來。這所謂意識形態，是由那運動的組織者的道士張角所倡的「太平道」(最高和平之道)的說法。

這說法帶着終極論的性質。也就是說：那不是現實的碧空，而是對大眾約定期待中的持有「最高和平」的黃色天空的、新的和平的到來。叛徒甚至在首都的每一家牆上都寫上自己的「口號」。朝廷不得不把反對派從充軍地召還，於是，反對派的代表們在各地編成與叛徒鬪爭的部隊。「黃巾」被鎮壓住了，帝國卻在這鬪爭中歸入在最有功績的武將底掌握，那中間最有強大勢力的該是曹操了。曹操之子曹丕在江北地方建立魏朝。那以後，更樹立了其他的獨立國，在揚子江下游地方的是吳國；在現在的四川省、湖南省以及湖北省地方的是蜀。

這時期，是有名的三國時代(二〇一—二八〇年)。揚子江流域的地方——吳和蜀底領土——在這時期中，被引向到比以前更爲廣汎而且強度的中國文明的領域。三國之間

① 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161—180) 大秦即羅馬，但名稱的起源還沒有定說。使節到達中國，

在東漢桓帝延熹九年。

的鬭爭，（這門爭中底主要人物是曹操·劉備以及他底參謀格的諸葛亮·關羽——在中國「英雄」詩以及小說中最爲受人愛戴。）雖終結於魏的勝利，但他那武將（司馬炎）排除曹操的子孫，樹立西晉朝（二六五年），統一了二八〇年以來的國土。然而，在這王朝時代的中國實質上雖是作爲獨立的各領土的總體而出現，但朝廷除去比較狹小而極近邊區的領土以外，要及到事實上的權力卻不可能。

中國早期的專制政治的時期，終了於「黃巾」的謀反與帝國的瓦解。統一前夜，已由各侯國所形成的這個組織的經濟底基礎，是未發展的形態中封建底（農民底）各關係以及雖是較小卻從事過極顯著的任務的奴隸制。支配階級所集中的組織，任務是服役於所謂壓制隸屬化的農民——他們的大衆，雖然在早期土地共同體分化以後，也依然由於氏族共同體底各種關係而堅固地團結起來了——的抵抗。專制政治的其他歷史任務，是擴大封建諸侯以及奴隸所有者的支配，使它達到尚未脫盡氏族階段的領域。從這裏，產生了比這早期專制政治所表現的更多的軍事底性質。在這個社會中，經過官僚的組織，收取在地租||租稅（「祿食」，人頭稅，爲國家的賦役勞動）的形態之下而被實現。與那同時，這個官僚的組織，雖是以成長中的土地私有作爲基礎，但在這土地私有之下，實物地租佃戶制是收取的主要形態，同時，也充當着奴隸勞動。支配階級的廣泛層，同時也是地方底以及氏

族底共同體的家長制底上層部。所謂家長制底氏族共同體底關聯的強韌性，和由那受着約制的官僚底專制政治（地租||租稅）的意義，說明了封建底各項關係的未發展，「未成熟」——然而那個領域由了奴隸制底各項關係而狹小了。

早期各帝國的時期裏，黃河·北河·漢水的平野，以及揚子江流域的一部，成爲中國文明普及的地區，於是大部異種類集團被同化了，漢人到了後來，甚至有了中華民族的稱呼。這暴風的時期可以成爲記念碑的，是那司馬遷底史記。（約紀元前一三六—一八五年許）這種昂揚就是在藝術上也有了表現，「卻想不到在唐的時代，中國也會爆發出這樣熾烈的精力的。」

格 魯 綏



## 二 中 世

第四世紀底最初的四分之一以降，華北愈行歸入在各蠻族的掌握之中。晉底領土，甚至在形式上也僅被限於南部（東晉——三一七—四二〇年）了。在華北的短命的各蠻族底國家都在互相更迭。（前趙·後趙·燕）三八六年，拓跋族的首長樹立了北魏朝，那直繼續到五三四年為止。該王朝統一中國後，把那權力擴大到東土耳其斯坦才止。在南部，一聯的交替着中國王朝。（東晉·宋·齊·梁·陳）從紀元四二〇年到五八九年的期間，是有名的南北朝時代。

中國封建制發展中所表示底新的前進的各種關係的意義，在東漢時代已經被強化起來了。那是依存於地主的農耕者的普及和「部曲」制度的變形。所謂「部曲」，是對武將作人格底依存，或是對所屬作人格底臣下、兵士的制度。

到漢朝末年，尤其是此後經過兩世紀的封建底內亂的情勢，促使「部曲」成爲多數人的階層，同時，武將把這軍隊移動到土地上也爲爲普通的舉止了。作爲農耕者的「部曲」，對於自己底主君雖還照舊保持人格底依存，但並不是作爲一個的人格而對他所屬，而是

「通過土地關係而對他依存」的了。舉兵對正在腐蝕中的官僚底專制政治的組織進行襲擊，也對奴隸底各關係的發展加以打擊。時局的主人公是武將以及「豪強」——依存他們的農民底主人。在不斷的戰亂之下，「豪強」和武將互相爭奪農民和土地，農民自身不得不請求「豪強」以及「大氏」的保護。在另一方面，氏族底貴族在領土內組織成員的軍事保護，自行轉化成封建諸侯。「有勢之氏，大家族，各與其成員確立於城市內」。各氏族計達兩千家族。在封建過程中與以絕大衝擊的，是各蠻族的侵略。

在第二世紀，這些各蠻族已經在中國各地方形成人口不少的部分。中國的地主以及官吏們自行把他們引到自己的土地上，於是由蠻族——奴隸在土地上殖民。三國時代，居住在現在陝西的這些各蠻族的人口，不下於該地方的全人口之半。這種漸次的浸潤，各蠻族在四世紀準備好公然的行動，可是伴同了各種族的移居華北地域以及蠻族各國家的形成。被中國北部所驅逐的「豪強」向南方移動，在那地方「自由劃定郡縣」。土著的非中國人口的大衆，爲着這些新來者，降低到隸屬農民的地位上。土著各民族的一部首長和中國封建諸侯融合起來。在這時期宗教底封建主義開始成長了。在第六世紀，寺院轉化成大土地所有者的結果，對於使自己底牧人隸化的教權制，引起了佛教人民的宗派行動。魏朝各帝在佛教寺院求索作爲自己權力的支柱。魏與西方通商關係呈現活況的結果，佛教的

浸潤就容易起來。著「佛國記」的中國僧人法顯之去印度（三九九—四一五年<sup>○</sup>），是中國人巡歷印度的嚆矢。如果史籍可靠的話，據說魏當時有三萬佛閣，兩百萬僧侶。同時，朝廷把農民引向荒野，向他們課賦租稅以及各種義務。這政策——唐初期各帝王也曾繼續執行——在公認的歷史上是有名的「均田制」。

這時代的變遷，約制了中國莊園在那以後的發展。在一世紀初期的漢的再興，已經對那首腦者們的家長制度煽動相反，使氏族制度縉紳（士·士大夫）與人民之間的對立異常地強化。在這時期中繁榮的公認的學校，就是和儒「學」的各任務也很少共通點，而是作為支配身分的獨自的代表而出現的。三世紀以降，所謂「聖賢」之道的原則，早已成了爲着使身份的以及貴族的差別鞏固起來的手段了。系譜問題中特殊的順位論爭、煩瑣等等，是這個時代的特徵。北魏朝當任命官吏，「僅對氏試驗力與知識」（魏書）而已。

從三一六世紀，中國的經濟雖帶着較多的自然經濟底性質，可是揚子江流域、福建及浙江的發展，於這時期中完成了更進一步的前進。揚子江下流的南部一帶，在商工業方面是最爲發展的地方。五—六世紀，在北部的洛陽也有着相當的商業人口及手工業人口，各職業及各部門，被配置在各區以及每一城市。這時期的前進，是六世紀更行昂揚生產力的前

提條件。

六世紀末，從新的統一劃出漢朝的衰微的時期，是以在意識形態領域中發生很大變化作為特徵的。對於漢底崩壞中的組織的批判，主要是由這教思想所育成的。廣汎的支配階級層，從道教汲取對於個人的利益、自然崇拜、以及逃避到享樂的辯護，另外的一批著述家將道教和儒教相連結，呼號着社會底各關係的家長制度簡單化。在三—四世紀得到大眾的性質，而不時激昂的批判了身份制度儒教體系的文獻，是從遠代的王充發源的。三—四世紀的道教，準備了五—六世紀的佛教影響的勝利。

六世紀末以降，新的政治底經濟底昂揚，是由了中國各州的農業、手工業以及商業的成長，由了揚子江流域底意義的強化，由了中國與中央亞細亞以及近東的貿易上和政治上各關係的成長，而獲得準備。這最後的結果，在紀元六世紀發生了土耳其種族同盟，當唐帝國把那境界向中央亞細亞擴大以前，由着依靠舊生絲商業道路的通商關係受到安全保障，才能容易成功。七世紀以後，阿拉伯的征服，不僅助長增進陸上通商的活氣，而且也助長了從波斯灣到華南各海港的海上通商的發展。

五八九年<sup>①</sup>，由了北朝北周的一員武將楊堅所樹立的隋朝，國土便重又獲得統一。隋朝的短命的存在，帶着異常積極的性質。在隋朝之下，運河系統又被重新建設或是更新，黃

河流域與東北的直隸灣·淮河·揚子江兩河以及西南部的大湖（現在的浙江）都被連接起來了。隋征服了青海及安南後，開始和東土耳其斯坦以及日本發生關係。

隋帝國和秦始皇帝的帝國同樣，自行經過階級底各矛盾的長期的發展階級，同時，和秦始皇帝的帝國同樣地，將統一及外征的「各項費用」底鉅大的追加額，轉嫁在農民身上。和朝鮮戰爭的失敗，成爲喚起農民對帝國底最後的衝擊，而且對於這些農民的不平，諸侯也參加了。六一八年<sup>②</sup>，王朝沒落了。那與紀元前三世紀的舉兵同樣，六一七—六一八年的舉兵，也是封建底各關係的強化時期裏，在這些各關係的新的段階中進行的，那僅不過是清掃了爲諸侯——由新王朝所統一的——長期支配着的地盤而已。

唐時代（六一八—九〇七）唐朝是由半混突厥血統的國境上一員武將所創建的。但是，該帝國底真正創建者卻是他底次子李世民（太宗·六二七—六四九年）。他是中國各帝國史上最傑出的脚色之一，當父親在世之中就即帝位，依靠殲滅自己底兄弟而確定了他那帝位。

唐帝國以土地私有（宗教底以及世俗底）爲基礎，同時，是作爲官僚底封建主義的強固

② 隋文帝開皇九年。

③ 隋恭帝義寧元年。

組織而被形成的。成爲租稅課賦對象的戶數，在太宗時代雖未曾超過三百萬，但到八世紀的中期光景，已達到九百萬，那以後又減低了。雖祇有個別部類（那最大的是寺院）從爲國家的納付租稅及負擔各項義務中解放出來，可是，要說帝國實際上對於地主底土地及農民實現了多少程度的自己底權利，卻得在所與的時機中，由於帝國政權的力量以及權威而被決定的。

帝國努力想增加納貢農民的數量，禁止口分田的賣買。農民以穀物繳納租稅，以家內手工業生產品（絲、紡織品及其他）應付徵實，負擔各種課役（一年中三十至五十日）然而在那王朝的初期，朝廷使官吏負擔土地（依據職位），對皇族、有功的高官、寺院，則賜與土地。宗教的封建主義，不論在怎樣的時期，從來不會像唐時代那樣的佔有過廣大的土地。

六三〇年<sup>①</sup>以降，帝國開始壓迫各蠻族。六六八年<sup>②</sup>朝鮮被征服了，到七〇年代，帝國延伸到日本海以及幾乎是從黃海直到鹹海爲止，在南方征服了東京以及北印度各侯國。唐時代的中國在政治——經濟底及文化底關係上，是作爲最強大的國家而出現的。唐不但是主要而且更行增長意義的當作商業對象的絲織品，就是鐵製品、陶磁器、繪圖、紙也對中亞以及西亞輸出。中國的工匠和建築師，享有一世界的「榮譽」。在印度喪失了地位的佛教，唐的時代在中國的土地上馴熟起來。於是，與這佛教一起，中國的影響，甚至普及到

日本以及印度支那。

唐第二世皇帝時代，爲着自由輸送商品，降命撤去水路關門。唐帝國將自隋朝遺留下來的水路以及陸路，使之開展。在中央行政下的道路網底總程，所推定的大略是一萬三千里。驛傳制度也被改良了。這一切用不到說，首先是由於帝國的必要而喚起的，例如說，從揚子江流域納入的穀物，就不能不輸送到首都（長安・現在的陝西省西安）但是商人，也開始利用了這些便利。

唐時代的中國發展茶的栽培，形成了陶磁器生產以及其他工藝的世界底中心地。鑛業的意義增大了，製鹽業也在新的各地域進出（四川）。這時期的中期起，商業有了極大的發展，貨物交換證、結款單、船貨憑單、匯票也都開始使用。作爲特徵的是：這種形態本來也是由官僚底各組織援助之下發展起來的。商人在首都從政府買得匯票，於是，地方各機關便對這匯票持有人付款。那以後，爲着機構崩壞的結果，以致在機能上未能適當，便作爲民間事業而被運營了。

除去蒙古時期，無論在任何時期，中國的首都以及商業都市，並不會那樣地帶有世界

○ 唐太宗貞觀四年。

○ 唐高宗總章元年。

底性質。在長安的街路及邸宅地，居住着各種各類的民族。近東的商人傳來了摩尼（Mani）教和景（Nestorius）教。

在大都市裏，阿拉伯人擁有自己底穆罕默德教堂，有名的是祭星閣。在中世旅行家說的廣府（？），（唐代主要海港，現在的廣東）。依照阿拉伯人旅行家所說，外國人的人數達十二萬人。外國商人，尤其是阿拉伯人，在朝廷的保護之下，被置在特權的地位上，獲得自治權，常常佔有高貴的公職。帝國在那繁榮時代是強大的官僚底組織，在貴顯或是大帝國官僚前面，普通「學者」的地位很是卑下。唐時代儒教的低下地位，也和這互相反應着的。

這時期裏，科舉的制度雖已發展，但這制度，到以後，——除去蒙古時期之外——便成爲支配底身份的廣汎階層（「學者」）以朝廷爲中心的，利害統一的主要形態（那萌芽是屬於早日漢的時期）了。爲着受這官僚底登龍門的試驗，比任何一切來得迫切要求的，是對於華麗的文學底知識，解釋儒教的古典，以及關於寫作治世問題論文的能力。原則上，試驗雖並不限於特權身分者，而是誰都可以應試的，可是少數的民間出身者，祇要一加入這種官僚的隊列之中，也就立即變成支配階級底武器，或是支柱了。在試驗制度之中，明白地現出那身份底性質，（大學是被限於高級官吏子弟的。）所謂個人底關係或是財富，對於試驗的成績會產生很大的影響。

太宗底嗣子高宗時代，中國人被西藏人和突厥人從青海以及東土耳其斯坦驅逐了出來。被太宗所滅亡的突厥人底鄂爾渾王國復興了。在七〇年代，那大部分被中國併合的朝鮮便把那依存的程度，限制在家臣底關係上。從六八四年到七〇五年之間，高宗底寡婦則天武后佔據了帝位。武后及玄宗（七二一—七五五年）——玄宗即位之前，進行過幾次宮廷內的變革——的時代裏，中國復活了在土耳其斯坦的支配。那雖是國威最被發揚的文化底繁榮時期，但在玄宗治世的終了時，早已開始了帝國政治的衰微。在唐時代，儒教的支配的地位雖被公認，但在這時期，實際上卻是佛教勢力在精神文化的所有領域中制霸的時代。道教也以相當強大的宗教底組織出現，表示出顯著的勢力。唐的若干帝王，甚至想把道教作為國教。中國的詩文（李白·杜甫）與雕刻，在這時期達到最高的發展階段。玄宗一朝，是最大詩人及藝術家的集中。在唐的後半期的若干詩人們，對民衆貫以深刻的同情，關於民衆的狀態，賦與了正確的描寫。

七五五年中安祿山的舉兵，是唐帝國底命運的轉換點。安祿山屬於突厥或是希臘系統，為唐朝的寵臣而執當時有勢力一派的牛耳，擔負着邊境節度使的地位，是個到這時機為止造成自立基地的人。這次的舉兵以及與他的鬭爭，使國土歸於荒廢。朝廷僅召來回紇人、阿拉伯人、及黨項人，想要清除這個叛亂以及由此而起的騷擾，可是他們以掠奪來酬勞

自己。六〇年代，中國的軍隊已在中央亞細亞爲阿拉伯人所敗，而在現在的滿洲國境又爲契丹人所敗。中國的警備兵在西南部，也被南詔所驅逐。回紇·黨項·契丹的叛亂之後，南詔將帝國邊境置在威脅之下。中國本國以外實際上的權力，在西方僅及到敦煌以西，在南方也僅有安南能略事維持。戰爭的結果，武將（方鎮）的權力極度強化起來，而那職位，實質上是成爲世襲的了。被宦官弑逆憲宗皇帝以後，（八二〇年）各帝王祇是他們掌握中的傀儡而已。

農民的行動已隨同安祿山的叛變而發生了。那鎮定後，貢納農民的人數已減少到三分之一。唐時代的後半期，是中國的莊園底土地所有的成長期。這裏，作爲隱蔽同一的各關係的農奴底內容的形態，在第九世紀成爲特徵的高利貸的普及，於下面的實例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諸藩獨立結果致使收入中絕的首都官吏們，對於首都管轄地方的農民，強制地使他們承認虛構的貸款，甚至拒絕農民有清償這種「債務」的權利，而使他們支付利息，也就是每年的沉重的追加稅。雖然這些支付的徵收，是由他們自身或是都市商人之手加以固定的。

唐封建主義原始組織的這種崩壞過程，在楊炎的改革（七八〇年）中也有了反映。這種改革，不但是對於土地的所有者的，就是對於貨幣財產的所有者也試行着普及課賦

的工作。這改革，愈加喪失了各藩所有的國家統治權，而且，因為帝國組織的自然底性質一般地已經崩壞，所以與拒絕國家已經失卻意義的國家底自然底義務要求同時，便不再依據過去古舊的徵稅戶籍冊，而對實質的財產所有者進行課稅。楊炎的改革，是終極地拒絕了對於土地賣買的各项限制。

在隋及唐時代的記錄中，已可見到所謂「行」（協會）的名稱。行包括同類部門的商人或是手工業者，在那上面設長。大都市中可以看到百以上的行。行的長對於政府是以手工業者或是商人的代表者而出現的。行是中國的同業公會以及幫的初期的組織。唐時代存在了公認的經紀人規定。在第九世紀，為商業及手工業的各條件，愈加惡劣化了。諸侯從商人及手工業者強制地「收買」「徵借」，而這些商人及手工業者們，卻以在首都的行動答覆這個。

政府愈加缺乏貨幣，愈加失去收入源泉的結果，往往宣言直接沒收商人及高利貸底一部財產。這情形與封建底無政府的成長，以及對外貿易的衰微同樣，驅使着商人及一般貨幣所有者，趨向同樣的寺院及「豪強」的庇護之下，刺激了土地的獲得。首都的富人們，由於為自己兒子買得在近衛兵——當時那主要機能，事實也幾乎是高利貸業——中的

地位，以避免對於官僚的要求。在另一方面「現今繳納貨幣，或依據勢力者，悉成佛僧……彼等入手資本，經營企業，或依據血緣，形成派閥。」廣泛的「學者」階層對於宦官及武將之權力的不滿，採取武力衝突形態的各派閥的鬭爭，向寺院的財富意欲伸手的宦官的試驗——凡這一類，都是九世紀中葉在上層部的危機情景。六〇—七〇年代間「自然的」大災害以及饑饉，是對於農民最後的刺激。當時的農民狀態，可由大眾的自殺一事上，加以大致的想像的。

九世紀間的農民戰爭，開始於八七四年<sup>⊖</sup>。黃巢是那指導者（販鹽的小商人，後爲近衛兵的弓兵）。黃巢很有教養，也曾試受試驗。遠在舉兵以前，他便是對於帝制的活動的仇敵。

八七四年，現在的山東及河北地方有一個叫王仙芝的，當舉兵的時候，黃巢便率領農民運動底傳統的中心，出身於山東的部隊，加入了。朝廷想要收買指導者們，贈王仙芝以大將軍的職位。史籍的作者說：「王喜而黃巢怒……彼謂君設得官職而降，其將置五千同志於何地——於是彼擊王之頭。王恐民衆激怒，終未受命。」王仙芝死後，他的部隊歸入黃巢之手。他在山東及河南集兵十萬，自號爲「衝天大將軍」。在山東鞏固了地步，完成了準備的黃巢，就於八七九年<sup>⊖</sup>，經江西及福建向南方移動。他迅速地經過廣東及安南後，在八七九年十月，已經回到廣東於長期包圍之下，攻略了成爲朝廷最大收入源泉的這個都市。

阿拉伯人旅行家的報告是：黃巢擊滅外國殖民地廣府而擅行殺戮。

其時傳染病奪去叛軍約半數生命的結果，以致黃巢不得不拋棄在這地方築成舉兵地盤的主張。黃巢回到北方去。八七九年冬季，他已經在揚子江北岸了。在襄陽戰敗的黃巢便又回到揚子江以南。叛軍部內所受莫大的損害，在行軍中容易地獲得了補充，那樣的數目，被註出是十五萬乃至三十萬了。軍紀依然很嚴肅。黃巢橫渡揚子江下游，向洛陽進迫，八八〇年十二月末，終於攻陷這個地方。

八八一年一月六日，佔領向陝西平野去的堅固的要道潼關後，朝廷對他頒贈大將軍的地位。然而，叛軍在一月十日已經迫近首都郊外，於是首都內部發生了騷擾，皇帝好不容易才能逃出這個地方。這天傍晚，叛徒侵入了這個都市。

黃巢的副將對民衆這樣的說：「黃皇帝的主要任務，黃皇帝執武器所要完成的任務，爲欲施行庶民對李朝（唐室）所未曾企及的善政，安心家居，不必恐慌」（「黃王非如家唐者，不惜爾輩各安，勿恐。」）叛徒們「如見窮民則投與金帛……富家皆跣足逸走……所捕官吏均被斬殺……其屠宗室侯王無類。」（新唐書）叛徒稱大齊於首都，建立了王朝。殘生的

○ 唐僖宗乾符元年十二月。

○ 唐僖宗乾符六年。

官吏一任舊狀，三高官被撤廢，叛徒居在政治的最高首腦部。五月，當政府軍迫近首都時，黃巢避到市外。持有敵意的一部居民，從房屋頂上向軍隊投瓦。擊破政府軍後，黃巢回到首都，採取暴力政策，但那以後——依照史籍的作者所說，「權力更形鞏固」——諸軍退保武功了。叛徒在那佔領的各地，掠奪地主以及富人。黃巢佔領首都，達兩年半。在由地方輸送食糧而生活的大都市裏面，這輸送被政府軍截斷的結果，當然發生了饑饉，而這饑饉，好像成爲放棄首都的主要原因之一。朝廷對於叛徒，徵召以沙陀種族的酋長李克用——民間替他題上獨眼虎的綽號——爲指揮者的回紇騎兵。八八三年<sup>①</sup>，黃巢經過絕望的鬪爭以後，向河南退卻，進行了指揮者的更迭。黃巢依照一說，他被背叛的部下所殺，依照另一說，是自殺了。後世的人們以傳說來提到他的名字。在黃巢之姪黃浩指導之下從事活動的叛徒遊擊部隊，直到九〇一年方漸被擊滅。

九世紀農民戰爭中，中國的農民——若是從運動的歷史底各種條件加以考慮——表現出了階級底強韌性與規律的比較高度的階段。這大軍隊極巧妙而且適當地行動，也持有高度的機動力。這大軍隊在極困難的各條件下，在言語風俗全然各異的中國各地方上，是作爲盡量爲自己目的鬪爭的農民軍隊而出現的。

八七四—八八三年的農民戰爭，在封建時代的農民運動史上，顯出輝煌的一頁，而那

指導者，又是這些運動史上最優良的指導者之一。九世紀的農民戰爭，雖然失敗了，但那對於宗教底及世俗底封建主義，給與一個絕大的打擊。奴隸所有——那在唐時代中，雖沒有漢時代中那樣的大，但總之，曾經演出過顯著的勞役——也受到了強烈的打擊。在其次的時期——宋的時期——裏，那個意義總不出家內奴隸的範圍。從漢室引下系統，於是更至八世紀的末葉與唐室拒絕姻戚關係的貴族，在農民戰爭及「五代」內亂中絕滅了。封建諸侯的相當部分滅亡了，相當地積——主要是河南地方——歸諸荒廢的結果，官有農民再次增大到某種程度。那因為在唐的廢墟上發生的中國及各蠻族的「王朝」曾經努力想要獲得這些官有農民的緣故。

農民戰爭的敗北，將國土交與蠻族及當作中國武將的指揮者底同伴之手。他們之中最爲強大的，是李克用和朱溫了，李克用由朝廷受得現在的山西省一個地方，而朱溫是從反軍陣營中投降過來的人，受到了河南與朱全忠的名稱。朱溫屠殺宦官之後，也殺了皇帝，創立後梁（九〇七年）。帝國崩壞了，那以後直到九六〇年爲止的時期，是有名的「五代十國」時代。「王朝」的某些人依靠蠻族創立起來。（他們中的一個是李克用底兒子。）猶如所謂發明書籍印刷叫做馮道的，就曾經仕奉過四朝十皇帝那樣，最明顯地表現出這個時代

的特徵。「五代」的時期裏，商業被置在比較高度的水準上。中國西南地方——福建·廣東——到這一時代方才漸漸地更深刻的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到十一—十二世紀，這些地方，尤其是福建地方，在國家的政治底、經濟底文化底生活中，佔住顯著的地位。十世紀裏，開始了海上貿易的新的昂揚。

唐時代的末期，中國到這時爲止，那甘於被治民族的非中國民族的各國家起來了。八世紀，在現在的雲南省及貴州省，形成了以泰族爲主的種族同盟。到九世紀，這同盟在優秀的指導者蒙舍詔的指導之下，成爲強大的南詔國家，定現在的大理爲國都。南詔把那權力在南方擴大，直到現在的四川省及貴州省的一部。由着中國人手工業者的助力，「南詔蠶絲業爲世界最優良者。」

在印度支那的大部分中國屬領，到九世紀是歸屬於南詔的。十三世紀時，這個國家被蒙古人所征服。八世紀後半，黨項族移居到山西的東北部。黨項的酋長由於對農民戰爭的功績，受位夏國公。

宋的時代，在十一世紀的前半期，黨項把回紇從鄂爾多斯·陝西以及甘肅地方驅逐出去，更在這地域樹立了以指導者元昊爲首腦的強大的國家，（首都興慶·現在的寧夏）國號西夏。

九一六年，棲居現在內蒙古的蒙古種族，契丹爲阿保機所統一。他所樹立的遼朝，那權力直擴大到滿洲·朝鮮·蒙古·青海及東土耳其斯坦地方爲止。這國家的主要地域，實質上是由從屬於契丹的「五代」之一而讓渡於契丹的，現在的河北及山西的北部地方以及內蒙古。

宋時代（九六〇——一二七九年）（但在王朝權力下的領土被限於南部的一二二七——一二二七年時期，被稱爲南宋）

統一中國的新王朝的建設者，是「五代」最後期仕奉後周的一員武將趙匡胤而以抵抗契丹而知名的。終息國內的紛亂與內戰，防禦各蠻族的必要，使他能支配階級的隊列中力守着極廣泛的支持，那結果，他無論是由了軍事底各種方策，外交、收買，不甚至是由了陰謀，也都能夠使國土「集結」起來。他從地方行政應將個別的各项機能（財政、司法、軍事上的）分割出來，把這交與由首都官廳所派遣的官吏，還有，利用在各地方的官吏間的不和，來削弱這地方官的獨立性。宋時代，有階位的土地貴族及宗教底貴族的比重雖小，可是地主——「豪強」「富豪」（在身份制底關係上，他們是作爲學者——士大夫，士而出現的）的意義，卻益形增大了。

◎ 遼太祖·姓耶律·名億·字阿保機（八七一—九二六）。

在十一世紀中葉不輪租的土地，已達十分之七。朝廷對於地主底土地所有，不但不能實現關於課賦的自己的理論底權利，毋寧還往往正式承認地主的特典。宋時代的土地的兼併與農民的淪落，由於商品貨幣各關係的成長，致使強化了農民對於商人及高利貸的債奴底依存而被促進。農民土地的一切收取形態，在宋的時期也受到廣大的舉行。正可以由着文藝作品而得推測到的一般，這時代的莊園被施設工事的王城，往往成爲現實的城廓，在那周圍配置上地主農民的家。從唐的末期到宋朝，叫做鄉的用語加在中國村落及小村落底名稱的下面而被呼喚，而且還成爲所謂與村落的同義語的事實，（例如士家鄉——依照字義是士者家族的莊園）指示出這莊園普及的程度與那意義的。

甚至大莊園，有着氏族底各關係的直接殘滓的，也並不稀少。地主的農民們，構成了他的「血緣者」。在地主與農民各關係的一般農奴制底性質，以及農民大衆極貧的生活水準之下，支派出少數富裕的然而無權利的階層。

官有農民的地位，往往比那地主農民的更爲低下。這事實，在宋的時代，租稅及佃租的計算改成以貨幣支付，助長「沒收農民之不事生產者」的情形。那使官吏由於欺騙農民而可能將租稅的實質底數額增大到兩倍或是三倍。農民的人格底隸屬，也成爲在許多苛斂誅求上的機緣了。在宋的時代，國家自身終於作爲壟斷人，高利貸而出現。農民之選定

「對豪強提供自己財產，以免國家的義務，」便不足驚異了。

和唐時代的中國不同的，宋時代的中國在大陸的國境方面，是以弱勢的對於商業及政治關係作爲特徵的。中國對於中部亞細亞的各領域——對與西方的通商路——未能恢復支配。但是，與印度洋的各國及朝鮮的海上貿易，在宋的時代有了強度的成長。備有指南針——這雖在幾世紀之前已爲中國發明，可是於航海上廣被利用，大致是在這個時代——的中國船隻，在十二世紀直航到印度·與阿拉伯·朝鮮·日本·南洋諸島、印度支那之間，也進行着活潑的商業。

國內商業在宋的時代有更顯著的成長，對於商業的課稅，成爲帝國最大收入項目之一。宋的時代國內商業的成長，由着工藝的顯著的發展，還有在農業上——由着製茶業及一部的甘蔗栽培的發展，生絲及絲織品的發展，棉花栽培的開拓而被育植起來了。宋的時代最大的商業中心地，所謂「四大鎮，」便是近在黃河與運河的結合點成爲首都（北宋時代是汴梁即現在的開封）底港口的朱仙鎮·河口鎮（現在的漢口）·景德鎮（在江西的製陶中心地）·佛山鎮（廣東的商業）手工業底附屬都市）。到南宋時代，南宋的首都杭州獲得第一義的意義。運輸與商業的最大調節點是揚州（通南方及北方的運河與揚子江的交叉點）。唐的後半期，以及宋時代的中國封建制度的發展，是伴同着地方的商業 $\parallel$ 手工業中

心地的成長的。對於商業課稅的各項資料，因為宋的各州郡領有十乃至十五座都市或是市鎮，於是那些商業及手工業便顯示出是課稅的顯著的源泉了。十一世紀的後半以來，官方的文書將府縣區分爲「農村及鄉鎮」，在南宋區分爲「農村、鄉鎮及市場」了。在宋的時代，作爲商業及手工業中心地的都市的意義增大了，製陶、紡織、及鑛山業有着顯著的發展，書籍印刷轉化成相當的手工業部門以及商業源泉。

宋的時期，在中國的幫會及同業公會的發展上是重要的階段。關於幫會、同業公會、幫會商人及非幫會商人的記述——通常是可以到這時期的文書中看到的。在到唐的後半期爲止的初期各帝國中，都市人口固定了他的身份底以及地域底所屬性，被記載到特殊的市民名冊裏面，（在唐代，至少在原則上，甚至是這些市民的子孫，也是不能就公職的。）在這人口上，被課了特殊的捐稅——營業稅。到宋代，成爲對於商業課稅的根本底形態的，是對地方商業的捐稅與國內關稅。曾經與農民一起和官僚專制政治的農民相並而被奴隸化的手工業者及商人，託了幫會及同業公會底組織的餘蔭，即使擔負着若干的各項義務罷，也獲得了爲着擁護自己的身份底利益的可能性。然而，在封建時代的中國都市的經濟底、政治底發展，由着封建諸侯對都市的政治底支配，還有，由着商人，尤其是上層商人底利益與封建諸侯底利益的深刻的關聯，由着手工業及商業對於高利貸資本的隸屬的強化，而受到

阻止。

商品||貨幣底各關係的成長，伴同着作爲基本的流通手段的，是向白銀的轉移。在唐代，作爲流通手段的雖然是銅幣，可是在大的計算上，所用的是絲以及匯兌。唐代的終結伴同着貨幣（銅幣）恐慌，以這爲基礎而到十一世紀，普及了到這時爲止主要作爲奢侈品而運用的銀的使用，在十一世紀，紙幣的發行，獲得了最大的意義。

宋的時期，在封建底中國的精神文化史上，佔着應該特筆書寫的地位。非常地助長這個的，是使人覺得在唐代已經出現的印刷的普及。在儒教哲學領域中與各勞作相並而不能不特別指摘出來的，是歷史學底各種勞作與編纂（鄭樵·司馬光）多數的歷史地理學底文獻（地方底年代誌及記錄）以及主要爲治水上的必要而被注意的製圖學。

在宋代，階級鬭爭緊張起來了，帶上更爲複雜的性質。從支配階級方面發動的最有興味的政治底行動，是王安石的改革。（一〇六九年以後。）這改革雖是由於帝國在十世紀後半期進入的危機所引起的，可是成爲這危機的根柢的，是土地所有的集積和地主、高利貸、以及農民因着官僚而淪落的威脅。還有，是由於帝國對契丹及西夏不能不獻出莫大的朝貢，和站立在因着這些隣邦所謂侵略新地域的不斷的威脅之前，以致事態格外複雜化了。成爲改革的直接動機的，是增加帝國的收入源泉，以此來強化兵力。概括王安石所企圖的

改革底主要點是這樣的：（一）將所有的耕作地重行登記、測量，以之對所有的實質的土地所有者，均等賦課。（二）國家對農民及都市人口以利息百分之二十的貸付制度（這到當時爲止，朝廷對貸付利率進行過不得超過貸付資金的無謂的試行）。（三）依存國家的商業交易組織。特殊的官吏及地方行政應以這個目的，利用作爲租稅而入政府之手的生產物，而在（且）各地收買生產物。（四）農民的現貨底各項義務的折現化，而這折現化被普及到全人口之上，不能不以繳付者的財產狀態作爲比例而加以徵收了。（五）軍制的改革。事實上，當時的大部分軍隊，依照從階級落伍者中募集而得到補充，其中單於紙上有名的也並不稀見。王安石試行了農家每三戶出兵一人，以從較爲堅實的農民中組織新的常備軍。王安石更對教育制度及試驗制度，試行了賦與較爲實際的性質。

他的改革雖是以鞏固封建底官僚組織爲目標的，可是正和以司馬光爲首腦的代表保守派的地主以及高利貸的利害發生了正面衝突，受到他們的反對。不久之後，王安石不得不將改革的一部，自行加以廢棄。（從租稅中解放上層階級一聯的部類，限制新軍隊的任務僅在各地維持秩序。）大部分對改革抱有反感，而無力對付「豪強及富豪」的官僚，有的在各地怠於實施改革，有的想把這些改革作爲追加的負擔懸諸大衆之上。作爲王安石庇護者的神宗死後，（一〇八五年）保守派便代王安石而起，差不多撤去了所有的改革。

那以後革新派雖重握權力（一〇九四年<sup>㉑</sup>）可是他們的活動，在本質上，卻是服從利用改革鞏固了自己地位的大封建諸侯、收稅吏的利益，總而言之，這些改革，看來已使帝國的崩壞，有了若干的迂緩。

九九三—九九五年<sup>㉒</sup>，在四川已經興起了以王小波及李順爲首，要求財產上與身份上平等的一羣亂民。這一羣亂民，是屬於帝國的相對的鞏固時代的。

一〇八六年<sup>㉓</sup>，在王安石的改革時代，以方臘爲首將席卷五十二部的大羣亂民起自福建省，經過一年半的爭鬪之後才被鎮定。這些亂民所演出的最大任務的派別，是以平等主義作爲特徵的。另一方面，在宋的時期裏，也可以看到商人的行動，那其中最大的是一一七五年<sup>㉔</sup>，在湖南及湖北發生，而在一一一七年<sup>㉕</sup>重行興起的茶商的行動。商人組織的軍隊的作戰，擴大到湖南·湖北·廣東及江西省。這騷擾，是由了政府的獨佔所給與商人們

㉑ 宋哲宗紹宗聖年四月貶蘇軾·罷范純仁·以章惇爲相·更新法。

㉒ 宋太宗淳化四年—至道元年。

㉓ 宋哲宗元祐元年。

㉔ 南宋孝宗淳熙二年。

㉕ 南宋寧宗嘉定十年。

的壓迫，課稅以及苛斂誅求而引起的。朝廷不得不把叛軍——那叛軍是最有戰鬥力的部隊之一——編入官軍的編制之內。

一一二五年<sup>①</sup>以來，宋帝國受到女真族的南侵，展開了深刻的危機，那結果，該王朝喪失掉全部的華北地方。

十二世紀的開始，住在松花江的通古斯族（女真族）與契丹國的遼相抗爭，一一〇四年<sup>②</sup>在指導者阿骨打<sup>③</sup>的指導之下，統一滿洲的同族，佔領遼東後，樹立國家以金爲國號。一一二五年許，女真族企圖與中國人一起，征伐遼的本土。宋朝期望奪回被遼所奪以萬里長城爲境的中國故地，而與女真同盟。宋的軍隊被契丹人所破，但女真破了契丹而佔領他那首都燕京（現在的北平）。

宋所得到的僅不過六郡，然而對金卻須付出大量的賠償，每年便不能不把由這些郡所得的平均收入對金納貢。契丹的大部分移到女真底掌握之中。遼的王族之一（耶律大石<sup>④</sup>）率領小數的部兵逃到東土耳其斯坦去，在那兒樹立王朝，到一一六八年爲止，併合了土耳其斯坦的大部分，那是現在的卡薩克斯坦及烏茲培其斯坦地方的一部。（西遼或黑契丹（Kara Khitai））

在一一二五年，金已經對宋企圖侵略，第二年兩次攻圍首都，戰敗宋軍，生擒皇帝及大

部分的皇族，佔領宋的王宮。宋遷都到南方，最初在揚州而其次移向杭州（臨安）去了。那以後的幾年間，金曾企圖對江蘇及浙江作成功的南侵。

這些條件中，在一一二五年以降，國內展開大衆的叛亂，即使在官撰的史書中，從一二七年到一一三二年<sup>⑤</sup>止的期間裏，也舉出九十三件的大衆行動。在湖南及湖北的農民軍隊，那數量達到幾十萬。一一三一年，湖南大羣暴民蜂起，擁鍾相爲指導者，要求身份上及財產上的平等。無論是沿岸或是國內各地，掠奪行動帶上了大衆的性質。北方，即現在的河北·山東·山西·河南各地方，農民的階級底行動交錯着他們對於征服者的鬪爭，於是，這裏也產生了縉紳底愛國底部隊。都市人口雖也產生了大衆的行動，但那中間最顯著的是：對於宰相的更迭與迫近首都的金軍要求武力鬪爭的，在汴梁（開封）興起的六萬人的行動。（一二二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朝廷不知幾次地，爲對大衆運動發生恐怖而出賣防護國

① 宋徽宗宣和七年十月。

② 宋徽宗崇寧三年。

③ 即金太祖（一〇六八—一一二三年）之名，女真文字之制定者。

④ 即西遼德宗·姓耶律·名大石。

⑤ 南宋高宗建炎元年—紹興二年。

士的利益。

豪紳部隊（岳飛·宗澤等）雖與金進行獨立的鬪爭，但這些部隊的活動，愈加採取了所謂與農民暴徒鬪爭的方向。那因着農民軍隊的崩潰而變成容易。然而那些指導者們，不是成爲繙紳部隊的將軍，便是自行成爲繙紳。農民暴徒在四〇年代的中途已經平定了，而大部分未被金所佔領的地域，那實際的權力卻落在每個武將底掌握之中。一一四二年，宋與金之間締結和平條約，依據這個條約，淮水成爲兩國間的國境。宋約定對金獻奉歲貢，而且也承認隸屬於金國。自女真佔領華北起直到蒙古人征服中國爲止的時期，中國分爲兩個帝國——金與南宋——此外，西方存在着西夏國而西南是南詔。

金帝國（一一一五—一二三四年）除去華北之外，併有滿洲·東蒙古了。朝鮮及西夏自認是金的臣屬。金試行依照女真人的封建底土地所有形態，在中國造成自己的地盤。就在這個目的之下，各種族從滿洲被移植到萬里長城以內，各武將受得從普通中國人奪到的土地。然而，受得土地的女真人大衆，並不轉向農耕，結果實際上依舊由那土地的原來保有者加以耕作，祇形成對於女真的武將以及官吏，支付出增大了的佃租的狀態而已。金立刻學會了發行紙幣，而且是濫發。在十二世紀後半期，金帝國在那性質上，早已是征服者上層佔有特權的地位的，中國底封建官僚底組織了。這帝國的國內情勢，依然不絕地不安

定。這個帝國短命的歷史，被充滿的是農民暴動和官廷變革。

從一一二七年到一二七九年爲止的這個時期，是知名的南宋時代。帝制權力在統制各個武將的獨立性上獲得成功。成爲他們的支配的總決算的，是土地所有更行集中在地主底掌握之中，相當的地積，所謂是轉化到軍事底耕地——那完全的主人，事實上依舊是私人——上去了。在南宋時代，土地所有的集中，格外完成了高度的發展，在這時期，爲着地主利害，在華南的灌溉體系受到強度的擴張。地主底土地所有成長了，想要把這在某種程度上加以限制的試驗完全失敗結果，朝廷到十三世紀中期，考慮到要依據自己的土地所有。由朝廷所企圖的以這目的所「收買」的土地，實質上，等於是沒收了中及小的所有者的土地。爲什麼呢，因爲五百畝以下的土地，差不多都是以無價值化了的紙幣支付掉的。應着被收買的所有地的大小，現實底補償率增大了。這方法，即使是地主的相當的部分，也就摧毀了王朝的地位。

南宋時代的商業及工藝完成了更大的發展。同時，由於民衆的淪落及帝國的崩壞結果，在十三世紀的後半期，農業愈加深刻的沉滯起來，商人的地位愈加低落了。豪強的威力日益增大，剝削日益加重，人民日益貧困化，政權也日益崩壞。無論上層、下層，都達到無路可

走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之下，宋受到蒙古人的侵攻。

**蒙古人的征服中國** 十三世紀後半期，在蒙古族及直魯克族內部於現在的蒙古地方所發生的內部的鬭爭，由了一二〇六年即成吉思汗<sup>①</sup>之位的鐵木真把他們統一起來。成吉思所中央集權化了、的軍事底君主政治的建設，在這些種族，是從崩壞中的氏<sup>②</sup>種族底組織向封建底組織前進了一步。在十三—十四世紀的蒙古的動態，是在中國及其他亞細亞各國的政治底分散性與衰微的各項條件之下行動的，於是和強化的傾向到比較廣泛的國際底關聯的形成一致起來。一二〇五年以來，成吉思汗對於在現在的中國領上各國家，已經開始征討。一二〇九年，西夏自認爲成吉思的臣下。一二一一年，蒙古人以成吉思爲指揮者，侵入現在的河北·山西·山東·直達威海衛爲止。一二一五年，北京（燕京）被佔領了。蒙古人的侵略，伴同着在金領土中的大衆的騷擾，於是這些騷擾，終於一直繼續到金的滅亡（一二三四四年）才止。

但是在西方，被成吉思所擊破的乃蠻王之子，和花刺子模<sup>③</sup>王穆罕默德共同擊倒了西遼國。花刺子模王將中央亞細亞的全部以及伊蘭置於自己的權力之下，進而思考向中國侵入。成吉思從征伐朝鮮中召回自己的軍隊，一二一八年佔領西遼本土的東土耳其斯坦地方。花刺子模王破毀與成吉思間締結的通商協定的結果，蒙古人便遠征花刺子模。一

二一九—一二二〇年的戰爭，使花刺子模王的全帝國歸入蒙古人之手。速不臺及哲別所率領的蒙古軍，征服固爾扎後，通過德爾朋·頓·克魯伊姆·南俄羅斯·伏爾加中流，經過土山階曠野回到土耳其斯坦去。成吉思自身在一二二一—二三年終結了伊蘭以及阿富汗斯坦的征討。

成吉思汗殘留在華北的軍隊，征服了現在的河北·山西（一二二七—一二二二年）·山東的一部（一二三〇—一二二一年）·陝西的差不多全部（一二三三年）一二一九年，朝鮮自認爲成吉思的臣下。遷首都於開封的金國，僅不過保有河南與山東的一部分而已。濫發紙幣，以及被集中這小地域的軍隊奪去農民土地的舉動，使金的國內情勢發生極度的銳化。在這種情勢之下，金朝和那從一二一四年以來便廢除歲貢的宋及西夏開始了戰爭。一二二六—二七年的征討西夏中，成吉思正在攻陷首都之前（一二二七年八月十八日）去世了。他底第三子窩闊台承繼父親的遺志，到一二三四年將金的全土握入掌中。宋在這當兒，爲着

① Chingis-khan 蒙古語，所謂「成吉思」是「強盛」之意，「汗」是「王」。一般稱元太祖鐵木真爲成吉思汗（1162—1227）。

② Khorazm 唐書稱爲「貨勒自彌」中世土耳其在中央亞細亞的一個王國，現在的基發（Khiva）。

③ 速不台·哲別元太祖部下的兩員勇將。

期待奪回河南而與蒙古結成同盟。可是想要到手河南的宋底企圖，引起與蒙古人的戰爭，而這一次戰爭，更引起了宋的國內的騷擾。一二三七一—三八年，蒙古人雖已將四川佔領，但未能從揚子江渡過。

一二五一年，內部鬭爭的結果，蒙古的帝位歸於蒙哥，帝國的首都從和林遷移到上都（多倫諾爾近旁），反覆與宋的戰爭。受轄河南及陝西的蒙哥之弟忽烈在一二五二—五三年征服在現在雲南的南詔國。兀良合台軍進東京後，達河內經廣西而侵入湖南地方，一方面忽烈從北方進迫武昌而加以包圍。（一二五九年）蒙哥之死，以及迫切的爲爭奪王位的鬭爭，使忽烈不得已而容諾由宋提出的妥協條件，自此，揚子江以北的整個地域，就屬於蒙古了。宋承認臣事蒙古及約定獻納歲貢。這協定雖是由宋朝的權勢家嬖人賈似道所締結的，但他卻對朝廷隱匿事實，揚言自行擊退蒙古人而獲得眷寵。確保大汗地位的忽烈於一二六八年對宋開始進攻。從陝西（漢水河谷）方面扼住揚子江河谷的襄陽、樊城兩座都市，以五年的包圍與由美索不達米亞傳來的弩砲，好容易才落到蒙古人底手裏。在其他場所，這次戰爭暴露了崩潰中的宋帝國底無力狀態。宋帝國的滅亡之所以能被延遲半世紀，主要是西方經略與爲爭奪王位的鬭爭分散了蒙古人的注意，而另一部分，卻是因爲防備堅固的各都市及揚子江對於蒙古騎兵成爲重大的障礙。一二七八年，忽必

烈底勇將伯顏刃不染血地佔領了宋的首都臨安（杭州）。那第二年，在廣東的宋的最後擁護者也被擊滅了。

忽必烈的兩次遠征日本（一二七四・一二八一年），都在失敗中終了。想在安南・交趾支那（占城）及緬甸立定地步的蒙古底計算，也告失敗了。因為那地方與人民的抵抗相並，氣候在他們成爲了重大的障礙物。五〇年代，忽必烈從雲南向西部西藏遠征的結果，西藏就臣屬於蒙古人之下。

一二六四年，忽必烈已遷都到康巴魯克（Combaluc，以後的北京），成爲中國各地方的君主而用元的國號。在忽必烈時代，中國是蒙古帝國的基本的部分，而從太平洋到黑海，埃及・從中部俄羅斯及貝加爾延到恆河及波斯灣爲止。在東土耳其斯坦以西，北京的政權，僅在沿中國通到西方主要陸路的伊蘭及中央亞細亞是比較確實的。然而，中國由於蒙古人征服的結果，重又成爲統一的國家，那體制的內裏，也包括了比在唐及宋時代更爲廣汎的對外底經濟底政治底以及文化底關聯。而且無論是依靠經由印度的海路通商，或是依靠通西方的兩條陸路——通過固爾扎（阿力麻里）及伏爾加下流向阿速夫沿岸及克魯伊姆的熱那亞貨物集散地的；與通過伊蘭向黑海及地中海沿岸的——通商，也完成

了異常的成長。

月即別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在蒙古朝廷佔着優勢的地位。穆罕默德教從這時起，成爲中國人民相當部分，尤其是西北邊境（甘肅·陝西）及雲南地方的人民底宗教，在這些地方，從中央亞細亞來的相當人數的穆罕默德教徒，安居了下來。景教重又被普及了。在中國渡來了歐羅巴的工匠、商人、傳教師。在忽必烈處供職獲得樞要地位的馬可·波羅所著的、關於中國及其他亞細亞各國的有名的記事，實際是屬於這個時代的。在中國自十四世紀初期以來，已經存在了天主教大僧正的職位。西方的數學、天文學、醫術，也侵潤到了中國境內。阿拉伯人旅行家伊本·巴圖塔把泉州喊作世界最大的海港。中國的船舶比歐洲的船舶更大，而且完全與絲一起，也輸出了絲織品和鐵製品以及銅等等，中國的陶器被輸出到「世界之任何邊際。」（馬可·波羅）對外貿易刺激着舊手工業都市的成長，同時也喚起了沿通商路各地方的新的中心地的出現。中國各都市、國內商業，以及手工業的規模，使從西方來的旅行家爲之吃驚。在杭州的「手工業者之數極多，僅與染色業有關者，已達三萬二千人。」馬可·波羅這樣地記述關於杭州工匠及短工的工作者有數千房屋的幫會。「他們（這種家屋的主人）自己或是他們的妻子，決不用自己底手從事工作，生活正如縉紳及縉紳夫人同樣地，華美而又安樂。」（馬可·波羅）各種官辦的工作場（廣汎地使用牛農

奴底勞動的場所）設立了。蒙古時代，在中國爲灌溉而用的水車，也被普遍地使用起來。

在蒙古的時期，商品貨幣底各關係的發展，伴同着地主底土地所有的成長與農民大衆的地位低落。初期，蒙古人減輕租稅，對移居到荒廢土地的農民，給與若干的特典或援助，關於灌溉的維持及發展，洪水對策，曾經非常熱心地顧慮。但是，蒙古的武將在征服的當兒，已將幾千個農民轉化成農奴（「奴隸」）了。在忽必烈嗣子的時期中的江南（境界線雖有移動，但在揚子江以南地方。在蒙古的時代，是現在的江蘇省、安徽省、江西省的南部）地方，寺院最初是納貢農民的，擁有五十萬人以上的「田夫」。朝廷自身對諸侯、廷臣、寺院，頒與農民，准許爲軍事底殖民及牧畜奪取土地。中國人的地主也進行着同樣的事情。「江南的富家們，由貴紳奪取數百戶、數千戶，有時達一萬戶的人民，將他們當作奴隸對待。」「江南常常對『田夫』與家畜相同，並不示以期限，締結依照頭數之賣買或抵押契約。」國庫底各項義務及租稅之益行增大的負擔，於尚未由「豪強」所領有之所，加諸漸行減少的農民之上。農民逃散了，有的自行委身於這些「豪強」的庇護之下。

蒙古帝朝在那初期，構成了強大的中央集權化的潑刺的組織。蒙古人修改道路，也敷設新的道路，確立驛傳制度，由大運河連結了北京與南方（一二八二—一八九年），（這運河的大部份在蒙古時代被更新擴大，是從舊運河所形成的。）元朝在那滅亡的前夜，曾經企圖過改變

了河床的黃河的調整工事。(一三五三年)蒙古人與宋相異，獎勵商工業。這種政策的結果，中國商人不但由於犧牲農村，即使由於增大都市手工業生產的比重，也已強化了自己的經濟底地位。

然而，帝國的支配的地位，是屬於蒙古人或是他那最親近的同盟者的，主要的例如月即別人波斯人等等的官僚以及商人。外國的商業，高利貸資本，無論是作為徵稅承包人，或是在商業上的，都佔有特權的地位。因了這個緣故，人口也被區分成四種持有不平等權利的部類，即便是蒙古人，指蒙古人以外所有西域人的「色目人」，是舊金帝國底中國人民的漢人，為南宋人民的南人。在擔任元朝樞機的高官之間，中國人是極其少數的。

在這種基礎之上，對於蒙古人的不平不滿，不僅是在一般民衆之間，也普及到上層中國人商人在經濟底地位確立之下，這種不滿就愈加成長起來。那也波及到被驅入在第二義工作的中國人官僚。到一二八二年，已有供職於朝廷的兩個中國人武將作為首腦，擴大了陰謀。忽必烈的財政大臣把蒙古人支配的一切否定方面在中國人眼前體現的阿默德 (Ahmad) 成爲陰謀的犧牲者。忽必烈底各個後繼者的時期裏(一二九四年)帝國的崩潰開始了。該帝國的掠取底性質，隨着各封建諸侯的強化使帝國分裂，壓縮官僚底誅求的地盤而增大起來。

在十四世紀的四〇年代，就是在官許的史籍中，也每年地報告出發生破壞性的洪水，旱魃，飢饉，疫病的情形。一三三三年<sup>⑤</sup>，在廣東發生最初的顯著的反亂，一三三八年<sup>⑥</sup>，農民之子的小商人方國珍統率在浙江沿岸的「海盜」，擊破政府軍的艦隊，將那長官捕作俘虜。三年以後，在河南及山東開始了以「紅巾」之亂而著名的「白蓮」教團的叛亂。這教團是佛教宗派的一個分支，運動的參加者說是彌勒和自己一起，會在自己前面前進。運動的組織者韓山童自稱是宋室的末胤，雖在行動的前夜被處死刑，可是叛徒們佔領了許多地方，立韓的兒子稱爲宋的皇帝。同時，在江蘇·北部安徽·湖北等地發生了騷擾。蒙古軍雖然幾次擊破反軍，可是蒙古軍各武將間的鬪爭，使反軍得能迅速地重建。到一三五六年，「紅巾」佔領濟南·太原以及其他北部各地方的都市。迫近北京城。蒙古軍雖得重行領有黃河的平原，但其他的，幾乎是所有的地方，都落在若干反軍底掌握之中了。雲南·貴州·四川的非中國民族，也發生了變亂。在佔領的領地中稱皇帝王侯的反軍武將之間，開始鬪

① 元順帝至正十三年。

② 一譯阿合瑪或阿合馬特。

③ 元順帝至正三年。一說在至正元年四月，湖·廣·燕南·山東起兵。

④ 元順帝至正八年十一月，方國珍·黃巖起兵。

爭，於是，朱元璋作爲最後的勝利者而出現。他是北部安徽鳳陽的一家貧農之子。一三六七年，朱元璋在南京成立新王朝，稱爲明的皇帝。在產生新王朝的十四世紀的騷擾中，農民在所謂對使封建主義壓制具象化的異民族的鬪爭底口號之下，作着行動。運動的反蒙古底性質，使支配階級，尤其是下層的學者——他們的相當部分被奪去了自己的恆常底收入源泉（當時流行的文句是——「九人儒者，十人乞食」）——容易對農民發生影響。朱元璋的成功，可以用下面的事情來加以證明。那是因爲由於依靠比他更後起來的，比他更久固守近於農民立場的一部分商人以及學者，他在自己的經濟上發展了的支柱底領土上，創設了充分堅固的綱紀嚴格的政權以及軍隊。

**明時代**（一三六八—一六四四年） 一三六八年，洪武帝（作爲一三六八—一九八年的皇帝，朱元璋是以這個名稱而被知名的。）底軍隊並不會受到怎樣大的抵抗，佔領了北京而驅逐了蒙古朝廷。一三六八年，蒙古人從山西、陝西以及甘肅受到驅逐，一三七一年，四川被佔領，在一三八一—一八二年，受到地方居民頑強抵抗而破敗之後，雲南又被佔領了。

洪武帝自承是成吉思汗帝國的後繼者。洪武以及那後繼者時期中，明人對蒙古佔有了支配底地位。一三八五年<sup>o</sup>，洪武從土耳其斯坦的蒙古人受到作爲君主的名義的承認。洪武帝想從帖木兒也獲得同樣承認的試探失敗之後，就和他締結了通商協定。蒙古人之

從中國驅逐使與蒙古人有關係的高麗王朝王氏（九一八—一三九二年）被李成桂所覆滅。李成桂是存續到朝鮮被日本合併才止的李氏王朝的創始者，曾經是明的臣屬。

洪武帝重行編定納稅者名冊的驗證，憑這進行租稅以及各項義務的賦課，以試行較為均等的分配。對戰後歸於荒廢的土地內殖民，以及一部分沒收的結果，致使明朝初期官有農民的數量增大。洪武帝屢次公佈關於蓄積殘餘金以及補助殖民者的敕令。在明朝的初期，於灌溉方面完成了很多的事業。

洪武帝將中書省——中國的傳統認為這是為學者身份的代表者——撤廢，想要由了依靠自己足可信賴的代理人（宦官也加在裏面），掌握實質上的權力，他將二十四個兒子以及孫子承繼者分封公侯，頒與土地，但那統制權卻仍然掌握在帝制官僚底手掌之中。長時的動搖之後，他好容易確立了國家考試（科舉）的制度。在洪武的事業中，雖然反映出該王朝是農民底出身，可是他的政治時代裏，帝制已經出現封建官僚底組織，那其間，亞底、沉滯底專制政治的各樣式，已經強化起來。

他底孫子後繼者，經過四年間的鬭爭之後，就被他那任職北京都督指揮邊境軍隊

(也包括降明的一部分元軍)的叔父(燕王)所除滅了。永樂帝(燕王)將首都遷移到北京(一四〇九年)。他的時代裏，明的封建官僚底帝國，經驗到短期間的繁榮時期，於是，不久之後，就由袁微來代替了這個。

明雖援助被顛覆的王朝而併合安南(一四〇六—一四〇七年)，可是十年間鬪爭之後，安南人在一四二八年，驅逐了中國人。一四〇三年到一四三〇年間，明向因多尼西安·印度支那·錫蘭而更至波斯灣為止，派遣過幾次海軍遠征隊。麻刺甲·錫蘭的一部，以及其他許多小侯國，承認中國的主權。中國接受從索馬利派來的使節，支持與日本將軍的關係。在這時期，向因多尼西安及印度支那的中國移民開始增大，那以後，採取了愈加廣泛的性質。

由兀剌統一蒙古之後(十五世紀三〇年代之末)，蒙古人以也先為首將在察哈爾破中國軍，生擒皇帝，迫近北京的城壁(一四四九年)。由着與也先媾和，明終於絕望干涉蒙古的內政。在西方，明喪失了哈密(一五二三年)。十六世紀初期，蒙古人依靠達延而重被統一。達延之子阿勒坦自一五二九年至一五五〇年之間，企圖對中國侵擾。一五五〇年，燒毀了北京的郊外。日本人的侵犯從十四世紀後半以來就不曾有過中斷，也在寧波·揚州等地方進行掠奪。日本人和中國人海盜及叛徒相勾結，在一五五五年，包圍了南京。

一五九二年，日本的支配者秀吉率十九萬軍隊向朝鮮侵入，佔領首都。明軍將日本軍追迫到沿岸地方。新的遠征（一五九七年）固然擊破中國軍，卻未能佔領國土。秀吉死後，日本軍撤退（一五九八年）了。於是因着一六〇七年的媾和，確定了朝鮮從前原有的地位。到一六二一年，從滿洲方面成長了新的威脅。

在明樹立的一百五十年以後，早已是「兼併數萬畝土地之縉紳及豪強之數，業已無數」了。百萬畝土地的所有者，也並不稀有。十五世紀的中葉以來，帝室的莊田普及起來。在洪武帝時代繳納收穫底百分之四〇—五〇的軍事底殖民者以及一般移居民，形成明朝時代所調查的耕地底約百分之十。在若干地方達全耕地的百分之三〇的國有地，大部分

⊖ 明成祖永樂四一年。

⊖ 明宣宗宣德三年。

⊖ 明成祖永樂元年—宣宗宣德五年。

⊖ 明英宗正統十四年八月。

⊖ 明武宗正德八年八月。

⊖ 明世宗嘉靖八—二十九年。

⊖ 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七月。

⊖ 明熹宗天啓元年三月。

也遭到掠劫。至明朝的末期，在江蘇：「有土地者十分之一，在他人土地耕作者十分之九……今日納佃租，明日請借貸。」（顧炎武：日知錄）

商工業的發展，雖是極爲緩慢，然而依存於益形增大的高利貸資本之下進行，但總之到了這時代的末期，已經達到相當的水準。「依商工業致富者益多，依土地者益少。商業交換，有強力之成長。」（顧炎武）製陶業及鑛山業，雖基於農奴勞動的相當廣汎的需用，可是有了發展。十九世紀存在於中國的幫會各種形態（會館、公所），那起源卻是發生在這個時代的。

在明初期的皇帝時代，海上貿易保有比較高度的水準。中國之被世界貿易摒諸事外，——那是由於十六世紀以來世界貿易路線被改變而助長的，——使這一時期的沉滯與保守主義底各樣式強化起來。在元的時代裏，中國的封建底各矛盾的成長，使商業資本在比較大的任務之下運行，可是在明的時代裏，高利貸資本、隱藏貨幣的貯藏利益，卻較爲強力地前進。明朝雖想實施紙幣的流通，但到一四四八年，紙幣無價值化了。流通手段是銀及銅。雲南在這時期，是中國的銅的主要供給源泉。這時代末期，一切租稅，都改成以銀計算了，那結果，使農民強化對於高利貸及官吏的債奴底依存。是「歷三百年間，如水之注池，銀及金均被驅入北京。」十三世紀初頭以來，站立在崩潰中的明的官僚底組織的首腦地位的，

通常是宦官。官僚機構的腐敗，伴同着所有種類的官僚寄生的繁榮，於是，在這寄生者之中，與崩壞中的官僚相並，有着多數的專門底掠奪者。（所謂訟師、職業的訴訟人等等。）他們往往從腐敗中的官僚底機構相勾結的這社會的階級落伍者底各要素中，生長出來。農業的荒廢、商業的沉滯、饑饉、放浪、權力機構的腐敗、在上層的各黨人間的鬭爭——這種種，是明朝最後數十年間的情景。封建底支配的危機，反映在十六世紀末以後的縉紳反對派的成長之中。十七世紀的反對派底指導者黃梨洲·顧炎武等，反對宦官的支配，要求政府對於學者層的责任，土地不平等及租稅負擔的緩和，作為流通手段的銅改換為銀。

明的封建主義的保守主義及沉滯，由於宋儒教的新主張，而互相呼應。國家考試制度，栽植了狹隘的獨斷主義，致使學問歸着到宋正統派精神中儒教原本的字義解釋。

一五一六年○歐羅巴（葡萄牙）的船隻首次到達中國，在一五五七年○葡萄牙人在澳門設立根據地。佔取了菲律賓濱的西班牙人在一五七五年，荷蘭人在一六〇四年，英國人在一六三七年，都在中國出現。俄羅斯人與中國人的交涉，所記的是在十六世紀（一五六七年）以來的事情。從十六世紀末起，在中國有耶穌會派的出現，他們之中有的有高度的教

○ 明武宗正德十一年。

○ 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

養（利瑪竇等），在中國的各種歐羅巴的知識，主要的是數學、天文學、醫學、鑄造技術（火炮）的發生，是與他們的出現相關聯的。十七世紀開始，爲耶穌會僧侶的弟子徐光啓所編纂的「農政全書」，包含了關於歐洲式水利技術的篇章。

然而，在這個階段，歐羅巴的影響在社會發展的進行中，不論多少，在本質上都不會有所反映。

明帝國的危機由於與滿洲人的鬭爭而複雜化了。一六〇六年<sup>⊙</sup>光景，松花江流域的一個種族酋長努兒哈赤（Nurhachu<sup>⊙</sup>）統一滿洲種族，對中國佈告宣戰。一六三五年許，他佔領奉天及遼東地方，一六二六年，在攻圍錦州中去世。更於一六三四年，滿洲人征服了蒙古東部各種族。朝鮮也在受到滿洲人兩次遠征之後，自認爲滿洲人的臣下。滿洲人再三敢行侵攻直隸及山東，與滿洲人不斷的戰爭，軍隊在北邊的集中，引起了租稅及各義務的較大的增加。

十七世紀三〇—四〇年的農民戰爭 在十六世紀初葉，農民騷擾的波浪已經掩蔽了中國各地方的大部分。一六二二年，在山東的「白蓮」教團——那組織普及到幾個地方——的騷擾被鎮定了。雲南及貴州由於幾年之間對於中國支配者的騷擾而受到壓抑。一六二八年，在陝西及山西的西南部勃發了突發的行動，那立即成長爲農民戰爭。在陝西

成爲騷擾的衝動力的，是一六二八年侵襲全省的饑饉，與在北方的驛傳勞役——在陝西的貧民，那成爲工資的源泉——的解散。一六三二年以降，騷擾部隊從陝西越出，於是，騷擾擴大到包括陝西·河南·湖北·安徽的一部、山東的一部、江西的一部以及四川的一部的廣大的地域。農民到處和叛徒合流，那部隊往往達到幾萬人。然而，運動僅止於分散的，而且叛徒也未在佔領地域內堅守隱固的地盤。那結果，農民從這行動中退卻，而在一六三六——三九年<sup>⑤</sup>，當朝廷能對叛徒集中巨大兵力時，叛徒就連接地敗北；騷擾的新的發揚，是一六四一年，也就是在與滿洲人的戰爭，使政府軍集向北方的時候開始的。當這時候，從農民指導者羣——那大部分已在前一時期被消滅了——之中，產生了李自成指導農民戰爭。李自成的出身是農民，做過農村的鐵匠和驛卒。一六四二年，他經過九個月間的包圍之後，取得開封，而其次是陝西，將從甘肅到海岸爲止，從黃河到揚子江河谷爲止的全地域中的騷擾，加以統一。叛徒以李自成爲首領，在君主政治的形態下組織起來，把自己的王朝稱爲大闢。他們撲滅成爲最憎惡的目標的舊官僚、貴族、地主，把他們的財富頒與貧民，撤廢舊租

⑤ 明神宗萬曆三十四年。

⑥ 清太祖姓愛親覺羅名努兒哈赤（一五五九—一六二六年）。

⑦ 明毅宗崇禎九十二年。

稅及各項義務。農民們歡迎「同情（人民）的李的正義軍隊。」反軍成功了形成比較強力的有軍紀的軍事底、政治底組織。李自成也吸收主要是在舉兵之前對民衆有善良傾向的學者。結盟的縉紳中的有些人，雖想組織陰謀，可是在事前就被處刑了。

一六四四年，李自成經山西向北，向北京迫近，在四月三日佔領這個地方。明的最後的皇帝遺下文書，說明他所有的宰相，是帝國滅亡的充分原因，便自縊死了。李自成爲討伐明的部將吳三桂軍隊，到山海關去。山海關的戰鬪（一六四四年五月二十六日）中，李自成敗北了。然而，那因爲吳三桂有了與他締結協定的滿洲人相助的緣故。滿洲人的攻擊，使李自成不得不放棄北京。不久間，他自陝西被逐，依據另一所說是被殺，更一說是成爲佛僧而終了他的餘生。在四川自從一六四三年以來，由張獻忠站定了地位。他的軍隊一時中從四川起幾乎在直到南京爲止的地域中活動。這時期（一六四四年），在江蘇·安徽以及浙江興起了大衆的行動，那其中發生顯著的成效的，是在農民中地位最悲慘的「奴隸||農夫」的階層（實際上是農奴）。浙江·福建·以及廣東沿岸，大衆的運動在「海賊」（南寇）的形態下展開。至一六四六年，雲南及貴州重又化作地方人民的騷擾之巷，而爲滿洲人由四川驅逐的反徒的一部，和這發生了連繫。

滿洲王朝（清）時期（一六四四—一九一一年）  
滿洲人由着指導中國封建諸侯對人民

騷擾的鬪爭，而掌握中國國土的最終的征服，由於鎮定吳三桂的暴動（一六七三—一八〇年）以及一六八三年征服國姓爺（鄭成功）與他底兒子在台灣的「海賊」王國，方才漸被完成。農民戰爭對於腐敗了的明底官僚機構，大土地所有，及極苛刻的農奴形態，加一絕大打擊，使危機在某種程度下稀薄起來。在這些條件中，滿洲人施行的政治，暫時的助長了封建底支配的鞏固化。滿洲之在中國出現，往往爲着他們而使中國人口的農奴化，耕作地的牧場化，是事實。然而，滿洲人依着清新的軍紀，相當嚴肅的鞏固的軍事封建底組織，強化了明帝國的腐敗了的上層組織。他們不但是北邊，也在國內的所有交叉點上，配備了自己了藩兵。滿洲人的帝國到某種時機爲止，是比較「低廉的」政治組織。征服者持有把病態地繁生着的中國寄生底封建底官僚的相當部分，予以削除的可能性。滿洲人撤廢掉明朝在最後二十年間的附加稅。在北京他們全廢了許多官廳設施。他們採用圖商人利益那樣的各項政策。到十七世紀末葉，這一切與民衆的無慈悲的壓制相俟，將帝國導向較爲鞏固的狀態。

初期的滿洲人皇帝，主要的在天文學（曆法的編定）以及砲兵技術方面，借着耶穌會教徒的力量。康熙帝（一六六二—一七二二年）學習拉丁語，對歐羅巴的科學發生興趣，可是

○ 清聖祖康熙二十一年。

在政治上卻並不想從中國的傳統中脫離，而在中國的支配階級之中確立新王朝的支柱。他底後繼者雍正帝（一七三三—一七三五年）時，滿洲人對傳教師加以兇暴的彈壓。雍正帝試將權力集中在對他忠順的軍事參議院（軍機處）底掌握之中，想要壓制滿洲人及中國人封建諸侯的愈益成長的獨立性。乾隆帝（一七三六—一七九五年）的時期裏對外威力的隆盛，伴同着滿洲人及中國人的大官及徵稅吏的少數團體底威力的強化。最初，滿洲人由了在中國扶植滿洲的封建底土地所有，試行建設為自己的支柱。然而所賦與滿洲人貴族及一般滿洲人的土地，漸次地歸併在中國人高利貸的手中去了。滿洲人的大眾逐漸貧困化，滿洲人諸侯由着參加到帝國官僚機構之中，想要在剩餘生產物中獲得自己的一份。但是在這個機構中，尤其是在太平的騷擾以前，對於他們卻受到極其特權的地位所保障的。在嘉慶帝（一七九六—一八二〇年）及道光帝（一八二一—一八五〇年）的治世中，帝國的衰微已經明顯地顯現出來了。

與滿洲人的軍事底組織相並，成為帝國的顯著的支柱的，是商業高利貸底獨佔。特殊富裕的，是山西的商人，鹽商人，同等的公行。山西的獨佔主們，依據着清的專制政府，以及與自己的收入投資到高利貸業的官僚的緊密的同盟。山西的各銀行由着支配在舊中國的經濟底關聯的極廣汎而濃密的體系同時，也與各省之間展開結算，對政府融通資本，參與

租稅行政，打開與軍隊之間的結算等等，擔負着國家會計局的任務。清時代的山西各種獨佔的意義增大，可以由所謂滿洲人的到來同時，中國和蒙古·中央亞細亞及土耳其斯坦之間，重又恢復了有活氣的商業底及政治底關係，來加以說明的。當時和俄羅斯的大貿易也發展了，於是山西的獨佔主們，就作為類似的（十九世紀六〇年代為止）俄羅斯商人獨佔主（恰克圖商人）的承包人而活動。在十七世紀，山西的工業（主要的是鐵）底意義也增大了。山西的獨佔主們的衰亡，是隨同清帝國的滅亡而起的。

十七世紀中葉以來開始的，俄羅斯人和滿洲人在黑龍江的鬭爭，成為在尼布楚第一次締結的中俄條約（一六八九年）。康熙帝鄭重地接待彼得一世的使節（一七一九年）。一七二七年，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簽訂了恰克圖條約。英國人由着馬戛爾尼（一七九三年）及阿姆查斯特（一八一六年）使節的助力，想要撤廢海上貿易的限制，可是失敗了。

一六八三年，台灣被中國合併了。康熙帝在一六九〇年及一六九五年的戰爭中，擊破準噶爾的噶爾丹汗，使喀爾喀部隸屬。一七五六—五七年，準噶爾及東土耳其斯坦的回教侯國被征服了。一七二〇年，中國征服了十六—十七世紀以來成為蒙古人支配底宗教——喇嘛教的中心地西藏。十八世紀的後半期，中國在西藏確立了支配權。喇嘛教成為中國支配蒙古的重要武器。中國與保持對朝鮮的主權同時，併把這擴大到緬甸（一七八八年）。安

南（一七八九年）·廓爾克（一七九二年）爲止。

清朝時代中國帝國的民族問題 中國帝國在由着支配底各民族壓迫、隸化、以及同化的許多異民族的過程中，被形成了。非中國民族在邊境的相當廣大地域中，保持自己的獨立性與數量的優越性。在中國人之間，通常以獠族、苗族、羅羅族等等名稱而知名的秦族、蒙族、諾斯族等等，曾經——依據口傳——是居住在中國的中央部的。漢的時代，他們就被逐到揚子江以南以及四川去了。

較爲發展的中國社會的影響，促進了這些各種族的文明化，於是，他們形成氏、種、族同盟，創造出獨自的文字，在八—九世紀，已經樹立起廣大而且強力的國家（參閱前文的南詔）。中國的殖民地化，將非中國人口從較爲肥沃的健康地區，驅逐到山地或是沼澤地帶。這些民族的領土，轉化成新的州或是郡，而由所謂土司——降將中世襲的長官，或是代替他而受任命的中國官吏——加以統治。可是實際上所形成的情勢，卻從名義上的政治底依存，轉化成完全民族底、社會底隸屬化。

在十八世紀的帝國，由於政治底及經濟底成長的結果，中國的封建諸侯及商人，無論對長城外的地方，或是對各民族保持獨立性殘滓的西南部地方，都伸展了勢力。那是和已在明的時代起，尤其是從十七—十八世紀光景起，在雲南·湖南以及其他各地方的鑛業

(銀、銅、錫、鉛)底發達，相連結的。一七二六年以來，朝廷開始廣汎地通用「地方政治中國化」的政策，那結果，土著人底土地被收取了，而這些土著人被轉化成中國人地主、官吏，以及和他們接近的土著長官底農奴或是奴隸，於是，這些民族的民族底獨立性就完全受到了壓制。這事情終於引起許多次的大騷擾，(一七三五年的貴州，一七四〇年的湖南及廣西，一七四六—一七七六年的四川，一七九五—一九九年的湖南及貴州)。而那鎮壓，伴同了這些民族底一大部分的剿滅與他們底領土的縮小。十七—十八世紀的征服，那結果不但使長城外各地域化作政治底從屬，也使他們轉化成苛酷的利用的對象。(土地及牧場的奪取、高利貸及商業、封建官僚底壓制的最惡形態)。這兒也引起了無數次的反亂。(一七五五年的蒙古人運動，一七六六年在吐魯番的贊克汗之反，一八二六年的張格爾之反)。東土耳其斯坦的併入帝國，在中國助長了穆罕默德教徒的積極化。在雲南地方，十三—十四世紀時期，由着從西亞與蒙古人同時來的軍隊，所傳來的穆罕默德教，在以前就進入南詔的居民之間普及起來。在甘肅及陝西的民族底性質的差異，也採取了宗教底形態而出現。(穆罕默德教人民之間的非中國人，主要是回紇人的顯著的職務，穆罕默德教徒的地域底特殊化，社會 || 經濟底及生活底內裏的各特性)。民族底騷擾的頻發與那規模，形成了清朝時代底特徵的樣式。



### 三 近代

鴉片戰爭及十九世紀中葉的農民戰爭，作爲十七世紀農民戰爭的總決算，那農業各矛盾的弱化，十七世紀末以後政治底安定，以及被佔領地域的開發，對外貿易的成長等等，抑制了十七世紀末以來顯著的經濟底昂揚。那是鑛業及手工業生產的大中心地成長了，十八世紀末以來製造業（主要是小規模的）有了顯著的發達，商業的農耕（棉花、煙草、生絲、茶、穀物）增大了，國內商業大爲發展起來。在清朝時代所謂採取會館或是公所形態的幫會勢力增大了，與那同時，對於作爲商人資本主而接近官僚的大商人底幫會或同業公會的依存性，也被強化起來。山西的銀行家幫會，在全國設有代理部。在十九世紀前半期，大行莊（公司）普及起來，引起了中小商人的不平。於另一方面，站在在同業公會組織外部，或是與那些關聯微弱的庶民大衆，成長了起來。十九世紀後半期以降，農民土地的喪失，重又被大規模地執行，擁有幾十萬畝田地的地主，也並不稀有。清時代的地主，是和高利貸及商人所連繫着的。農耕祇在農民底極小面積的地面上進行，而這些農民，被置在封建底制度的各項條件之下。（由地主及其使用人的懲罰佃戶，官僚底恣意盤橫，農民底身份低下等等）對地主至

少要繳納收穫的半數，繳付莫大的租稅，擔負種種繁雜的義務與納付勞働地租。十八世紀以降，民衆的地位尤其低下，但那與在清統治下的收買及賄賂的全體系相連結的官僚的壓制，發生了最大的作用。十九世紀的前半期，資本主義生產樣式的各項要素，雖已在中國發展，可是在生產上的這些新的關係，所發生的作用還是極爲微小。

十八世紀末期，在國內，秘密結社——基本的是農民及庶民各種組織——的活動被強化起來，而且勃發了許多重大的騷擾，（一七九五—九九九年，湖南及貴州的民族的騷擾，一七九六年，台灣的騷擾，一七九六—一八〇四年，「白蓮教徒」，一八一三—一四年，天理教徒）。「海賊」達到廣大的規模。「白蓮教」的騷擾至少互及五州，宮廷的軍費不下於二十億兩。就是在這一羣學者、商人、地主等之間，從十八世紀後半以來，也成長起反滿洲人的氣氛，朝廷對於這個的回答是：彈壓及追究可疑的文獻。這縉紳底反對派，一部分也浸潤到秘密結社中去了。歐羅巴人的侵入，便促進、深化了中國史上正在發展中的政治底危機。

第一次鴉片戰爭（一八三九—四二年）<sup>①</sup> 到十八世紀末爲止，中國與歐洲的通商，主要是從中國輸出絲與茶作爲基礎而被連繫起來的，於是這輸出是由了相當程度的銀的輸入而受到償付。到一八四二年（南京約條）爲止，這通商被限於廣東及澳門之間，經過廣東巨商獨佔底組織的公行而加以進行。自東印度公司愈加從印度大規模地輸入鴉片

以來，這地位就愈加由於從中國增大銀的輸出所代替了。與歐洲的通商，僅此一點也已是使十九世紀初葉在國內發展中的經濟底崩壞，作猛烈激化的一個主要原因。那促使中國政府試行限制與歐洲通商所引起的有害的作用，而其結果，致使總督林則徐燒燬外國人屯在廣東的大量鴉片（一八三九年）鴉片的燒燬，雖成爲第一次鴉片戰爭（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年）的近因，可是這戰爭的原因，卻在於更深之處。東印度公司的獨佔廢止（一八三四年）以後，與中國的通商便被移到所謂「欽定商人」（Imperor's Merchant）——持有莫大的貨幣手段與獨立的艦隊，經營絲、茶以及鴉片的商業資本底最大代表者——底掌握之中。「欽定商人」以中國的絲、茶以及印度的鴉片，從實質上獨佔底對華貿易獲得莫大的利潤，因而，並不甘於像在中國的英國棉花工廠底經理那樣的，從事單純的職務。成爲對華戰爭的砲手的，主要是在英國的產業資產階級的代表者，他們自從一八三二年改革議會以來，強化了國內的自己的立場，在第一次產業恐慌的影響之下，便在日程上關注到中國市場的獲得。

① 清高宗乾隆六〇年—仁宗嘉慶四年。

② 清仁宗嘉慶元年—九年。

③ 清仁宗嘉慶十八年—十九年。

④ 清宣宗道光十九年—二十二年。

戰爭是在廣州近旁，由英國攻擊中國軍艦而開始的。英國的陸海軍佔領了舟山羣島、香港、以及其他寧波、上海、吳淞、鎮江等等各個都市。英國艦隊侵入揚子江，依據大運河截斷南北的連絡，正將衝到南京去。那結果，北京朝廷不得不於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在南京和英國締結媾和條約。依據南京條約，中國爲外國貿易開放廣東、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的五港，付出賠款一千二百萬兩，而且賠償燒卻的鴉片，將香港割讓給英國。一八四二年，中國對輸入品的關稅，受到不得徵收從價五分以上的限制。

那條約自動地給與英國的，是包含了將來其他國家也將要求中國的一切優先權的關於最惠國條約的條款。這條款在那以後，當中國與歐洲各國之間所締結的一切條約中，都不變地被重覆出現。

**太平天國運動**（一八五〇—一八六四年）「一八四〇年的不幸的戰爭之後，中國不得已對英國的賠款，龐大的鴉片的不生產底消費，由這種貿易所引起的貴金屬的流耗，外國人的競爭對地方生產波及的破壞底影響，全國家政廳的腐敗。」（馬·恩全集第九卷）——這各種原因，使中國民衆的地位格外低落了。於四〇—五〇年代，在農民經濟凋落的各條件下，屢屢的發生因自然底災害所引起的悲慘的結局。商業路之從廣東向揚子江河口的移動，將從事搬運商品的苦力及舢舨夫大衆的生活手段奪走。在四〇年代，帝國內各

地方已經有騷擾勃發。與英國戰爭的敗北，使滿洲人專制的權威受到打擊，誘發起民衆運動的昂揚，強化了所有社會階級的政治底積極化。一八四五年，在湖南省，要求土地再分割的大規模的騷擾擴大了。在支配階級的陣營內，與英國戰爭的敗北，強化了反對派對於滿人的不滿。一八五〇年，與太平天國運動出現的同時，政治底危機帶上國內戰爭的性質，頃刻間使全國捲進在旋渦之中。

太平運動發生在廣西省。那當作指導者的洪秀全是個貧困化了的，成爲農民的縉紳底代表者。他在廣東雖由新教（Protestant）的傳教師羅伯（Roberts）而知道了基督教，可是這基督教，正是他開始在廣西省說教，不久之後便充滿了社會底、政治底內容的，成爲宗教底神祕底所說的基礎。

太平運動的組織，吸引了廣汎的農民大衆，主要是貧農大衆。太平軍從最初起就和被治民族（所謂苗族、獠族）取得緊祕的連絡。於是到以後，這些民族在運動中盡了最積極的助力。然而，一部分的縉紳及地主也參加了這個運動，而且在運動的指導上，佔着樞要的地位。一八五〇年，太平軍北上，一八五二年秋，佔領了武昌及漢口，從這地方，他們依照陸

○ 清宣宗道光三〇年—穆宗同治三年。

○ 清文宗咸豐二年。

路及水路到揚子江下游，一八五三年攻略南京，成爲太平國家的首都，佔領鎮江後，依據大運河以截斷南北的連絡。太平軍的運動伴同着地方性底騷擾的波浪。在湖南省，成爲太平軍根據地的是贛地方。贛山勞働者們當太平軍包圍長沙時，進行過炸毀工作。在江西省，成爲太平軍重要支撐點的，便是最大手工業底及製造業底中心地景德鎮了。太平運動也吸收了商人及有產階級的相當階層。太平軍殲滅滿人及成爲憎惡之的的支配階級代表者，沒收富人的財產，將這充作運動的必要費用，而且也在貧民之間分配。太平軍最重要的法律，於一八五三年在南京頒佈，那是在家長制度底共產主義的精神下的、使土地社會化的土地法。在這時期中，與洪秀全相並是運動最傑出的指揮者，也是那重要組織者、指導者，是燒炭勞働者出身的楊秀清。由太平軍在南京所組織的以洪秀全爲首腦的神政帝國，那權力一直伸張到安徽省南部·江西·湖北·湖南爲止，太平軍的勢力擴大到這些省境以外的相當地域。但是，太平軍的這些全部領土中的一聯大都市，不但依然在政府軍掌握之中，而且還不時移轉。一八五三年（四月）太平軍對北方派出軍隊，那軍隊雖經過河南·山西·直隸·而成功地進軍，可是在天津（海靜）受到阻止，一八五四年春，終於不得不撤回軍隊。而第二年（十一月）所派遣的軍隊也，在失敗中終結。

在初期，太平軍的權力，作爲特徵的是以高度的集權性以及軍紀。太平軍和佛教及天

主教相鬭爭，沒收寺社的財產。太平軍實現婦人的權利平等，嚴禁奴隸制。太平運動正如恩格斯所指出那樣地，是對外國人的威脅作爲報復的、民衆的民族底行動。那以特殊的激烈性，對向滿人，也就是對向在民衆眼光中暴露出農奴底壓制與對外底危險現出無力的滿人。然而，與爲隔離保障中國而爭鬭的縉紳的民族主義底運動不同，太平軍將四海同胞當作了口號。可是，太平運動的這個改革底內容，是在落後的形態下進行的。缺乏改革底同盟者及缺乏已在中國各都市蜂起的農民指導者，成爲這個運動的弱點，助長了各都市的反動底各項要素的強化。

滿洲人朝廷的軍隊爲太平軍所擊破的結果，不久之後，與這次騷擾的鬭爭，主要是成爲地主及縉紳在各州所組織的地方軍隊的工作了。成爲這種軍隊編成的中心的，是湖南省，一八五二年以降，曾國藩開始編成過後成長爲湘軍的軍隊。這類同樣的軍隊也在安徽（李鴻章）、浙江及福建（左宗棠）以及其他各州發生。曾國藩在一八六〇年指揮軍隊對抗揚子江的太平軍，想要吸收農民的較爲富裕的階層，而對改革的大衆施行着殘酷的暗殺。地方部隊（鄉勇）在農村實施殘虐的軍事獨裁制，作爲這些軍隊融通資金的最大源泉，在舊租稅中再附加上釐金。一八五八—一五九年，太平運動本身終至腐敗，曾國藩好容易才能獲得重要的成果。一八五九年安慶的佔領，阻止了太平軍在湖北及湖南的行動，他們漸

次地從江西被驅逐出來了。一八六〇年，以南京爲中心而被壓縮在小地域中的太平運動，重又開始昂揚。那是和李秀成的名字相連繫着的。他是那周圍統率着較爲有意識而強固的精兵的優秀的武將。太平軍自一六八〇年以來，佔領浙江·江蘇以及福建的一部，保持着南部安徽的支配權。一八六〇年及一八六二年，太平軍雖然企圖佔領上海，可是在這地方，他們遭遇到所謂列強的新的敵人。這列強的干涉與太平軍陣營內的內部底分解，決定了這個運動的命運。

一八三九—四二年的戰爭，中國還沒有摧折掉對於列強的抵抗力。在一八四二年，英國·法國·美國已經基於實施條約的條件，並不通告宣戰而發生許多行動，例如英國艦隊在一八四七年佔領廣東。與太平運動開始同時，列強尤其是英國在中國佔領了新的根據地。一八五四年，英國人掌握了上海的稅關，其次是中國所有的海關。上海·香港·接着是其他的港市，轉化成地主及商人的避難所，他們從動亂的地方流入這些地區，受到外國人的保護。於是反動想從這些地點中組織與反軍的鬭爭。一八五六年，勃發了新的對華戰爭，在這戰爭中，除去英國之外，也參加了法國。因爲法國想利用國內戰爭的情勢而在中國獲得支配底地位。成爲這次戰爭的動機的，是中國官憲逮捕了懸掛英國國旗的中國船隻。  
(「亞羅」ARROW) 因此而把這事件喊作「亞羅戰爭」。(英國人封閉西河後，在一八五六

年佔領了廣東周圍的要塞。但是，在中國作戰的發展，由於印度土民兵的反亂而被阻止。到一八五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英國人方才能佔領廣東。一八五八年，英法艦隊在北方的白河口出現。一八五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及二十七日）在天津與英國及法國之間簽訂條約，因此，爲通商而開放了一聯新的港市（鎮江·九江·漢口·台灣的兩個港口·海南島的瓊州）中國賠償賠款四百萬兩，允許各國的使臣在北京居住，保障保護傳教師。然而在一八五九年，當英法艦隊開赴天津途中，受到大沽砲台的砲轟，因此而重又發生糾紛。一八六〇年八月二日，增強了的英法聯合軍在大沽近旁的北塘登陸，從背後奪取大沽要塞，再將天津進佔，一八六〇年十月十三日，終於佔領了北京。

中國的敗北，顛覆掉咸豐帝死後所支配着的對外國人取不妥協底立場的理藩院。變革的結果，由光緒帝及咸豐帝未亡人——後來所謂西太后的——掌握到權力。新政權所簽訂的北京條約，使對各國增加賠款八百萬兩。天津爲通商而被開放了，而英國人更使九龍半島與香港合併，爲航行外國船隻，揚子江也被開放了，中國與英法的交涉中擔任調停者任務的俄國代表伊格挪梯也夫（Ignatiev），於一八六〇年依據條約，鞏固了俄國在烏蘇里邊境地方的地盤。一八五一年六月十二日，中俄之間已經簽訂過愛璦條約，由於那個條約，俄國在黑龍江以北的地盤早被鞏固。而鴉片的貿易，由了一八五八年在上海所簽訂

的通商協定，事實上已被合法化了。在亞細亞及中國與英國互相競爭的帝制俄國，對於北京朝廷，提議對鎮壓太平運動願作軍事底援助，可是這個提議遭到了拒絕。使滿人政府屈服自己的要求，而在北京已佔得有力地位的英法兩國，終至格外積極地參加與太平運動的鬭爭。

由戈登 (Gordon) · 華爾 (Ward) · 白齊文 (Burgwin) 等所編成的軍隊，和英國及法國的陸海軍協力，自一八六一年至六四年，在杭州 · 南京地方以及將上海作為頂點的三角形內進行作戰，以歐洲式火砲的威力，在這地域中掃蕩了太平軍。在寧波及杭州的地區中，由法國將校所編成的部隊從事活躍。其他的許多地點中，各國為鎮壓太平軍而給與軍事底援助。滿洲人僅由於英國人的支持，保持住廣東市而已。外國人，主要的是英國艦隊，與太平軍在揚子江的鬭爭中，援助了反動集團。

法國艦隊在芝罘和反軍戰鬥。英國將校在天津為與反軍鬭爭而組織軍隊。一八六四年，與南京陷落同時，在揚子江的騷擾遭到了鎮壓，太平軍的殘黨趨向汀州 (福建省)，從那地區，在一八六五年向廣東及江西的山嶽地帶四散。

從上海到印度支那境界沿岸地方的騷擾，主要是由三合會所指揮的。上海 (一八五三年) 以及廈門 (一八六一年)，被這會所佔領了。在北部，從一八五六年以來擴大了捻子 (捻

匪)的騷擾，在河南及安徽與太平軍互相聯絡。

在陝西及甘肅省，一八六二年以來發生回教徒的叛亂，後來佔領了中國土耳其斯坦，在那裏樹立起獨立的國家。可是到一八七七年終被平定。西南部地方為被治各民族的運動所掩蔽，雲南自一八五六年<sup>①</sup>以來雖曾樹立過回教徒的國家，但被中國軍在一八七三年<sup>②</sup>漸次滅亡。太平軍的騷擾擴大到四川省，一八六一年太平軍的一員武將——石達開曾經到達這個地方。他於一八六三年（岷江渡河之際）在這兒嚐到失敗的理由，卻首先由於政府軍對於石達開是利用了移居西部四川的諾斯族（羅羅族）底武將的緣故。石達開底軍隊的一部，在陝西和回教徒的反軍結合。

七〇—九〇年代的中國。從一八三九年到一八六〇年止，在中國的列強戰爭及為列強所強化的經濟底及軍事。政治底侵入，與這時期國內激烈的階級鬭爭互相交錯，列強在這鬭爭之中，是作過最積極的參加的。一八三九—六四年的二十五年間，是國家的對外底、對內底狀態中發生最深刻的變化的轉換期。在與農民及庶民的反亂的共同底鬭爭

① 指烏魯木齊·吐魯番等名城所在地，天山南北西路的區域（？）。

② 清文宗咸豐六年。

③ 清穆宗同治十三年五月。

過程中，於外國人的支配與封建商人底反動取得緊密的關係下，而被安置了各個基礎。舊商業關係的斷絕、歷史底工業中心地的破壞，在同樣開港場所——外國人支配的支撐點——的新中心地的同時地強化等等，這些一切，爲着崩壞傾向愈加大而成長而奠定了基礎。各港市中產生了買辦。在與騷擾的鬭爭過程中，國家大部分地域的權力都移向作爲勝利者的中國軍地主集團的掌握裏去了。中國民衆的農業底及民族底反亂，由着土著的反亂與侵佔進來的外國資本的同盟而受到鎮壓的結果，不平等條約，形成了因列強使中國國土隸屬化——那已經是開始了——的過程，而且鞏固化了。

到七〇年代，在中國作爲歐洲資本的主角的「欽定商人」已經從舞台上隱沒了影子。歐洲的各銀行在中國出現（二八六五年的香港·上海銀行<sup>㉑</sup>）了，作爲產業家的代理者，在銀行的援助之下經營商業的商人，終於成爲典型底主要角色。汽船航行的發展，蘇彝士運河，其次是電信，使中國和歐洲及美國接近，打破了有從前典型的商人的獨佔。然而，歐洲的纖維商品，對強勒的國內底農民工業發生衝突，致使對中國市場開拓販路感到甚大的困難。相到一八八五年，棉製品的輸入才能有顯著的增大（一八七一年<sup>㉒</sup>—二千七百萬兩，一八七八年<sup>㉓</sup>—一千六百萬，一八八五年<sup>㉔</sup>—三千一百五十萬，一八九一年<sup>㉕</sup>—五千三百三十萬，一八九八年<sup>㉖</sup>—七千七百六十二萬），以及歐洲商業的總量的增大（一八七一年—一億三千七百萬，一

八七八年——一億三千八百萬，一八八五年——一億五千三百萬，一八九一年——二億三千五百萬，一八九八年——三億六千九百萬）而漸行開始。鴉片戰爭與獲得利權的鬭爭時期之間的時期裏，列強對華關係，毫無間斷地不能脫離掉干涉，而這干涉還採取了各種各樣的形態，有時甚至還不辭施行武力行動。不絕成爲外國人干涉的機緣的，是蔓延國內的傳教師的行動。

到九〇年爲止，英國在歐洲世界與中國的關係中，佔據着支配底地位。依據芝罘會議，（一八七六年十月十三日）英國使爲外國貿易開闢新的四港，爲在揚子江裝卸貨物而開放六港。在七〇年代，英國人雖在西部中國從事積極底活動，可是中國土耳其斯坦的騷擾，成爲俄國軍事底佔領伊犁邊境地方的機緣。這地域的大部分雖已歸還中國（依據一八八一年的彼得堡條約<sup>④</sup>）但中國對俄國賠償費用，給與陸上通商上的特典。

① 清穆宗同治四年。即豐臺銀行。

② 清穆宗同治十年。

③ 清德宗光緒四年。

④ 清德宗光緒十一年。

⑤ 清德宗光緒十七年。

⑥ 清德宗光緒二十四年。

⑦ 清德宗光緒七年一月。即伊犁條約。

一八八四年，法國和中國開戰，合併了東京以及安南（依據一八八五年的條約）。第二年，英國合併了緬甸。這樣一到九〇年代，其他各國也與英國相並，作為英國的競爭者而在中國活動，一八九〇年的初期以來，德國也加入在內，開始成功地向外國市場擴張勢力。

在六〇年代的反動的勝利，使軍事底恣橫的制度普及全國，使農民的地位極度低下。十九世紀後半期中，在歐洲商業的影響之下，商品||貨幣底各關係成長的結果，終於債奴化強度地普及起來，租稅、地租也增大了。爲着家內工業、手工業、舊運輸體系業已凋落、衰廢的緣故，以致農民、手工業者以及苦力的地位，愈加低下了。然而一方面，與歐洲商業相連繫的中部及南部中國的地主及商人特別地富裕起來，浙江及廣東的商業資本及高利貸，打破了山西的商業||高利貸資本的霸權而強化了。買辦愈加成爲有勢力的商人集團。法國和中國的戰爭後八〇年代，土著工業已經開始發展了，可是那大部分，卻是半官底企業或是與政府緊密地連繫着的企業。

從太平天國到日清戰爭之間，是李鴻章在政府中擔任主要的人物。他是安徽省軍部的首長，在三十年之間，一手掌握住歐化的陸海軍、對外貿易以及對外政策的監督權。他統轄着直隸省·山東省以及包括上海地方的一聯的各省。

北京朝廷僅在北部，多少地保有實際底統治權而已，於是，不得不與李鴻章的霸權進

行和解李鴻章一派也支配着中國最大的各種企業（開平煤公司、直隸省的鐵路——與英國人合作。——中國商船、染織工廠）。李鴻章對與歐洲商業及買辦相連繫作為背景的地主及商人集團，便傾向到自己的經濟底層政治底利益，由於歐洲勢力的強化受到侵蝕的支配階級各階層，在揚子江流域各省（除去上海）支配着與李鴻章相競爭的湖南派那邊去。這一派，到九〇年代為止，帶着排外底性質。

中國的移向帝國主義的支配。一八九五——一九〇〇年<sup>①</sup>的政治底危機。日清戰爭中中國敗北的結果，簽訂了下關條約（一八九五年），由此，中國對朝鮮拋棄主權，對日本割讓遼東半島、台灣以及澎湖島等，付出賠款二億兩，新開放一聯的商港（沙市、重慶、蘇州、杭州）對外國人供讓在中國國內創始工業企業的權利。俄國、德國、法國的干涉，使日本增加賠款三千萬兩作為代價，而對遼東絕念；俄國作為這個「保護」的代價，獲得經由北滿的鐵路敷設權（一八九六年八月二十七日）也為保障償付日本的賠款而交與中國四億法郎的借款，以這手段獲得左右清朝的權勢。法國主張從東京到廣東敷設鐵路是自己的權利。一八九七年，德國藉口本國的傳教師被殺，佔領了山東省的膠州灣。同年，俄國獲得旅順及大連二十五年間的租借權，以及從東清鐵路通到旅順港的敷設支線的權利。

① 清德宗光緒二十一年——二十六年。

英國將山東省的威海衛，法國將廣東省的廣州灣，各各加以「租借」。這時期裏，歐洲各國也獲得了各大鑛山的權利，（俄國在滿洲，英國在直隸，河南以及山西，法國資本家在雲南，又與英國資本家在貴州合辦。）同時，列強又互相依照與中國間所簽訂的協定，試將中國的全處領土作為自己的「勢力範圍」而予以確立。那是俄國於伸手華北的意圖之下，在滿洲，德國在山東省，法國在雲南及廣西省，英國在揚子江流域，西部中國及廣東省，日本在福建省，意國雖於一八九九年想要獲得浙江的三門灣，可是得不到他國的支持，終於失敗。這樣在一八九五年以後，中國的移向帝國主義的支配，已經完成了，在這各項條件之下，全國底政治底危機，重又掩蔽了國土。

中國的排外運動的昂揚，已由俄國的佔領伊犁及法清戰爭而被喚起。日清戰爭中中國的敗北以及分割國土的威脅，又使中國社會的所有集團積極化了。為着負擔賠款、軍費、借款，致使地位更為低下的農民及都市底極貧階層，從一八九七年以來，在各處發生行動。這些行動雖然通常的帶有排外底性質，可是同時，那在於支配階級，卻是一種威脅。國土分割的危險及大眾運動的成長，強化了以清朝作為首腦的反動底、反歐洲底各項要素。在另一方面，那促進了資產階級——國家主義的第一行動。（康有為的改革）改革論者要求普及歐洲底技術，獎勵工業，近代底運輸、農業以及商業，學校及行政廳的歐化，認定這是確立中

國的民族底獨立的途程。

日清戰爭中敗北的結果，於李鴻章業已失勢的北京城，改革派在一八九八年掌握了百日間（一八九八年五月十一日至九月二十一日）的政權。他們得到一批歐化了的知識份子、與地主及歐洲商業相連繫的商人、以及產業資產階級之間的支持。後來因自由主義底各要素而分離，形成獨立的民族革命底陣營的孫逸仙型的民主主義知識份子，也參加了革新運動。九〇年代中中國的革新派，並不想依據大衆。以西太后爲首腦的滿人反動派剿滅革新論者，將他們中的五人處刑，幽禁作爲他們的保護者的光緒帝。朝廷對意大利所取的強硬的立場，使反動底宮廷派的地位鞏固化。那些代表者們於各地支配着在北部各州的大衆底排外運動，試行使那副諸自己的目的，這樣，使這運動的一部分容易展開。然而那在本質上，對於由列強及中國封建諸侯的支配所形成的各條件，出現的是廣汎的農民及庶民大衆的自然成長底抗議。

一八九七年以來，在帝國的各地方相繼地發生了大規模的騷擾（一八九七—一八九八年在安徽·江蘇·河南的騷擾，一八九九年在浙江·一八九八年的廣西·一八九八—一八九九年在四川）。在北部地方的大衆運動是由拳匪（義和團）所指導的。所謂義和團的，在中國是從古代就存在的，曾經成爲「白蓮」會的一派的祕密結社。最初，義和團的運動，在某種程度上是受

到德國人侵入山東的刺激，因而在這地方展開的。那以後，運動蔓延到直隸及山西省，更擴大到河南的一部以及滿洲。到一九〇〇年夏，正如文字所形容的幾百萬的農民及庶民參加的義和團運動，將直隸全省投進在那漩渦之中。甚至清朝的一部分官兵，也成爲這義和團的同情者了（如董福祥）。所謂要與運動對抗是不可能的的意識，以及列強對大沽港的攻擊，使清朝將運動合法化，終至試行利用這個使對各外國進行抗爭。義和團在一九〇〇年五月，佔領天津及北京城，破壞鐵路，包圍在北京的外國公使館，在天津的外人居留地。列國的佔領大沽之後，（六月十六日，）清朝對列國佈告宣戰。清朝的影響與華北的落後相俟，在運動指導中反動底各要素的強化附加了條件。但是，這運動又與活動的基本底各勢力相呼應，無論對於帝國主義或是封建底支配，也加以對抗。參加運動的大衆對於支配階級出身的同盟者，表現出了不信任與非妥協性。義和團員想把對於權力及有產者所面臨的自然發生底各方策，改成有組織性的。義和團有時想直接打倒權力，有時也對那加以監督。同時義和團的一部指導者們，一邊和外國人鬭爭，一邊又想保持與歐洲人的通商關係，對於歐洲的新文化並不發揮盲目底敵意。（例如在天津）運動的較爲革命底派別的分支，爲對運動賦與更深刻的社會底性質的鬭爭，即使在農村中也可以看到了。

中部及南部中國各總督，關於對反軍的共同鬭爭雖與列強完成協商，可是那使列強

可能將騷擾的擴大區域僅局限於北部。列強的聯合軍由提督西摩爾(Seymour)作第一次試探，但被義和團所敗而告終。結以後，便將天津及北京佔領，而使大懲罰軍直衝直隸省。清朝背叛了大衆，逃向陝西省西安。一九〇一年，由李鴻章與列國之間簽訂那所謂義和團議定書的有名的協定，因此，中國容諾償付賠款四億五千萬兩，在北京設定公使館保衛軍隊的駐在區域，破壞大沽砲台，承認由列國保護自北京至大沽的鐵路。義和團的鎮壓所以不會成爲直接分割中國的理由，祇在於列國間存在的各種矛盾，以及幾乎不持武器而對抗最新軍事技術的人民大衆底英雄的行動而已。與義和團騷擾同時，也勃發了在惠州的孫逸仙的行動，與在漢口以及大同的行動，成爲從大衆運動的中世紀底形態，移向意識底改革底——民主主義底鬪爭的發端。

## 文 獻

馬克斯·恩格斯全集 第八卷、莫斯科·列寧格勒一九三一年。國際概觀——第一概觀，一八五〇年一月三十一日以降的第一概觀。二一〇—二二一頁。第九卷、莫斯科一九三三年。中國及歐洲的改革。三一—三二八頁。生活的高價。二一九—二二四頁。又參閱同卷二〇四頁、二三三頁、六六一頁。第十卷、莫斯科一九三三年。三二二—三三三頁。第十一卷、上、莫斯科一九三三

年。

恩格斯：在中國的英國與俄國 一三三—一三八頁。馬克斯：中英糾紛 一四五—一四七頁。

巴麥斯頓內閣的敗北 一四八—一五三頁。英國在中國的殘酷性 一五四—一五七頁。

恩格斯：英國人新的遠征中國 一五八—一六一頁。同：波斯與中國 一六二—一六七頁。

馬克斯：迫切的英國選舉 一七九—一八二頁。同：鴉片貿易 三四五—三五二頁。同：中英間的協

定 三五三—三六二頁。

列寧：中國戰爭 全集第四卷 第三版六〇—六四頁。一九三一年。莫斯科·列寧格勒列寧及斯

大林底其他論說及第三國際的記錄。

V·V·巴爾特里達：歐洲及俄羅斯的東洋研究史 第二版、列寧格勒一九二五年。

M·維紐珂夫：近代中國概觀 聖·彼得斯堡 一八七四年。

V·戈爾斯基：清朝之興起與初期的事業 北京的俄國傳教士會員集體勞作、第一卷、聖·彼得

斯堡 一八五二年、一一—一八八頁。

P·格利耐維契：中國封建制度史的諸問題 「中國諸問題」一九三五年、第十四號、同義和國

反亂——「中國諸問題」莫斯科一九三四年、第十三號。

V·格魯培：中國的精神文化 德文本的俄譯。聖·彼得斯堡 一九二二年。

I·薩哈洛夫：中國的土地所有 北京的俄國傳教士會員集體勞作第二卷 聖·彼得斯堡 一五

八三年、一一—九六頁。

莫那甫·耶金夫（卞秋林）：成吉思朝初期四代之汗的歷史 從中文的翻譯 聖·彼得斯堡一

八二九年。同中國的市民底及道德底狀態 四卷 聖·彼得斯堡 一八四八年。

A·V·伊凡諾夫：王安石與他在十一世紀的改革 聖·彼得斯堡 一九〇九年。

V·伊凡諾夫斯基：關於西南部中國的異民族史資料 第一卷 聖·彼得斯堡 一八八七年；第二卷 聖·彼得斯堡 一八八九年。

E·育爾克 古代中國的社會組織諸原理——「中國諸問題」 莫斯科 一九三〇年 第二號。

馬卡爾特耐伊：一七九二年·一七九三年·一七九四年所試中國內地及韃靼旅行記 法文本的俄譯 四編 莫斯科 一八〇四年。

H·杜爾綏維契：中俄間的使節及通商關係（第十九世紀止） 莫斯科 一八八二年 太平天國

革命諸問題——「中國諸問題」 莫斯科 一九二九年 第一號 四〇三—四一八頁。

P·I·奧西波夫：關於中國古代社會的奴隸制（「先資本主義社會史諸問題」 莫斯科—列寧格勒 一九三五年 第七—八號）

馬可·波羅：「威尼斯的貴族 一二八六年在韃靼以及其他東方各國旅行記」 三冊 聖·彼得

斯堡 一八七三年。（中國——二冊。「廉價普及版叢書」 一八七三年 一—四號。）

A·魯達可夫：義和團與最近遠東各事件之意義 海參崴 一九〇一年。

M·克拉波維茨基：明朝沒落時期諸事件 北京的俄國傳教士會員集體勞作 第三卷 聖·彼得斯堡 一八五七年 一—一〇二頁。

- Andersson J. G. "Preliminary report o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Kansu Mem. of the geol. survey of Ch., Peking 1925.
- Bland J. O. P. and Backhouse, E. 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 Boston, N. Y., 1914.
- Brine Lindesay Commander—"The Paiping rebellion in China, L. 1862.
- Bromhall M. Islam in China, L. 1910.
- Chao-Ting chi, Key Ec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 L. 1936.
- Chavannes Ed. 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 5 vls, P. 1895—1905.
- Ferrand G., Voyage du marchand arabe Sulaymân en Inde et en Chine, Rédigé en 851, suivi de remarques par Abû Zayd Hasan (vers 916), P., 1922.
- Fishbourne E. G. Impression of China and the Present revolution, its Progress and Prospects, L. 1855.
- Granet M., La civilisation chinoise, P., 1929.
- Grousset R., Histoire de l'Extrême-Orient, 2 vls, P., 1929, 2tt.
- Latourette K. S., The Chinese, 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 2 vls, New York. 1934.
- Li Ung Bing, Outlines of Chinese history, Shanghai, 1914.
- Lee Ping Hua.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 N. Y. 1921.
- Hirth F. and Rockhill W. W., Chau-Ju-Kua: His work on the Chinese and arabe trade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entitled Chu-fan-chi,

- S. Petersburg 1912.
- Krause F. E. P., *Geschichte Ostasiens*, 3 Tle, Göttingen, 1925.
- Legge James, *Chinese classics*, 5vls, Honkong, 1861--1872--2 rev. ed., 7 vls, Oxford-L., 1893-1895.
- Lin-Le, Ti Ping Tien-Kwoh, *The history of the Ti Ping revolution*, including a narrative of the auther's personal adventures, 2 vls, L., 1866.
- Mac Nair H. F. *Modern Chinese history--Selected readings*, Shanghai, 1923.
- Maspéro Henri, *La Chine antique*, P., 1927.
- Marcé Polo, *The book of M. P.*, The venetian concerning the kingdoms and marvels of the East. Trans. and ed. With notes by Hery Yule, 2 vls. 3 ed L., 1929.
- Morse H. B.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3 vls, L., 1910, 1918.
- Hsieh Pao Chao,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1644--1911)* Baltimore, 1925.
- Ross John, *The Manchus, or the reigning dynasty of China, their rise and progress*, L., 1880.
- Savina F. M. *Histoire des Miao*, Hongkong, 1930.
- Steiger G. N. *China and the Occident: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Boxer movement*. New Haven, 1927.

Smith Art., China in convulsion, 2 vls. N. Y. 1901.

Wen Ching, Chinese crisis from within I., 1901.

Yule H.,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4 vls. L., 1913—1916.

Wilson A., The "Ever victorious army . . . . .", Edinburgh and London, 1868.

P · 格利耐維契

## 四 一九二〇—二四年間的中國

帝國主義各國鎮壓義和團之亂以後，顯著的強化了自己在中國的立場。清朝終極地被隸屬於各外國，在收奪國土的工作上轉化成各外國的掌櫃。外國資本的投資在一九一〇年<sup>①</sup>幾乎已達到十五億美元。外國貿易的交易額化作兩倍，在中國愈加變成支付賬目了。與英國·帝俄·法國等等相並，日本也爲了獲得中國而積極地在鬪爭舞台登場，在對華貿易中佔到第一位。整個國土立刻被帝國主義列強的各勢力範圍所分割了。那是：滿洲由帝俄（一九四〇—〇五年<sup>②</sup>日俄戰爭之後，南滿洲被移到日本之手了）、山東由德國而揚子江流域由英國，西南部各省（雲南及廣西）由法國，各各分歸了。

美國雖對各勢力範圍反對公然分割中國（各勢力範圍之分割中國，被辦諸同伴之外，因此反對中國之受終極的分割），主張「門戶開放」，可是這所謂「門戶開放」，結果，除去要使全中國隸屬於美帝國主義之下而外，卻無其他可言。

① 清宣統二年。

② 清德宗光緒三〇—三一年。

二十世紀初頭，是以在中國的資本主義各關係的特殊發展，作為特徵的。中國的民族工業，由於帝國主義的阻止，主要在輕工業方面有了發展的可能，像煤業及金屬加工業，實質上卻是被握在外國資本的手掌中的；致使加上地主的支配、封建官僚底國家機構的抑制、因高利貸而債奴化、痼疾的農業恐慌、中國農業的更行沉滯、農民的貧困化、舊農產物（生絲、茶）栽培的退化等等條件。物價的急激騰貴，僅此一點也是使苦惱的中國勞動者，以及都市下層人民的地位低落下去了。

一九〇二年到一九〇五年的時期，是中國向資產階級底「更新」的方向繼續優柔寡斷的步伐的時期。一九〇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及二月十三日的詔敕中，被指示出新的方向。即是認識有跨上革新的道路，研究各外國的行政機構的體系，利用那經驗，改良國家機構，整備財政，強化陸海軍等等的必要。

為要把這些企圖——所謂倣效發展成資本主義底國家，改良中國的國家機構的企圖——的重要性，作誇張的指示起見，清朝在一九〇一年末，當從西安府回到北京時，甚至還利用了鐵路。然而，改革並不會觸摸到中國社會經濟底各關係的本質。那僅歸着於許可滿洲人與漢人的結婚，廢止纏足，創設多數為研究改革方案的特殊機關，任命一批大臣，組織電信機關而已。僅對軍事上的改革表示出較多的積極性而已。一九〇二年，於軍隊教育

實施了劃一制，對直隸（現在的河北）總督袁世凱，委任整編教育成歐式的部隊。一九〇六年，編成了六個師，一萬二千人的近代化軍隊（所謂北洋陸軍）。那以後不久，准許了至一九一一年為止，編成同一型式的三十六個師（三十六萬人）的計劃。

成爲中國趨向較爲積極底改革政策的重要的刺激的，是一九〇四—〇五年的日俄戰爭，及一九〇五—〇七年<sup>①</sup>的俄國革命。由於日本的勝利，使中國的政府內部加強了如果決心倣效日本的話，可能建設強盛中國的希望。一九〇五—〇七年的各項事件，對於中國民族底自意識的成長所及的影響，尤其強烈。那最初的發現，是與禁止中國向美國移民有關的美國商品的抵制。一九〇五年五月已經擴大於全中國大都市中的這個抵制，在上海達到了頂點。一九〇五年七月，已爲研究憲法制度而頒佈派遣特別委員赴國外的勅令，一九〇六年九月一日的勅令，便允准了實施憲法。

一九〇六—一〇年的時期，所充滿的是準備移向君主立憲制的種種改革。列寧所說的下面的話，指的正是這個時期：「尤其是日俄戰爭以後，中國成長了『新精神』及『歐洲底風潮』，是毫無疑義的事實，因之，從舊中國的暴動移向意識底民主主義運動，也是必然的了。」（列寧全集第十二卷，三〇六頁）。政府之下設置諮議機關（憲法院），由十一部構

成的內閣組織、省政治的改組（一九〇七年）、由各省、府、州、縣的召集專門協議委員（一九〇九年）、憲法大綱的公佈（一九〇八年）、公佈開設帝國議會（豫定一九一六年）準備工作上的計劃書、國民教育制度的改革（設立新的學校、大學、廢除舊試驗制度）、爲創設現代式陸海軍的積極活動等等——這所有一切，都是想由此阻止革命運動的政府所表現底胆小的革新運動。但是，爲強化朝廷與「人民」的關聯而被組織起來的各省諮議局，那些雖是被特別選出的社會底構成，（這些諮議局議員，是由佔人口百分之〇·三的特殊選舉人所選出的。）卻對朝廷採取反對派底立場。自由主義底、資產階級地、地主底反對派，將諮議局認作了是爲自己的支柱。

皇帝及西太后的突然，而且幾乎是同時死亡——一九〇八年十一月——的結果，致使朝廷內反動底集團的勢力旺盛起來。稱制的醇親王——幼帝宣統帝之父——被置於反對改革的朝廷內部集團底掌握之中。最顯著的革新論者袁世凱、端方等，便被逼下野了（一九〇九年）。到來了公然的反動，代替「立憲政治」。試將延期實行實施憲法準備計劃的（依照一九〇八年的勅令）政府，引起了三個請願運動，於是這運動在一九一〇年擴大到全中國，終於容准提早憲法實施期的要求，決定憲法自一九一六年提早在一九一三年，而內閣制度則於一九一一年初期實施。二十世紀初期，是反對清朝所形成的、反映民族革

命底陣營中思想的孫逸仙作積極底活動的時期。孫逸仙和他的一派與中會受到的敗北，並不曾挫折掉他要打倒滿人底支配的意志。一九〇五年，他主要是由日本留學的學生形成的政治團體中，組織了中國同盟會。同盟會的綱領，是在於打倒異民族朝廷，樹立共和制，建設將人民從資本主義解放出來賦與「幸福」的那種理想底社會組織。這綱領（所謂三民主義）是「由充滿崇高與英雄主義的中國民主主義者的主觀底社會主義的精神及綱領。」（列寧全集·第十六卷，二七——二九頁）所產生的，客觀上，僅不過是歸着到封建底財產的墳頭而已。中國的民主主義者們，「以關於資本主義『優先』的反動理論爲根基，想實施純粹資本主義底，最大限度上的資本主義底農業綱領」（同前，二九頁），但是，所謂這農業綱領，是歸着於由了意味着土地國有，以所謂「平均地權」的口號得以補足，要求對大土地所有者課稅，及「地價昂貴部分」的國有化的一點上的。

有極其複雜的社會底構成的中國同盟會，在一九〇五——一一年展開了絕大的活動。中國同盟會也和那先行者與中會同樣，組織過幾次武裝騷擾。這些騷擾，帶有軍事陰謀的性質，有時也達到相當的範圍，但都在失敗中終結了。

孫逸仙在那記錄之中，曾經將這一類敗北——但是那些在將各勢力集結於同盟會旗下，發生過很大的作用——舉出了十次左右。在各都市及軍隊內，通過同盟會的機關報

「民報」與外國回來的學生，廣汎地進行着煽動及宣傳的活動。這些留學生們回國後，對各學校及各大學中發生顯著的作用，使在學生生徒之間廣汎地普及孫逸仙的思想。進入近代化了的軍隊中的青年將校，獲得一批軍隊傾向於同盟方面，這些軍隊往常會有過反政府底行動。尤其中國同盟會於一九一一年三月末在廣東組織的反亂，是依據了對同盟方面抱有同情的部隊的。

就在一九一一年中國資產階級革命之前幾年，對於封建的壓抑、收奪、高利貸底債奴化、苛斂誅求，農民是以愈益頻繁的行動來填滿的。於二十世紀一〇年代末的自然底災害、飢饉等等，使大眾的生活狀態異常惡化。各都市中常常發生飢民的暴動，分散的農民騷擾，接踵的勃發着勞動者的擾亂。那是一九一〇年一月二十五日，嘉興（浙江）近旁勃發的農民行動，一九一〇年二月十八日，在金山（？）的動亂，三月二十四日在南京及安徽省南陵的米的騷動，一九一〇年四月，在湖南省長沙的大騷擾，在浙江省台州州的米的騷動，四月二十四日在浙江省上縣（？）四月三十日再是江西省（石城地方）五月二十四日在湖南省伊南（？）縣的農民反亂，七月二日在山東省萊陽縣，又於這一年的七月及十一月，在廣東省勃發了農民反亂，更於一九一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在漢口發生騷擾，受到外國陸戰隊的包圍，一九一一年三月，上海的浦東地方，發生各都市貧民層的暴動，同一九一一年三月，在

廣州市的同盟會的反亂，一九一一年四月，湖北省與四川省境界間的大反亂，五月在瀏陽（湖南省）的反亂，河南省的騷擾，甘肅回教徒勃發的大反亂。

一九一一年革命的前夜，已經可以看到關於無產階級最初行動的記錄。這些運動之中，首先應該指出的，是萍鄉炭坑夫的大規模的運動（一九〇六年）。即使在受到農民運動的影響，而且同盟會員的活動成功地進行了的軍隊之中，也蓄積了不少鬱勃的氣分。自由主義地主及資產階級各要素，終於也對政府的政策感到不滿。這一切成爲融融的火焰而終至燃燒的一個動機，是在於帝國主義各國重新佔領中國領土，然而中國政府對這並不作任何抗爭的一點上。

一九一〇年，關於外蒙古之被俄國，朝鮮之被日本合併，俄國與日本之間簽訂了協定。一九一一年初頭，帝俄對中國發出威脅底通牒，使北京政府完全屈伏。與俄國同時，無論英國（關於印度的境界問題），或是法國（不絕通過雲南侵入中國），都對中國進迫。以學生爲主動者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在許多省分中展開。對帝國主義各國武力抵抗的呼號與準備，「不惜一死」的義勇軍的編成等等——這便是民族主義底氣分的青年對於分割中國底威脅的回答。

這些反帝國主義的氣分，在有關鐵路國有的佈告，以及所謂湖廣借款上，是可以更明

瞭地發現到的。一九〇六年，各省政權獲得了敷設鐵路（漢口——廣東·四川·上海——杭州——寧波）的准許。鐵路的股份廣大發行了出來了。剷除各省的獨立性，使將來利用鐵道所得的收益集中於政府掌握之中的願望，通過中國中央政府，與想要管理鐵路網的外國金融資本的壓迫相並，終使頒佈了關於幹線國有的五月法令。收買鐵路的條件（股額百分之四五——六〇是現金，殘額為債券）對幾萬個股票所有者的利益，加以絕大的打擊。同時，政府還以這法令表出自身對人民幸福的關心，那是說：這是考慮試從為鐵路而強制底地租中解放人民，將在四川及湖南禁止徵收這種地租的結果。湖南省、廣東省、四川省一帶的人民都因這法令而大為憤激。抗議集會、請願等等，對於北京政府毫無效果。五月二十日，在四國（英·法·美·德）參加之下，簽訂了有名的湖廣借款（六百萬鎊），而那是投於敷設在外國人管理之下的鐵路的那借款的保障是湖北及湖南各省（湖·廣）的收入。這借款意味着將這兩省的最重要鐵道幹線讓渡到外國資本底掌握之中。一九一一年，在沸騰的霧圍氣下，因帝國主義征服中國的這個新的證明，並不是不會引起騷擾。運動在廣東省、湖北省、湖南省擴大，更在四川省釀成武裝的反亂。從消極的抗議形態（關閉店鋪及市場，拒絕納稅）開始的運動，不久之後，轉化成積極的鬪爭（編成義勇軍，破壞稅務署以及其他各官廳等等）。在四川省各地方勃發了農民的武裝鬪爭。九月上旬，製糖工廠的勞働者們參加了運動。九月

二十五日，報道出岩鹽鑛山勞働者的騷擾。政府方面的彈壓，以及軍隊向動亂的四川省出動，更助長了運動的氣勢。在九月上旬，全省的相當部分落到反軍的手中；到九月中旬，由於武裝起來的地方「民團」部隊，當作省之中心的成都被包圍起來了。然而，因了革命的缺乏指導，政府爲列強壓迫——若不平靜騷擾便拒絕借款的威脅——受到刺激而採取各種方策的結果，騷擾終於被壓平了。

一九一一年三月廣東市的騷擾鎮壓以後，同盟會就將活動中心移到武昌去，在那地方不久之後，獲得相當的據點，尤其是在軍隊之內。同盟會積極準備於一九一一年末在武昌發動武裝叛亂。然而，爲着對運動的成長極度狼狽的政府當局的彈壓，尤其是漢口地下團體所在的暴露（因炸彈爆裂所致）——那使政府當局得到他們的名冊——致使同盟會不得不從速起事。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夜，騷擾勃發了，頃刻間獲得警備軍的兵士，十月十一日攻陷漢口後，接着又將漢陽攻克，漢陽工廠的勞働者們，都積極地參加了這次戰爭。敷設鐵路的勞働者獲得了宜昌反軍選舉武將黎元洪就革命軍司令官的地位（同盟會最顯著的指導者黃興在十月二十日方才到達）。黎元洪在舉兵的第二天，對康有爲寄出這樣的信件：「滿洲人統治業將終焉，是爲必定之事實。現所發生一切，非余之力也。昨日之戰，將校雖未用命，而兵士仍奮勇屠敵追殺，而技師助彼破壞鐵路，男女則爲彼攜來飲食（數刻之後，

三都市及兵工廠、鐵廠、紡織紗廠，以及其他各企業，均爲佔領。此足以鼓舞全體士氣者也。人皆不願爲滿人，亦不欲加害自身之同胞。」

襲擊地方官憲的恐慌，他們試行依據的軍隊的脆弱，尤其是積極參加鬪爭的大衆的英勇行動，保障了騷擾的急速的成功。從十月到十一月，中國中部及南部的所有都市，有的參加了革命，有的離開北京，幾個省分宣告獨立。在上海陷落前夜，中央電信局的職工們組織了政治底罷工。勞働者們（外國新聞把這叫做「苦力」）襲擊兵工廠，奪取長槍五千挺，組織成和武昌同樣的勞働者糾察隊。（這勞働者糾察隊，後來被共和國政權解除了武裝。）十一月十二日，廣州市雖被「海賊部隊」及「逍遙法外」的人們所佔領，可是那使滿人廣東總督與地方諮議局之間所豫定的媾和協議發生了破綻。

佔領都市的勞働者及都市貧民，形成了相當部分的「獨立廣東共和國」的新軍隊。後來，想要解除這些部隊武裝的行動，引起了國內戰爭，「海賊」逃向省內，那以後，長期間地對地主及商人進行着恐怖的暴行。

通過各個都市，舊政權平穩地把地位讓渡給新政權，其中甚至有舊的總督而「被選」爲新政權底首腦部的人物。政權在很多的場合中，實質上移向了由反對滿人專制的資產階級及地主的代表者結合的，所謂是諮議局之手，而革命底各勢力卻並沒有他那自身的

組織。本質上，革命底各要素的幾乎是唯一的組織形態是軍隊，因而在革命的迅速勝利中發生決定的功效的便是軍隊。那不單是華南軍的軍隊指揮官及兵士，也正是主要的不知幾萬人流進革命的武裝戰士底隊列之中，在一九一一年末決定了軍隊的面貌的義勇軍。在戰鬪中對於土地空想獲得權利的武裝農民，淪落了的貧農，被奪去利益的苦力及職工部隊，許多工業中心地發生的武裝的勞動者部隊，對於王朝爲同盟會綱領而鬪爭的學生義勇軍——這些便是在一九一一年形成革命軍隊的各種勢力。大部分由「穿着破爛衣服而半飢餓底淪落農民」，由「完全無組織的，然而絕望的覺悟到死的大衆」組織成的，而且——依照帝俄駐華代表的報告——「以狂信者底勇猛心填補了技術的缺陷」的這個軍隊，方才能夠確實地保證反亂最初的決定底勝利。

到十一月上旬，幾乎是同時的，兩個共和政府——一個在武昌（黃興爲大總統·黎元洪爲副總統）。一個在上海（總督陳其美·伍廷芳等）——被樹立起來了，而且差不多都沒有經過鬪爭而獲得了革命者的勝利。兩者的任何一邊，作爲那第一個方策的，都是發表宣言，尊重關於列強在中國的一切權利及特權。如果說關於對內政策呢，那麼，問題僅止於「爲增進人民幸福」而廢除若干租稅而已。然而舊的政權倒崩了，誰都以爲要主張人民集會結社的權利，實現言論的自由，都沒有了妨礙，這一點已經有了很大的意義了。

對於武昌叛亂的最初的消息，使北京完全非常狼狽。金融恐慌，提取銀行存款，商業界的擾亂，爲使軍隊向南方出動的慌亂的政策——這是對於勃發的革命的最初的反影。朝廷爲着追求他那支柱，便向自一九〇九年以來就被疏遠的袁世凱依靠。十月十四日，他被任爲湖北及湖南的副王<sup>①</sup>。十月二十日更被任爲討伐革命軍的總司令官<sup>②</sup>。他得到在一九〇二—〇九年自手所編成的北軍的支持，由於任命自己親信擔任最重要的地位，而確定了自己在北方的地步。與這相關，在十月二十九日，北軍的指揮官們對政府發出宣告，要求實施立憲制度，若不然，對皇帝便不能保證軍隊的忠誠。海軍也贊成了這個要求。十月三十日，朝廷降服了；便允准實施憲法，併頒發大赦政治犯的佈告等等。

十一月一日，袁世凱被任爲總理（那是在十一月十八日由憲法院承認的）。十一月二日，作爲憲法大綱的十九條條款，已由憲法院通過。政府爲救援動搖中的帝朝而採取的這所有一切的讓步，僅不過是削弱帝朝而已。所以，任命袁世凱爲帝國全部軍隊的總司令官，實質上是對他送出了全部權力。

十一月，上海政府對各地方政廳通電，爲樹立共和國中央政府起見，應各派遣代表。十一月二十六日，攝政以幼帝之名，誓約對憲法忠順。十一月二十七日，馮國璋的軍隊雖從革命軍奪回漢陽，可是在十二月二日，共和軍佔領了南京。在這種情勢之下，無論是北方的專

制政府，或者是依據諮議局的資產階級地主底集團，驚愕於人民運動的成長與自己軍隊的革命化的南方共和政權，終至採取了趨向妥協的現實底形態。這裏，已經出現了贏得「中國自由」的「農民底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資產階級同盟」的矛盾性。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三日，由了漢口的英國公使的調解，結成一時間的和議，十二月十八日，在上海進行媾和條約，北方代表唐紹儀與南方代表伍廷芳相會了。列強代表爲促成妥協的行動，在下面所舉的意味上，收獲到了他底效果。那是：會議在和睦中終了，關於統治形態問題俟諸國民會議的議決，但在這集會之中，是毫無疑義地豫測到贊成共和制會佔優勢的。然而，這妥協條件不爲北京政府所容，唐紹儀被作爲「越權者」而遭召回（一九一二年一月二日）。與上海談判媾和同時，在南京舉行了以樹立中央政府與承認中華共和國憲法爲目的的會議。行將使會議決裂的各黨派間底激烈的鬭爭，在孫逸仙到達之下終息了，會議選他就任爲共和國第一任的大總統（十二月二十九日）。這事實，是袁世凱拒絕承認在上海完成的妥協的一個原因。孫逸仙在那宣言之中（一九二二年一月二日），作爲臨時政府根本任務而倡導的，是各省自治聯盟而持有強固中央政府的統一的中國軍隊的

○ 這裏應爲「湖廣總督」。

○ 欽差征討大臣。

統一及集權化，金融的恢復康健，確立「和平及安寧」，確立與其他國民的友誼。約定所謂樹立立脚於「社會正義」的組織，確立「平均地權」——這是孫逸仙及同盟會訴於民衆的最重要的口號。然而，多少是具體而又唯一的口號所謂「平均地權」——那雖然在與地主的鬭爭中，是表現農民的希望的——也依然沒有一些是被表現在南方政府的立法之中。

在南方（廣東省·湖南省等等）農民大衆對租稅及地租的繳納，廣泛地加以拒絕，發生了農民的游擊運動。同盟會（後來的國民黨）組織內發生深刻的分裂，對那左翼致力於提倡所謂「平均地權」的農民的口號，右翼卻抑制這個農民的口號，爲着「使黨內終止鬭爭」，或者是爲着所謂「發展工業救國」的口號，而作着行動。

人民運動在整個華南擴展。德國傾向於袁世凱以及專制的形勢，引起了大衆底抗議。在香港·長沙以及其他各都市的大集會中，議決：「燒毀到埠的所有德國商品，對所有都市分發佈告招貼，記明有購買德國商品者，不論何人，均得逐出祖國」。這種示威，後來於帝俄在蒙古作侵略行爲時，便重見反覆。

同時，在上海以及其他各都市中，出現了最早的勞工聯合會（上海兵工廠機械工人同盟會·香港印刷工人協會等等）。經濟底抗議的波濤，在所有的都市中擴大。在香港（一九一一

年十一月十八日起)，“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印刷工廠勃發的印刷工人總罷工，延長到整整的一個月。那以後，這總罷工更波及到三家外國報館，十家中國學生新聞紙，三十九家的印刷企業。罷工(與廣東市聯絡的)是由香港印刷工人協會所指導的。當英國官憲對香港勞動者的罷工企圖彈壓時，罷工者便拋棄香港轉到廣東去。勞動者們要求提高工資，支付罷工期間的工資，採用被解雇的全體勞動者。在中國的「人民」所提出的全然是出乎意外勞動問題。反動底出版物一齊攻擊勞動協會以及罷工運動。一九一二年夏季，「民立報」有那樣的記述：「革命以來，有資本蓄積者常怯於恐怖。西歐共產主義之教理，認罷工與破壞法律爲自己唯一之社會機能，因一部惡魔主義之人民而加強蔑視法律。」共和國政府在那開始以來，很想揭示穩和主義與尊重法律主義，來代替站到民衆的反帝國主義底、反封建主義底運動的先頭。因此，形成了爲着與反動妥協，爲着開始彈壓革命運動的各項前提。

蒙古利用中國國內所形成的情勢，於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一日，宣告脫離中國而獨立，可是那到一九一五年，方始爲中國所承認。在當時的北方，袁世凱依舊公然的繼續着軍事獨裁的準備。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北軍中四十六名軍隊指揮官與袁世凱取得緊密的聯繫，進迫朝廷要求廢除王朝。二月一日，爲着滿足「國民之要求」，發表了允准的詔書。

這樣，當廢除王朝的條件（保存尊稱，年金四百萬兩等等）得到容許之後，就在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廢除了自一六四四年以來便繼續着的滿洲人的朝廷。接着，在資產階級地主集團的壓迫之下，孫逸仙將大總統的地位讓給袁世凱而後宣言：「無條件服從民族底事業——以及毫無疑義為國家最忠實之僕人。」（為孫逸仙於二月十四日所書）

二月二十日，共和國代表為與袁世凱交涉而赴北京。於是，袁世凱允許到共和國的首都南京。北方的讓步（廢除君主制），是高價的犧牲購得的。那是，南方將自己軍隊的相當部分解除武裝。被解除武裝的，是在革命初期由農民、勞働者、學生等所編成的最急進的部分。同時，對大衆運動開始了大彈壓。共和主義者陳其美在上海（當時已和袁世凱進行着鬥爭）解散了兵工廠機械工人同盟會。關於這個，他在指令中這樣憤激地說：「機械工人將自己與所有勞働者比較，而竟自行主張非從資本主義底利用勞働力中解放不可」，而且，他們機械工人「固曾為革命提供兵器，但對功績歸於兵工廠官吏，則竟敢發表自己之不滿」，便是爲了這個緣故。陳其美更在下面的一點上責難勞働者。那是：他們「在兵士之間進行煽動」，他們「集合，提出不當之要求，而以罷工相威嚇」，因之，「於兵工廠內不得不禁止自由之同盟，及自由之批判」，便是爲了這個。

懲討隊開始派向農村了。這樣，於一九一二年六月，從汕頭來的報告，在惠陽縣的許多

地方，同盟會員指導之下而起的農民軍，與同是由同盟會員胡漢民所組織的懲討隊之間，進行着戰爭。袁世凱一邊揚言在自由主義底地主及資產階級集團所非常羨望的「法律與秩序」，作爲自己根本底口號，一邊卻首先在北京組織暴動，而聲稱這暴動「阻礙」了他的南京之行。一九一二年三月十日，袁世凱公然着手完成自己就任大總統的義務。孫逸仙把政權讓給了與封建底地主結成集團的自由主義資產階級底代表者。但是，這自由主義資產階級的政治家們，「和袁世凱同樣，極精於變通之妙。那是，昨天畏懼皇帝，在他之前跪拜，但在其次——一知道革命底民主主義者的力量，豫感到他們的勝利時——便背叛皇帝，而再到明天，又將爲與某種新的或是舊的『立憲底』君主交易而出賣『民主主義者』了。」袁世凱不久到達北京，於是，將在南京以唐紹儀爲首而樹立的第一次內閣的參議院，收在掌握之中。四月二十九日，在北京舉行國會。國會中各政派間的鬭爭——其中主要的，是「較爲工業底、較爲進步底、較爲發展底華南」的黨同盟會派，與「共和黨」也就是「華北」的官吏、地主、資產階級，也就是最落後的「黨（見前書）——使政府發生危機（一九一二年七月）爲同盟會會員的總理，反對斷乎走向獨裁的袁世凱而離開北京。其他同盟會會員的閣僚，也跟着他辭職了。其次的內閣，也不管同盟會派議員的反對，在袁世凱及軍首腦部的粗暴的壓迫之下獲得承認，而成爲大總統的傀儡。一九一二年八月，主要從自由主義集

團中的新會員而膨脹的同盟會與四個其他自由主義集團合流而形成國民黨，在那網領之中，排除了同盟會的革命底要求（特別是缺乏所謂地權的平均化的條文）。

國民黨在國會中持有非常的勢力，袁世凱準備普選，試行發見與這個黨妥協的道路。他以這個目的，招聘孫逸仙到北京，大事歡迎，任命他為鐵道總裁。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到一九一三年一月之間，實施了複選舉制，在四月六日—八日，由上院及下院——那中間國民黨佔着大多數——舉行國會。袁世凱爲了實現自己的遠謀，必需要金錢，但要到手這個，除去簽訂新的對外借款契約而外，沒有別的道路。一九一二年，他與四國借款團之間進行交涉，行將順利地完成了。袁世凱知道對外借款得不到議會的支持，（議會對一九一二年的比利時借款，就曾引起過猛烈的抵議。）交涉就獨斷地進行，使議會不得不在事後追認。袁世凱準備的彈壓議會之前，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國民黨議會指導者宋教仁在上海北火車站被人暗殺了。進行暗殺的線索是由於北京的派遣，以及犯人在獄中暗然死去，加強了對於大總統的疑惑。在這暗殺而緊張的情勢中，袁世凱與六國（先對四國，後又參加俄國及日本）之間，簽訂了所謂二千五百萬鎊借款契約，事實便更爲明顯了。一部分國民黨議員雖曾個人的對借款團代表們請願，要求停止簽訂該項契約，但是，無論兩院的正式抗議，或是重大的政治底複雜化，也未能阻止袁世凱及借款團的意志，四月上旬，借款契約

終於簽定了。「對華新借款，是違反了中國民主主義者的意志而被簽訂的。那是『歐羅巴』支援着準備軍事獨裁的袁世凱。——支配者底全歐羅巴、全歐羅巴——資產階級，與中國的反動及中世的一切勢力結成了同盟。」列寧在一九一三年五月的論文「落後的歐羅巴與前進的亞細亞」中，這樣地寫着。

袁世凱之與國會公然分手，他之認國會的議決爲「孩子的饒舌」而加以蔑視、獨斷地任命自己部下就各種地位等等——爲樹立公然的獨裁而暴露出袁世凱慾望的所有這些政策，促成了民主主義者的舉兵。一九一三年六月，孫逸仙示威地辭去鐵道總裁，到日本去以後，李烈鈞在江西省舉兵了。幾乎與這同時，廣東「都督」胡漢民宣告離開北京獨立。由此，展開了「第二革命」的端緒，急速地使七省投進那漩渦之中。在展開的鬭爭——那在上海地方更是頑強——中，所有的優越點都在袁世凱方面。他的掌握中有由於借款所賦與的錢不多是無限制的金力，他的軍隊有比南方軍裝備更爲優秀的兵器，而且兵員

○ 指蔡鈞、王芝祥領導的統一共和黨、王寵惠等的共進會、董之雲、許廉等的共和實進會、虞照等的國民黨。

○ 即所謂善後借款，應爲五國（英、法、德、俄、日）。而前面所提到的四國（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六月六日），實爲六國，後因美國退出，而成五國（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的數量也多，加之，列強還公然的支持着他（四月十一日，中華共和國由巴西及祕魯，五月二日由美合衆國與墨西哥所承認）。而南方軍單不過是依據一九一二年解除武裝以來，少數忠於國民黨的軍隊而已。右翼國民黨員並不支持左翼的孫逸仙，殘留在國會裏面，客觀上是對抗南方反軍，支持着袁世凱的。先前被右翼國民黨員直接協力之下，致使運動受到彈壓的大衆，卻未能爲這第二革命所吸引。然而，也因為那裏面，並沒有能觸摸到勞働者、農民、都市小資產階級的真實利害的、任何一種口號的緣故。一九一一年十月，左翼國民黨員對民衆的革命底創意上，固能依靠勤勞者的行動，但在這一次，自行鎮壓了這個民衆運動的他們，對於袁世凱的反動勢力，所能對置地提出的口號，單不過是「維持治安、擁護憲法」而已。這力的關係的結果，運動到了八月，便已傾向衰亡了。江蘇·廣東·湖南各省，廢棄獨立，三月二十六日，成爲反軍中心地的南京，就爲張勳將軍所佔領，不久之後，南方軍主要的都被張勳及馮國璋所擊滅了。這勝利，爲袁世凱清掃了公然趨向獨裁的道路。到八月初旬，袁世凱的勢力行將明瞭而毫無疑義地佔得優勢時，他就成功地使黃興·李烈鈞脫離了國民黨。

十月六日，他當選爲中華共和國的大總統（任期五年），那以後，共和國獲得所有各國的承認。十一月，由了大總統的佈告，國民黨受到解散，而那黨員——下議員及上議員——被奪去了自己的權利。這樣，共和國資產階級漸次被離開政權，而他們的政治底集團，也逐

漸受到消滅。殘餘下來的國會議員，在大總統的掌握中化成傀儡，於是，袁世凱利用了所形成的情勢中的一切利益。十二月，參政院樹立了，由於它那指示，議會以定員不足之故而遭解散（一九一四年一月十一日），組織成重行檢討憲政的委員會。在三月開始工作的委員會，於五月一日完成，同一天，發表了賦與大總統以全權的新憲法。

一九一一年——一三年的革命，並不會解決當面的任務。帝國主義各國的壓迫，自由主義資產階級的妥協底方針，農民的缺乏真的指導者（無產階級單不過向自己的組織跨出了第一步而已），條件致使革命的民主主義底（根本上是農民底）陣營脆弱化的國際情勢，以及中國的社會底各勢力的相互關係，保障了袁世凱的勝利，這樣，袁世凱就能巧妙地利用以孫逸仙為首腦的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底指導者的動搖與讓步。經過一九一四年年末，作為臨時議會而召集的國會，實質上，採擇了各種像承認軍事獨裁這一類的法案。（大總統的任期為十年，大總統本身有選定繼任者的權利，選舉的新的條件等等。）省的各自治機關被解散了，反對袁世凱的政治團體及政治結社也受到封閉。一九一五年，對於軍總督被改稱為將軍的大總統的直接隸屬，被法律化了，那以後組織成君主制的運動，結果，共和國的大總統，實質上已成爲立憲君主（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了。這個運動，是與袁世凱不絕準備促進變革的對外政策底各種事件，也就是一九一四——一八年的世界帝國主義戰爭及有名的「二十一條

要求」，是互相有關聯的。

大戰開始以來，袁世凱在所謂收回當時被德國佔領的山東省膠州灣的條件之下，支援英國參加大戰，而與英國開始交涉。但是，這交涉不曾成功，中國就宣告中立。山東的被日本佔領，引起了廣汎的抗議運動。日本趁各國忙於戰爭之中，想要鞏固自己在中國的立場，於一九一五年對中國提出意味着日本爲中國的保護國的二十一條條件的要求（尤其是那第五條，爲須聘日本人充任政治、財政、軍事等顧問，須將警察事務讓渡於日本人之手等等的要求）。連接對日簽訂協定的袁世凱的降服（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那在相當程度上滿足了日本最後通牒的要求——在中國國內喚起了新的動搖（這降服的日子成爲「國恥紀念日」）。君主制論者利用中國政府這種無力的新的發現，想展開君主制的煽動。大總統顧問的美國人古德諾（F. J. Goodnow）——他是主張君主制的——的報告文件（一九一五年八月）中，更強化了他們的立場。君主制論者創立自己的組織——「籌安會」，企圖由國內各地提出請願，要求實施君主立憲制。國會在君主制論者的壓迫之下，將關於政權的形態問題，議決由最近行將召集的國民代表大會（選舉是在一九一五年十月—十一月進行的）中加以審理。然而，這個議決，並不能使君主主義運動的首腦者們感到滿足，於是關於政權形態問題的議決，結果，委諸各省所強制選舉成的特別集會的投票。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這特別集會的大多數，贊成以袁世凱爲皇帝的君主制。但是，政府爲「論駁」所謂投票舞弊的責難，而不得不發表特別聲明。然而這一次，袁世凱的豫計失脚了。十二月二十五日，雲南省宣告獨立，反君主制運動立刻籠罩了中國的相當部分。許多有名的將軍（馮國璋、陸榮廷等），參加了這個被稱爲「第三革命」的反亂之中。一九一六年五月，形成了南部聯盟，受廣東軍務院的指揮。三月，由袁世凱任命的治安維持委員，拒絕執行他的命令，而且，對於他的反對運動成長的結果，他終於不得不廢止君主制（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了。

復活以段祺瑞爲首的責任內閣，以及免除成爲最大憎惡之的各政治家等等，這些袁世凱的讓步，也未能對他有所救助。南方要求袁世凱退職，可是當他突然的死（一九一六年六月五日）使事態爲之一變，終致因暫時底和解而中斷的鬭爭，又將再次勃發。依據憲法，接着他就任大總統地位的副總統黎元洪，允諾南方的要求（復活一九一二年的憲法，召集舊議會等等），於一九一六年八月一日，在北京舉行議會。

中國在世界大戰中採取中立的立場，對於發展中國民族工業，形成美好的各種條件。所謂民族資本所利用的決定底要因，是在於忙於大戰的各國削弱了經濟底壓迫。無論是日本的活躍強化，或是美國在中國的地步鞏固化，在總體上說，都不能使這好景氣發生本

質地動搖。那不但對民族資本獨立發展賦與了甚大的可能性，而且與輸入的減少同時，也形成了販賣商品的各種美好條件。輕工業的發達，雖於戰時特別顯著，可是中國經濟的這種變化，當然，未能從最重要的工業各部門中驅逐外國資本，而且，基本底經濟底扼要底各部門，還依然被握在後者的手掌之中。可是，雖然如此，民族資本的成長，尤其是戰時中無產階級的數量的增大，促進了龐大的政治底結果，於是，這政治底結果，就在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中全力地發現了出來。

一九一六年以後，豫測到軍事行動進行中的轉換，戰爭成爲持久戰，當面臨到所謂聯合國利用中國資源問題的結果，前者終至對中國提議參戰。在聯合國方面的壓迫之下，中國在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sup>⊖</sup>對德國及奧國佈告宣戰。作爲中國參加聯合國方面的代價，所得到的允許是：延期（五年）支付對義和團事變的賠款，提高關稅率。在另一方面，中國也答應對同盟國方面供給必要材料，以及提供爲服役戰線的勞働力等等。實質上，中國對戰爭參加的極少，僅出動十三萬的勞働者，以及以後在西伯利亞名義上是對於在那地方作戰的德國俘虜，實質上卻是對於蘇維埃政權，與日本採取了共同動作（依照軍事協定）而已。那雖然對中國賦與了與其他戰勝各國共同參加和平會議的權利，可是在實質上，卻使中國格外隸屬化了。

袁世凱死後，在中國國內進行的鬭爭中，起着更大的作用的，是反動的軍人。各地方的整個權力被集中在總督（後來的將軍）的掌握中，在袁世凱死後，以及代他而起的中央政府崩壞之後，持有了特殊的意義。以封建底殘渣的支配、封建底地方分權制及半殖民地底地位作爲地盤，中國的軍閥有了旺盛的繁榮，於是，這繁榮出現在「督軍制」——根據一九一六年以來成爲將軍稱呼的「督軍」底語文上——的制度之中。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中指摘出：「一九一一年半途而廢的革命以後，所產生的國家權力的中央機構的崩壞，及國內一大部分中國軍閥樹立的軍國底組織的支配」，是有極大的意義的。各督軍以依據了中國經濟的落後，以及在他们掌握中集中的軍隊，不單是在「自己的」省內，就是在北京罷，也漸行成爲命運的支配了。

黎元洪就任大總統，馮國璋成爲副總統以後的政府，所謂是被置在北方軍閥的掌握之中了，於是在這北方軍閥之中，存在了兩個派別——以馮國璋爲首的直隸派，以及總理段祺瑞爲首的安徽派。「第二革命」以後變更自己的名稱，喊作「革命黨」的「國民黨」，進行反對中國參戰的鬭爭中，表現出與北方派，尤其是與段祺瑞的抗爭。段祺瑞的辭職，是議會對於贊同中國參戰的條件，與段祺瑞的鬭爭，到一九一七年五月，就帶上特殊緊張的

形勢。這當時，拒絕審議政府關於對德戰爭提案的議員們——依照段祺瑞所說——幾將被穿私服的北方軍閥兵士或將校羣所毆死。議會拒絕與段祺瑞協力的結果，閣僚們辭職了，終於由着大總統的命令將段祺瑞罷免了。黎元洪的撫慰電報也毫無效果，北方的各督軍還是宣言脫離北京獨立，並且提出解散會議，再行檢討憲法等等的要求，使自己軍隊向首都出動。在他們的壓迫之下，大總統雖然解散了議會（一九一七年四月十日），可是那引起南方各省猛烈的反對，於是，南方各省就組織成對北方軍閥的討伐軍。他們之一——積極的活動家督軍張勳，便實行一九一六年徐州會議的議決，於痼疾的政府危機各條件下，在北京敢行國家變革，使滿洲人皇帝——溥儀復辟（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黎元洪向北方派中有勢力的前總理段祺瑞求救。（段祺瑞在當時的天津，為與君主主義者鬭爭而成立了臨時政府。）變革後幾天，張勳的軍隊從北京被驅逐出來，黎元洪將大總統地位讓給馮國璋，「共和國救主」的段祺瑞就任總理，終得以自己的意志命令大總統。

一九一八年八月的選舉以後，依據新法律（一九一八年二月公佈），舉行「沼澤」或「督軍」議會，（那多數議員與他們形式上代表的各省，是全然沒有連繫的），於是選舉了與黎元洪相親的徐世昌為大總統。副總統的地位，卻因各軍閥間黨派的相爭，而成空席。

成為兩次被解散的「真」議會議員避難所在的廣州市，對抗「段祺瑞」議會而樹

立自己的政府（一九一八年五月）孫逸仙·唐紹儀·伍廷芳等擔任了主要的角色。這樣，南北成爲痼疾底鬪爭展開了它那端緒。對於強奪者——北方各督軍——以擁護憲法而鬪爭作爲旗幟的南方，無論對美洲合衆國的國會及其他各國的議會，或是彼得格勒的蘇維埃，都訴說出了自己的任務（根據憲法樹立統一政府及民主主義組織）。在最後的宣言之中，早就出現了我們「十月」的影響。被選舉的大總統徐世昌使北方軍停止攻擊，不久，倡言南北代表者舉行和平會議，選定上海作爲地點。這樣，幾乎經過一九一八年全年所進行的，主要使湖南·四川·江西·福建及湖北都投進在那漩渦之中的武力鬪爭，歸於平靜了——會議雖然決裂，可是軍事行動卻並沒有再次發生。然而，那因爲與凡爾賽條約及日本對華政策有關的新的問題，出現到政治生活的前面來了。

中國之參加大戰，是爲了要收回當時被德國所佔有的自國底領土。然而，一九一六一七年，聯合國承認日本在中國以前屬於德國的權利，甚至以前曾經對一九一五年五

○ 國會組織法及兩議院選舉法

○ 石井·蘭星(Lansing)協定 日本大正六年（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日本全權代表石井菊次郎

(Tajiri-kikujiro) 與美國國務卿蘭星之間所簽訂的協定。第一次世界大戰當初，德國爲牽制美國參戰而傳佈美日開戰流言，因此石井與蘭星交換備忘錄，申明關於中國問題美日兩國政策並無衝突，且日本在中國有特殊利益。這協定事實上由了美日參戰而失效，但至一九二三年四月經華府會議，始正式作廢。

月的中日協定，抗議過的美國，也由於石井・蘭星協定<sup>①</sup>，在事實上承認日本的要求是合法的。一九一九年的巴黎和平會議中，中國全權代表雖曾提出許多提議，要想撤廢各國在中國的特權，但那會議，卻拒絕檢討這些提議。日本要求承認自己對於山東的權利。威爾遜（Wilson 1856—1924）反對這個要求的演說，引起日本方面要退出這個會議的威嚇，美國才因此罷手。日本方面的勝利，是在凡爾賽條約的各有關條文（一五六及一五八）中獲得承認。由於聯合國方面的政策而被蹂躪的中國利益，對於受到民族主義氣氛所鼓舞的中國各集團，給與了極其強烈的影響，引起對日本及凡爾賽和平會議的廣泛的抗議運動——示威運動、集會、實業家的聯合（在上海・天津等地）在全國之內擴大起來了。運動在上海達到特殊的規模，成爲反日抵制日貨運動。站在這次運動的先頭的，是由了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的示威運動，因而啓發成全國運動的學生。工商資產階級層在大戰中使自己的立場鞏固化，以利用反帝國主義運動爲自己利益的目的，參加了這個運動。在中國，勞働者階級也參加了的這運動的過程中，學生的民族底同盟成長成強大的組織（將及幾十萬人），統一了中國資產階級層的民族工業聯盟，被樹立起來了。一九一九年運動的結果，中國不會在凡爾賽條約中簽字。而且，因所謂與日本有聯絡的一點而最受攻擊的一批閣僚，他終於不得不辭職了。

一九一九年的運動中發生最大效用的，是蘇聯勤勞者對帝國主義干涉的反帝鬪爭的模範。關於在蘇聯進行中的各事件的報道，雖是異常困難，但仍然克服了許多有意造成的障礙而傳到中國，卻是事實。我們的「十月」所及於中國的強烈的影響，是中國展開革命鬪爭的極重要的要因之一。尤其是，在所謂中國的共產黨的形成，國民黨的轉向大衆底民族底組織——那主要的是，由於持有革命氣氛的學生的流入——的點上，表現得最爲顯著。從這一瞬間起，南北的鬪爭就帶上了新的性質。可是，於一九一九—二〇年重建而再

○ 北京政府在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九月，和日本交換關於山東問題的文件中，無恥地簽了「欣然同意」的字樣，於是，巴黎和會遂據此無條件地把山東權利轉讓日本（因爲英、法、美諸國當時爲了要求中國參加對德宣戰，事先與日本有了默契，帝國主義者之犧牲弱小民族利益，以謀本身的妥協，是它的看家本領）。中國代表在和會中雖有嚴正的聲明，但日本以此問題如不獲解決，則退出和會相威脅。那條文是（第一五六條）德國根據一八九八年三月六日之中德條約及其他關於山東省一切協約所獲得之權利、特權、膠澳之領土、鐵路、鑛山、海底電線等等，一概讓與日本；德國所有膠澳鐵路及其他支線，暨關於此項鐵路一切財產、車站、店舖、車輛、不動產、鑛山及開鑛材料與附屬一切權利利益，讓與日本。自青島至上海至芝罘之海底電線及其附屬一切財產，無報酬讓與日本。（第一五八條）德國於和約實行後三個月內，將關於膠州之民政、軍政、財政司法等一切檔案、地券、契約、公文書，讓與日本。在同期間內，德國將關係前兩條所記權利、特權之一切條約、協約、合同等，讓與日本。

○ 中華民國八年。

度採用原來各樣的國民黨，在最初之間，對於所展開的反帝國主義鬭爭，不但不曾作指導底參加，甚至也不曾作積極底參加。孫逸仙主要地還在和軍閥結成同盟而與北方軍閥鬭爭，並不依據廣汎的民衆運動而從事組織討伐軍等等，繼續地練成他自己的戰術。然而，隨着中國的鬭爭益行進展——農民運動與勞働者運動的成長，共產黨的影響的增大，帝國主義者的壓迫，軍閥間的戰爭，南方各將軍的離反——這些一切，終於把國民黨推上了新的進路。

廣東政府樹立（一九一九年）以後不久，孫逸仙以及他最親近的人，便不得不向上海逃亡。那因為陸榮廷的廣西軍反對孫逸仙一派，而劫奪了對於廣東省的統治權。雲南督軍唐繼堯對舊議會的議員們，提議到雲南去，可是在他們未曾實現這個應聘之前，唐繼堯已在四川省確定了地位，宣言應以重慶市為舉行議會的中心地。但是，議員們並沒有到重慶去。那是說，南方的一個將軍陳炯明在所謂「廣東人的廣東」的口號之下，驅逐了廣西軍（一九二〇年十月），回復了南方立憲政府的政權。與廣東省的這個成功幾乎同時，唐繼堯將軍從四川被逐，接着終於不得不把雲南拋棄。一九二一年四月，廣東的議會選舉孫逸仙為中國的大總統。這樣，中國除去兩個議會——北京的及廣東的——之外，更有兩個大總統。安福系雖有他那親日的傾向，在一九一九年的運動以後，也將與日本簽訂借款協定關

係最深的一批閣僚作爲犧牲，而繼續地保持北京的政權。與安福系競爭的直隸派不絕利用反日的氣氛，和滿洲的各督軍所謂奉天派結成同盟，不單不因了一九一九年的各事件，而且還在想與南方妥協的嚐試失敗而被削弱的情勢之下，也對北京政府開始攻擊。攻擊是由了要求更迭徐樹錚而爆發的。然而，那因爲他組織了反直隸派的集團。可是，直隸派是以對抗「督軍支配」爲「議會主義」而鬪爭作爲口號的。大總統的讓步，引起安福派及「督軍議會」方面的對於大總統的壓迫，那結果，使直隸派的著名指導者吳佩孚獲得了交替。和這相應的是，吳佩孚以及屬於他一派的各將軍的軍隊，打倒了以張作霖爲首腦的奉天派，同時也打倒了以段祺瑞爲首腦的安福派。北京政府被安置在「直隸派」指導者曹錕和張作霖——所謂大元帥——底掌握之中。安福派的潰滅略削弱了日本的勢力，但與這同時，卻強化了英美帝國主義的立場。一九二〇—二四年<sup>①</sup>的最大軍閥間的鬪爭中，在遠東的帝國主義各國間，尤其是日本與美合衆國之間的，各種矛盾的衝折，格外顯明地被表現了出來。

帝國主義由了援助這個或是那個的軍閥集團，直接參加這些鬪爭，而獲得追求自己利益的可能性，「中國的反革命底各將軍的力量在於什麼點上呢？是在於他們的背後，站

立着各國帝國主義者，一切在中國的鐵路、利權、工廠、銀行、商業公司的所有者的一點上。」  
曹錕及吳佩孚掌握政權以後，便使督軍議會解散，於是在內部底欺騙底民族統一的口號之下，佈告出新的選舉（依據一九二一年的憲法）。同時，南方各省的獨立性也被廢除（一九二〇年十月三十日）了。但是在廣東握得政權而與這命令妥協了的廣西人，被陳炯明所擊滅，那結果，挫折了吳佩孚的計劃。爲着應付南方政府的重建，北京政府任命廣西人各將軍爲總督及督軍，可是那又使南方的武力鬪爭重新爆發。

一九二一年夏，吳佩孚極度地強化了自己的立場，佔領湖北省，宣佈出樹立國民政府的口號。張作霖對吳佩孚的勢力愈行強大而發生恐懼，由於組織以梁士詒爲首的新內閣（一九二二年十二月），確定在北京的自己的地位，與安福派互相連繫起來。

因着吳佩孚的反攻，張作霖的軍隊敗北了，向滿洲撤退，在北京的政權，便落到吳佩孚底掌握之中。在不能坐視反日底政治集團強化的日本的壓迫之下，和該國有連繫的軍閥奉天派（張作霖）及安徽派（段祺瑞）——與吳佩孚有往來關係的各督軍也參加了——終於對於成爲英·美金融團體爪牙的吳佩孚採取了協同動作，作全面的攻擊。孫逸仙也參加了這個團體。但是，那因爲他的政府的存在，對吳佩孚勢力的強大化，感到了威脅。一九二二年四月，開始了第一次奉直戰爭。吳佩孚鎮壓他的參謀部所在地河南省的騷擾，雖然

成功，可是另一方面，未曾得到陳炯明支持的孫逸仙，卻被奪去了與吳佩孚積極鬭爭的可能性。這樣，認為非常有威脅性的合從，事實上已經崩潰，而進行戰爭的，祇有由張作霖指揮的各督軍的軍隊（稱有十餘萬）而已。在北京——天津地方所展開的戰鬭結果，張作霖的軍隊敗北——這當兒，吳佩孚的一員武將馮玉祥有很大的功績——了，奉天派便向滿洲潰走。而使日本作若干讓步的華盛頓會議的議決，對於直隸派的勝利也有過某種程度的助力。直隸派掌握到整個權力，另一方面，張作霖卻宣佈了滿洲獨立。

由着容易地獲得勝利而增長勢力的吳佩孚，便着手鞏固這勝利的結果。他驅逐大總統，由黎元洪承接那個位置，一九二二年八月一日，在北京召集於一九一七年被解散的舊議會。在華中開始了猛烈的反動。這反動，在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的槍殺北京——漢口間鐵路勞動者，解散勞工聯合會、大量檢舉持有民族革命氣氛的青年等等舉動中，被反映得最為明顯。曹錕一派為使曹錕佔有大總統的地位，而對黎元洪開始攻擊，這一派以使用收買與陰謀，引起北京的警察對黎元洪進行罷勤，及示威運動（一九二三年六月九—十日），獲得成功。大總統從北京逃亡，可是卻於天津被扣，在那裏，直到受迫簽名辭去大總統地位方才終止。跟着他，多數的議員（大約二百人）也從北京逃脫。北京形成完全無政府的狀態，於是，在曹錕的前面，展開了走向大總統的道路。當時孫逸仙和陳炯明——廣東政府的軍部

大臣——之間，進行着鬭爭。孫逸仙擁護全中國底民族解放的任務，反對陳炯明所謂「廣東人的廣東」的分派主義的口號。那因為廣東的分派主義在當時的時機中，強化了封建軍閥底各種傾向，使帝國主義者可能容易地分割中國。當時，孫逸仙在不絕成長中的大衆運動的影響之下，採取了相當明確的反帝國主義底、反軍閥底立場。到六月，鬭爭帶上了極度緊張的意味。孫逸仙敗北了，受到陳炯明及與他協調的雲南各將軍的軍隊壓迫而逃亡。由於這個新的教訓，孫逸仙堅決地相信，有發現自己戰術的謬誤，以及新的道路與新的鬭爭形態的必要。

一九二二年末，孫逸仙關於對陳炯明的行動，與廣西及雲南各將軍的妥協，獲得成功。一九二三年一月，陳炯明放棄廣州市，在廣東省東部鞏固了自己的地步。二月，孫逸仙到達廣州市。（就在那以前，廣西派從這地方驅逐了由孫逸仙所派的胡漢民，可是孫逸仙依靠雲南的各將軍，將廣西派驅走）。那以後，他繼續着和廣西派的抗爭。與陳炯明鬭爭的雲南軍各將軍，不久之後與他妥協，商定追隨陳炯明向廣東退卻的軍隊，佔領都市，逮捕孫逸仙及其周圍的人們。假使陳炯明不破約而出乎意外地襲擊雲南軍的話，那麼，孫逸仙恐怕又不得不逃亡了罷。雲南軍攻擊陳軍，再將他追到東方。當保持着廣東省整個東部地方的陳炯明與吳佩孚連繫時，另一方面，孫逸仙招來爲吳佩孚趕出湖南的譚延闓的部隊，使他在廣州市對抗

雲南軍的各將軍。

這樣，到一九三三年的年末，孫逸仙據有廣東省的大部分，陳炯明佔領着那東部，張作霖在滿洲準備和「直隸派」的戰爭，曹錕把住「中央政府」，吳佩孚與大部分督軍相連結而將中部中國的支配權，收在掌握之中。是中國的反動底主要支柱的吳佩孚一派，爲與奉天派及在南方的孫逸仙的政府對抗，而作着準備。

自一九二二年終末到一九二三年初頭，勞働運動有了顯著的成長（這運動大略是在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積極起來的）。在中國的反殖民地地位的各條件下，勞働運動與反帝國主義底鬪爭的普遍昂揚，有了緊密的連繫。「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各國的第一期（大約一九一九—一九二三）勞働運動的高昂，作爲那特徵的，是與世界大戰之後所發生的、國民革命運動的普遍昂揚，有機地連繫起來的，於是，所謂對於由土著資產階級所指導的反帝國主義底鬪爭的利益，從屬了勞働階級的階級底利益」。在這一鬪爭之中，中國的勞働階級進了一個政治學校。一九一九年的上海罷工，一九二〇—二一年在染織工業、冶金工業、其他工業部門的罷工波浪，準備了一九二二年香港的海員罷工。受廣州市勞働者支援的海員們，雖然經過兩個月間的鬪爭之後，獲得了勝利，可是這個勝利，對於國內的勞働運動及反帝國主義運動上，是有着甚大的精神底意義的。在中國的勞働運動發展上，成爲轉換

的楔機的，是一九二三年二月，鐵路職工聯合會指導之下所進行的，在北京——漢口鐵路的罷工。吳佩孚的彈壓政策，促使鬪爭的擴大與銳化。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吳佩孚的兵士槍殺了罷工人員——因為他們這個罷工，是加入了世界無產階級團體的。從這一瞬間起，在與中國共產黨勢力的成長及鞏固化緊密地連結着的，中國的革命運動的發展上，開始了新的時期。

吳佩孚的彈壓政策雖然暫時的削弱了革命底組織，卻未能長時間地抑制共產集團的勢力的成長。一九二〇年，由分散的勞働者及小資產階級底知識份子所組成，而受我們「十月」的影響的中國共產黨，進行着廣大的地下鬪爭。作為階級的無產階級層的形成，以及在革命底鬪爭中協力理解着特殊的任務，卻也由於勞働者階級的鬪爭獲得指導權，於是在這鬪爭中，中國的勞働者們知道了他們的進路是「這個」而潛伏的形勢。

一九二三年的第三次大會<sup>e</sup>中，決定加入國民黨因為在這一階段，國民黨正是「一部分依據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底資產階級層及小資產階級層，而一部分依據知識階級層及勞働者的，在中國唯一重要的國民革命的團體」的緣故。到這一時期，國民黨急進化的過程被加強了。在這過程中發生主要的助力的，是反帝國主義運動的成長，勞働者階級的強化，廣東省內發生的各事件，以及蘇聯（一九一九及一九二〇年，蘇維埃政府在通告中聲明

了對華的態度）的思想底影響的大爲成長。一九二三年，由着國民黨及孫逸仙自身的聘請而被派到廣州市的M·鮑羅廷（Michael Borodin），受任國民黨的顧問。國民黨的改組工作，於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廣州市舉行的國民黨第一次大會的議決之中被表現了出來。爲大會所採取的宣言，威示着一個大的轉變，而這轉變，就於一九二四年在該黨的內部執行。那宣言裏面說：「國民黨爲一致協力鬪爭，且加速國民革命過程起見，對農民及勞働者提議，應加入國民黨。而國民黨與帝國主義及軍閥鬪爭，亦卽與壓制勞働者及農民之各特權階級鬪爭，因此，同時意味着爲解放勞働者及農民而鬪爭。」

由中國共產黨所揭出的與帝國主義的鬪爭，爲統一底民族解放戰線鬪爭的口號，這樣便成了國民黨的根本底綱領，於是國民黨在勞働者及農民運動以及共產集團的支援之下，異常地強化了自己的地步。國民黨改組以後所面臨的各項任務，在展開都市及村落的大衆運動，以解決農業問題作爲基礎而根本地提高農民的地位，創設自己的國民革命軍隊等等各種條件下，獲得了解決。其中尤其是創設軍隊全然是刻不容緩的事業。更且是，因爲那廣東省東部被置在陳炯明的掌握中，而又與他正在準備新的攻擊的情勢相關，以致成爲不可一日或忽的問題。以替國民黨創立忠誠的軍隊爲目的，黃埔軍官學校被建設

起來了，那在所謂養成新軍隊的指揮官及創立國民革命軍隊的事業上，發生了顯著的功。蔣介石被任爲這個學校的校長。這學校受到戰鬪的洗禮的，是在一九二三年的年終，這時候，黃埔軍校的學生隊在勞働者團體的支援之下，對抗陳炯明的軍隊，不但是對這進行掃蕩，而且還把廣東省內幾乎是全部都加以清掃了。這勝利在於國民黨，是證明孫逸仙採取的新政治方針的正確的、最明白的一個左證。經過一九二四年，廣東政府斷然的採取了新的政治底路線。孫逸仙對勞働運動採取的政策，助長了廣東勞働者的統一。尤其是在中國共產黨指導之下的廣東統一勞働協會，成爲第二次全中國勞働聯合大會的發議者。促進中國勞働者階級組織性成長的強烈衝動，是廣州市外國利權企業中中國勞働者職工的成功底罷工（一九二四年七月八月，那會受到政府的支援）。在孫逸仙政府的地域中，農民運動獲得了初次的成功。到一九二五年，包容二十萬人的農民同盟被組成了，於是在廣東省第一次農民大會中，議決加入農民國際。成爲這大衆運動的組織者及鼓吹者的，也是中國共產黨。

國民黨的這個政策，在帝國主義，其中尤其是依靠英帝國主義支持的廣東的買辦資產階級層之間，引起了兇暴的抵抗。被喊作「紙老虎」的廣東商團的武裝部隊——由香港·上海銀行<sup>①</sup>的總辦陳廉伯所指導的——對孫逸仙發起暴動，但政府因爲得到勞働

者團體及農民團體的支援，終於鎮定了這次的暴動（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五日）。這勝利強化了政府的地位，英國公然的干涉，被孫逸仙所推翻了。英國寄給孫逸仙的通牒（當時是麥唐納〔勞勳內閣執政的〕這樣地威脅：「若中國官方向都市（即對暴徒）開火，則駐此之英全體海軍，必將對此迅作行動」。孫逸仙以充滿激憤與鬪爭到底的決心，在那答覆中這樣指出：在這種行動之中，可以看出「欲毀滅國民黨政府之意向」。爲什麼呢，因爲那是「成爲反革命底各勢的抵抗中樞」的。於是他聲明：以消除「完成中國革命的歷史底事實上的主要障礙」，將斷然對帝國主義鬪爭到底。

孫逸仙對曹錕在北京掌握政權，宣言應征討軍事底侵略者，於是對張作霖、段祺瑞等等，發出呼號。然而，無論從反直隸派合從要與這樣大敵鬪爭的準備不足上來說，或是從所謂對蘇聯簽訂條件問題作爲中心的內部底鬪爭的原因上來說，這北伐行動一直被延期到一九二四年的秋季才止。中國的輿論再三地對蘇聯表示同情，因而，一九二三年九月，被派到中國的蘇聯代表L. M. 卡拉罕（Lov Michailovitch Karakhan 1889）的到達，受到中國民衆盛大的歡迎。但是，北京政府在列強壓迫之下，任何事件都阻止了協定的成立。與各國行動有關的簽署協定的延期——那早在一九二四年三月決定了的——引

○ 即匯豐銀行，這裏指的是該行廣東分行。

起強大力量的抗議，結果，在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終於和蘇聯之間簽署成協定。那是早在一九一九及一九二〇年由蘇聯聲明過的：依據平等互惠原則的協定。

緊張的中國國內政情，到一九二四年秋季，格外激昂了起來。因為在這時期的上海地方，浙江督軍的安徽派和江蘇督軍——吳佩孚一派——之間，開始了鬭爭。張作霖作擁護浙江督軍的行動之後，吳佩孚爲着防止張作霖的侵入，而將大軍集中在直隸及滿洲的境界。執拗的鬭爭並沒有特別的成果，到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二日，馮玉祥出乎意外地對吳佩孚舉起反旗，將自己的軍隊從戰線上退出，佔領北京宣言和平。吳佩孚逃亡了。馮玉祥佔領北京之後，將大總統曹錕拘禁，聲明參加民族運動。他的軍隊改稱爲「國民軍」。十一月末，段祺瑞到達北京後，議決爲解決極重要的國內政治底各問題，而召集會議。應請赴會的孫逸仙，雖然不滿於北京政府發表的各種聲明，但依然在吸引輿論傾向於廣東及國民革命底綱領的期待之下，到北方去。對於國民革命政府指導者所表示的凱旋的歡迎，顯示出國民政府的權威與力，以及爲中國的民族解散運動中心的廣東政府的勢力，已經是怎樣地成長起來了。

到達北京以後，這個偉大的中國革命家病了。要參加段祺瑞以「改組政權」爲目的而召集的軍官僚底會議的活動，在孫逸仙已是不可能了，再加上會議中所醞釀的內部

底鬭爭，終使這個會議發生決裂。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孫逸仙留下政治底遺囑與寄給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聲明書，雖然有過許多錯誤，但總之，複雜的然而而是明確的、偉大的革命家底生涯，至此告終了。

政治的遺囑之中，這樣地說：

「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孫逸仙給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聲明，這樣地寫着：

「余之思想傾於貴我兩黨之命運及我國之命運，諸君正確守自由共和國之同盟、及永生列寧對被壓迫各民族留下之明確遺囑。帝國主義之各大犧牲，行將由列寧之遺產，自種根於古昔奴隸制、戰爭與不平之國際秩序中，獲得解放及其意志。」

## 文 獻

列寧：中國的民主主義與人民主義 列寧全集第十六卷，第三版，莫斯科·列寧格勒 一九三

一年。同：委員會關於民族問題及殖民地問題之報告 同前書，第二十五卷，莫斯科·列寧格勒

一九三一年。

同：中國戰爭（義和團事變）同前書，第四卷，一九二九年。

- 同：中華共和國的偉大成功 同前書，第十六卷。
- 同：新中國 同前書 第十六卷。
- 同：落後的歐羅巴與前進的亞細亞 同前書，第十六卷。
- 同：亞細亞的覺醒 第十六卷。
- 同：世界政策中的燃料 同前書，第十二卷，「中國」三〇六頁。
- 同：關於中國革命 俄國社會民主黨普拉格會議的議決，同前書，第十五卷。
- 同：雖小而須善良 同前書，第二十七卷，「中國」四一五—四一七頁。
- 斯大林：馬克斯主義與民族殖民問題 莫斯科 一九三六年。
- 孫逸仙：中國革命家備忘錄。
- Lynn Jermyn Chi-Hung. "Political Parties in China," Peking, 1930. Recontruction in China, A record of Progress and achievement in facts and figures, ed. by Tan Leang-li, Shanghai, 1935.
- 孫逸仙：„30 Jahre Chines“ Revolution, ins Deutsche übertragen von Tsa-Wan, B. 1927.
- 同：三民主義 上海一九二七年。
- Sharman L. „Sun Yat-sen," N. Y. 1934.
- T'ang Leang-li, Wang Ching-Wei. "A Political biography." Peking, 1931.

## 五 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

革命的新的昂揚，是由了廣汎的反帝國主義底民族運動（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及同盟罷工，而被開始的。運動帶有持久底性質，那因為對於革命底各黨，在開展着的鬭爭過程中組織起民族運動的各勢力，與帝國主義以及他那中國的代理人的鬭爭中佔到優勢，而賦與了蓄積這些勢力的可能性。於第一階段，主要是對外敵尖銳化了的革命運動的規模，在這「廣東」政府的階段中，因着共產黨員的積極性，由了所謂民族解放統一戰線已被相當形成的情勢，而獲得了條件。這戰線，在國民黨（是無產階級者、農民、都市小資產階級、及非貴辦底民族資產階級各階級的同盟）中，及民族解放底廣東政府中，被形成起來了。

一方面，是無產階級的大衆底、反帝國主義底罷工——那裏面，由共產黨員所指導的勞働者，是作爲全國底對帝國主義的鬭爭的、極徹底的代表者、組織者而出現的。——另一方面，在中國領土的一部（開始是廣東省，後來在北方）上，所謂存在了同情人民的軍隊的情勢，部分地形成獲得了勝利的革命領土底地盤，於是這一些地盤，在全民族解放運動上，既成爲支撐點，也成爲統一中心點了。

引起「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各事件的大衆底鬪爭的氣勢增長，是早已在一九二四年就開始了的。在與奉天派的戰爭（一九二四年秋）中，吳佩孚軍閥敗北的結果，瓦解掉這基本底反動勢力在華中的地步與權威。

在北部，以馮玉祥爲首腦的獨立軍隊獲得成立，那與民衆運動及孫逸仙的廣東政府進向妥協的結果，使當時爲北方軍閥首魁的張作霖未能佔得優勢。所有的革命底各組織，一待孫逸仙到北京去後，就在舉行國民大會，廢除不平等條約及軍閥戰爭的鬪爭的口號之下，爲着廣汎的羣衆運動而加以利用。一九二五年二月上旬，作爲五月的同盟罷工的前奏曲，在上海開始了紡織工人的經濟底罷工，那逐漸地延燒到其他的工業中心地去。

但是，革命運動的昂揚，是不均等的。孫逸仙的死（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使北方的民族解放運動在短時間中削弱。張作霖和段祺瑞的相互之間固有內在底抗爭，也依然企圖協同地掃蕩馮玉祥的國民軍。同時在南方，雲南督辦唐繼堯受到香港的英國帝國主義集團的支援與指示，和廣西省軍閥（陳炯明·楊希閔等）結成集團，對廣州市的民族解放中心部開始攻擊。一九二五年三月—四月，廣州市內發生武裝底爭奪，使南方政府不得不到黃埔島的軍官學校避難。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的上海的各事件以及香港·廣東的罷工，使各勢力關係有

利地激發，趨向民族解放運動。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英國警官對勞働者及學生的和平示威運動——那是爲了上海的紗廠中，一個中國工人被日本職員槍殺而引起的抗議——開了槍。幾十個人成爲英國帝國主義殺人犯的犧牲。第二天，爲着抗議，上海勃發了同盟罷工，幾天以後，二十萬人以上的工廠勞働者參加了這個行動。加上手工業勞働者、職員、學生、商人等等，參加運動的人員達到五十萬人。六月一日，中國商人關閉自己的店舖，六月三日，中國人經營的銀行中止了工作。指導這民族底，反帝國主義底罷工的，在上海地方，是由勞働者、商人及學生中所選舉出來的代表統一委員。

運動的最重要的口號是——

處罰開鎗的主要犯，賠償損失，英國當局對中國政府道歉，撤換租界工部局的總秘書（魯和）中國人在租界內有言論、出版、集會的自由，廢除治外法權，外人經營工廠應訂定義務勞働立法，改善工廠勞働條件，承認有組織勞工聯合會及罷工的自由，永久撤退日本及英國軍隊，等等。

上海各事件，在整個中國國土內喚起極廣泛的反響。反帝國主義底解放鬪爭的全國底昂揚的情勢，鼓動起來了。馮玉祥公然發表自己支援運動的聲明。甚至段祺瑞也不得不提供十萬圓，作爲上海的罷工勞働者的基金。運動也向其他的都市中心地，像火花般地飛

爆開去。

六月中旬，英國官憲在漢口重又引起了事件，結果，在那地方也發生了罷工和示威運動。在九江的示威團燒毀了日本的「台灣銀行」。連帶的罷工也在北京·青島·南京·廣東以及其他各都市發生。到處成長了大衆的組織，羣衆運動及國民黨的勢力強大化了。六月十九日，在香港勃發罷工，接着於六月二十三日，在廣東進行大衆底民衆示威，這示威運動在沙面遭遇配備在外人租界的英國及法國水兵與警官的槍擊，被殺了五十二人，一百五十餘人受到重傷。帝國主義者在這新的犯罪之後，香港||沙面罷工轉化成了全體底罷工。幾十萬人的中國人勞働者以及職員，拋棄掉香港及沙面地方。革命底大衆各組織，宣言封鎖香港及沙面兩地。在這些中心都市的整個經濟生活，正變成像風前的燈火了。當拋棄香港的時候，勞働者提出下面那樣的要求：(一)採取上海勞働者提出的與五卅事件有關的十七條條件；(二)堅持在香港有結社、集會、印刷及罷工的自由，撤廢禁止中國人居住海岸；(三)確立中國人與外國人的平等權利；(四)實施勞働者的立法；(五)減低居住費用。

指導繼續到十六個月間的這個民衆運動（那受到南方廣東政府所支持的），是以共產黨員的海員領袖蘇兆徵作爲首腦的罷工委員會。那委員會將香港實施封鎖，檢舉封鎖的破壞者，監視貨物的輸送，參加廣東港的支配及海關的監督。還有，由那委員會組織成武裝

的（二千人以上）勞働者哨兵，創設了罷工人員公共餐室。

反帝國主義底民衆鬪爭，二千人以上的香港沙面勞働者之在廣州市及廣東省內集中（廣州市內殘留六千人其餘向農村各地分散，努力協助農民鬪爭及農民協會的組織開展）使南方的整個情勢革命化。受到大衆組織的支持，因共產黨員而積極化的廣東政府，於是益行對反動軍閥——英國香港政廳的代理人——開始了攻擊。

那是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廣州市事實上固然早已被置在雲南及廣西軍閥的掌握之中，但共產集團依然舉行勞働聯合會的第一次全國大會及廣東省各農民組織的第一次大會。

六月上旬，廣州市發生了新的軍事行動。六月六日，雲南軍宣告了廣東政府的滅亡，可是到六月十二日，經過頑強的鬪爭之後，廣州市重又落在國民黨的手中，於是，反動底軍閥的軍隊被解除了武裝。

指導對雲南軍及廣西軍作戰的，是指揮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的蔣介石。那香港沙面的罷工，強化了南方政府的地位，以致促進了它的改組。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樹立起來了，那中間，和共產黨員有密切交往的國民黨左派佔着樞要的地位，（政府要員——汪精衛（總理）·廖仲愷·胡漢民·譚延闓·于右任·張之江等）共產黨員強化全

省的農民協會的組織活動。農民鬪爭在減低地租、減輕租稅、組織農民自衛團等等口號之下展開。共產黨員獲得國民革命軍，尤其是黃埔軍官學校的一些重要支柱。廣西軍的反動底攻擊的危險，被排除了。那因為唐繼堯已經被李宗仁所擊退。陳炯明也被得到海陸豐地方農民協會支援的蔣介石所擊破。這樣，到了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在廣東的民族解放政府的權力之下進行廣東省的統一，而這個省從這時期以來，在民族解放運動的此後的開展中，成爲鞏固的地域底根據了。

廣東政府進行改編數達六萬人的國民革命軍隊，國民革命軍受到廣州市內武裝勞働者糾察隊及農村的農民自衛團的支援。可是與那同時，全省的地主底武裝部隊（所謂民團）成長起來了。

稅關的移交廣東政府，尤其是繼續中的香港的經濟底排貨運動，強化了政府的財政底地盤，使廣東有了經濟底繁榮。那因為，以前在香港進行的商業運營的大部分，被集中在廣東的緣故。這樣，便被形成了爲繼續實施北伐所需的物質底軍事底前提條件。

在那民族解放運動本身的胎內，勞働者及農民方面與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鬪爭，開始激化起來。廣東政府對共產黨固然容許公開組織勞働者及農民大眾，可是，一方面，對於在廣東省內已經開始結束自己勢力的地主及買辦層，卻未敢實施多少帶有斷然性的應

付方策。

反動從北方開始了攻擊。到一九二五年夏季，張作霖之子的張學良已經侵入了上海（六月十三日）。於是，奉天派與吳佩孚軍之間進行着激烈的衝突，終至交織了戰火，可是在上海集合的各反動軍，對於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所發生的大衆運動，加上強大的打擊，上海就是移轉到吳佩孚一派的孫傳芳手中之後，事態也不會變化。市內重又頒佈戒嚴令，孫傳芳槍斃了中華全國總工會的代表劉華。被軍閥的暗殺所壓迫，因民族資產階級的動搖（上海的商人們已在六月二十六日終止了罷工抗議的行動）而被削弱的上海無產階級的全面底反帝國主義底罷工，到一九二五年秋（日本人企業在九月，英國人企業在十月），就終息下來了。

國民軍在北方大敗。最初之間，國民軍在五卅案件的影響之下，獲得絕大成功，組織成了第二軍及第三軍。於是，在奉天派與馮玉祥的國民軍戰爭之中，奉天派武將之一的郭松齡——他組織了所謂「國民軍第四軍」——對奉天派豎起反旗（十二月二十二日），的結果使國民軍佔到了優勢。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郭松齡的軍隊雖已迫近奉天，但爲了日本帝國主義者協助奉天派，出兵干涉，以致他喪失了佔領奉天的可能性。十二月二十七日，郭松齡爲談判

媾和而到日本帝國主義國的司令部去，遭到了狙擊。馮玉祥在十一月二十六日佔領北京後，十二月二十四日進入天津。面臨國民軍方面強力威脅的張作霖與吳佩孚雖結成同盟，可是在這同盟之中，關於對中國的民族解放革命的協同鬭爭，卻間接地反映出帝國主義各國的不着文字的協定。當一九二六年的初期，岳維峻的國民軍在河南戰敗（在與吳佩孚結成同盟受反動底豪紳指導的「紅鎗隊」的積極底參加之下）了。大衆運動在工業中心地的衰微，郭松齡的滅亡，第二及第三國民軍的敗北，給與了馮玉祥很大的動搖。一九二六年初期，帝國主義者對國民軍的鬭爭中，成功了使張作霖軍與吳佩孚軍的結合。那結果，馮玉祥不得不在一九二六年四月，從天津及北京到萬全（張家口或喀爾甘）去。佔中國的最高指導者地位的段祺瑞從北京逃亡。張作霖及吳佩孚的軍隊在佔領北京之後，前大總統曹錕從囚禁中獲得解放，立即退職。

幾星期中並沒有政府的存在，政權掌握在「社會保安委員會」的手掌之中。到了五月，方始樹立以顏惠慶爲首的政府。這樣，帝國主義者陰謀的干涉，被實現了。關於這個，斯大林在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中，曾經發出中國的帝國主義各勢力的評價過低的警告。

同時，降服在帝國主義之前的國民黨，極右派的積極性強化起來了。一九二五年的春季，極右派已經在北方組織成重要的集團，而且，爲了重行檢討黨的根本政策與攻擊共產

黨員起見，而要求舉行國民黨第二次大會。然而，與勞工聯合全國大會及廣東省農民大會同時在廣州市舉行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大會，把這公然的右派集團——帝國主義的走狗、民族解放運動的叛徒——開除了黨籍。在這大會之中，代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層的利益，新的右派集團開始組織了起來。戴季陶是那理論的指導者，而當時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指揮官蔣介石是軍事指導者。不久之後，由右派樹立了「孫文主義學會」，那轉化成戴季陶主義的意識形態底中心。戴季陶展開了所謂中國的勞働者階級應拋棄階級鬭爭，將自己的利益「爲國民的利益」而犧牲的思想。在對外政策上，他祇承認對於英國的抵制運動，而反對對於日本的抵制運動。還有，對於共產黨，結果，所採取的立場是開除他們國民黨的黨籍，禁止共產主義者的行動。

在北方的反動的強化，及廣東省的階級鬭爭的銳化，使國民黨右派重又積極化了，於是這些右派<sup>○</sup>在北方舉行所謂西山會議，議決開除汪精衛的國民黨黨籍，將全體共產黨員從國民黨中央委員中開除，在上海重行創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這西山會議派的議決，顯然是把那銳鋒對向民族解放運動，對向蘇維埃聯邦的，而且，還想把統一的民族解放戰線，依照帝國主義及軍閥的心意，加以摧毀，但那在當時還未能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利

○ 謝持·鄒魯·傅汝霖·繆斌·黃郛等。

益相照應。戴季陶雖然列席西山會議，可是立即放棄而避開那個議決。同時，國民黨中的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者們，卻積極努力，想使民族解放運動陣營內的勢力關係，變化成對於自己有利。

這種情勢之下，蔣介石於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在廣州市進行改革，那是民族資產階級層想要彈壓革命的、初次的重大的試練。蔣介石是在國民黨第二次會議（一九二六年一月）以後，開始準備改革的。因為在這會議之中，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緊密地聯成一起，成功了革命底方針的採取。他並不經過軍事會議的贊同，便將第二師師長——國民黨左派的贊助者——罷免，召集了孫文主義學會及少壯軍人的聯席會議。蔣介石在軍隊及國民黨各組織中的地位雖然業已鞏固，而有這些準備行動，可是共產黨員及國民黨左派卻全然缺乏警戒的心意。李濟琛（蔣介石的競爭者）的軍隊為討伐軍匪鄧本殷而離開廣州市以後，便俄然強化了蔣介石的權力。三月十九日夜，蔣介石突然奪取在共產黨員指導之下<sup>○</sup>的巡洋艦「中山艦」。然後，為使共產黨員有強大勢力的陸戰隊不能獲得廣東政府及大眾組織的支持起見，佔領了黃埔的軍官學校。三月二十日早晨，對共產黨員指揮的第一四連隊發下徒手集合聽命的命令。連隊陷入他的謀術之中，那指揮官被捕了。那以後第一軍的軍隊包圍了省港罷工委員會的大廈。廣東政府的首長汪精衛躲避起來，不久便從廣

東省到外國亡命。蔣介石成爲政府及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支配者之後，要求共產黨員自第一軍及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那裏面，共產黨員佔六分之一）中退出。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五日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大會中，蔣介石提出「黨務整理案」，那要點是試想進行限制共產黨員在國民黨中的活動，並規定國民黨中央委員須經常監視共產黨員的活動。三月二十日的變革，成爲對於廣東省地主對農民協會及他們的自衛團進行攻擊的一種警鐘。在廣東省，革命底勞工協會（受總工會所統一的）和國民黨右派以分化勞動運動爲目的而指導的黃色機械工人協會之間的鬭爭，激昂起來了。

然而，民族資產階級還沒有對所謂帝國主義投降，或是朝分裂統一了的民族解放戰線的方向進行。香港的封鎖還依然在繼續中，大衆底各組織（包括罷工委員會）仍舊不會停止自己公然的活動。在廣東省，雖有民團的彈壓，但大部分由共產黨員所組織的農民協會，仍舊擁有數達八十萬人以上的農民。農民協會的分會，存在於六十個縣分中。共產黨員雖然被逐於第一軍，可是在其他的軍隊裏，他們還是堅守着一個系列的地位（以葉挺爲首的特別聯隊，在各軍隊政治部中的多數活動員等等）。不但如此，共產黨員還能利用國民革命軍各指揮官之間各種矛盾，強化人民運動，而在實際上那樣地進行。廣東省就是在「三月二十

日」以後，也依然是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的堡壘。（固然，那國民革命軍及廣東政府內部的支配權，保守在蔣介石一派的掌握之中。）無產階級者、農民、都市小資產階級及一部非買辦底民族資產階級的階級底集團的進步底實力，還沒有被洗滌完盡，於是，那在不久之後，在北伐的時期中，清楚地被表現了出來。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蔣介石稱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名目上以使國民政府權力之下所統一的中國從帝國主義的桎梏及軍國主義的壓迫中解放出來爲目的，宣告開始北伐。那以前（一九二六年一月），廣西省也已經和廣東民族解放戰線溶合了。而湖南省的一員武將唐生智（他正與吳佩孚的友將趙恆惕進行戰鬪）也加入了廣東方面。

在北伐初期，吳佩孚軍的主力（那在採取攻勢的廣東國民革命軍，是主要的敵人）佔據着北方，正追擊逃向甘肅省方面的馮玉祥軍隊。從廣東省加入北伐的，是受蔣介石直接指揮的第一軍，譚延闓的第二軍，朱培德的第三軍，程潛的第六軍，張發奎的第四師，及葉挺所率的獨立紅軍聯隊，此外是從廣西省參加的李宗仁的第七軍。在湖南省南部，唐生智的第八軍團也加入了國民革命軍。在廣東省，殘留的是與該省的地主集團有密切連繫的李濟的部隊，以及李福林的第五軍團。

七月十三日，國民革命軍佔領了湖南省的主要都市長沙。這北伐受到勞働者農民大

衆方面的支援。共產黨員及國民黨左派將大衆組織成勞工聯合會及農民協會。吳佩孚軍的後方，連續地發生農民暴動。四面都在人民的敵意之下而行動的吳佩孚軍隊，對於廣東軍當然不能表示出够上得所謂抵抗的抵抗。吳佩孚將直隸留給奉天派，把軍隊突然從北方向湖北撤退。吳佩孚爲對抗廣東派而集中的十萬軍隊，在汀泗橋一役中嚐到慘敗。於是，一九二六年九月五—七日，國民革命軍的一部佔領了漢口及咸陽，在十月十日又將武昌加以佔領。斯大林於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的共產國際中國委員會中，曾經發表過這樣的演說：「中國革命軍鬪爭的最重要原因，是中國勞働者以及農民爲着解放自己，爲什麼呢，因爲廣東軍的進軍，是打擊帝國主義，打擊在中國的帝國主義的代理人，一般上，在中國的革命底各要素，尤其是在勞働者，意味着獲得集會的自由，罷工的自由，出版的自由，組織的自由。這裏正有着中國的革命軍隊的特殊性與最重要的意義。」（關於反對派 M1—L1 一九二八年 四二八頁。）

北伐的成功，使中國的勞働者及農民大衆積極化。到處成長起勞働者的罷工鬪爭，要求提高工資，實施八小時的勞働制，擬定勞働法規。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初旬，經過漢口的日本人各企業機關的總罷工之後，各勞工聯合會使各種部類的勞働者，一舉成功了提高工資百分之二五—七五。外人各企業終於不得不承認勞工聯合會。廣汎的經濟底罷工的波

濤也在上海發生，於是，勞働者成功了把一般工資提高到百分之二〇——二五。組織勞働者的數量，也急激地增大了。在吳佩孚治下的湖北省，勞工聯合會的人數雖僅有三千乃至四千人，可是由國民軍佔領武漢（武昌·漢口·漢陽三都市的總稱）幾個月以後，（在中國共產黨在三月舉行第五次大會以前）勞工聯合會的人數已經達到四十萬人了。一九二七年二月七日，湖北省的勞工聯合大會依據生產底原則，改組勞工聯合會。在會議中，議決加入國際勞工協會。勞働運動的指導，被握在共產黨員的手中。農民的組織性，也開始同樣迅速地成長起來。由協會所組織起來的農民的數量，到一九二七年五月爲止，大約，在湖南省是五百萬，在廣東省是一百二十萬，在湖北省是一百七十萬，在河南省是一百萬人。一九二七年春季的農民運動中，依然是對於減低佃租及租稅，消滅豪紳對農民的專權、解散地主的民團、組織農民自衛隊等等的要求，佔着主位。然而，在湖南省已經開始了爲獲得土地的鬭爭。農民協會無論是鄉村中的，或是那縣委員會的，都受到中國共產黨的指導。

反帝國主義運動，重又激昂地尖銳化了。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勞働者及學生襲擊漢口的英國租界，破壞掉構築成的障礙物。

在漢口的租界，而不久之後（二月六日——七日），在九江的租界，都歸入勞働者哨兵之手。但是，因爲大衆底鬭爭的規模過於龐大，民族資產階級開始感到畏懼，而從事破壞統一了。

的民族解放戰線。

湖北及湖南兩省的大衆底勞動者農民各組織的成長，以及這些省分的武力的勢力關係，使蔣介石把自己的作戰中心地移到江西省而以奪取沿岸最重要的經濟底中心地——尤其是上海及南京爲目標了。蔣介石將自己的參謀本部，移到經過與孫傳芳軍長時戰鬪之後（十一月初旬）而加以奪取的南京去。以前廣東政府的大部分。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已被遷移到武漢去了。這兩個政治中心地之間，雖然展開了鬪爭，可是這鬪爭，反映出了民族解放運動陣營內的階級分裂以及重新編組的過程。

南昌想和帝國主義及北方軍協妥協，而且，成爲準備彈壓勞動者農民運動的資產階級層的中心地。

武漢形成了比廣東更爲左傾的階級底集團的——無產階級、農民、及都市小資產階級的——政治底中心地了。作爲那個具現，是由國民黨左派與中國共產黨聯合樹立的武漢的國民革命政府。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指摘出國民革命陣營內的分裂的不可避免性，對共產黨員指示須根據徹底的農業革命、及豫防資產階級的必然底反動的口號，有強化無產階級與農民的同盟的必要。

在被蔣介石及李濟琛所佔領的地域（江西省及廣東省）中，不絕地進行着對於勞動者

農民運動的彈壓行動。在廣東省，各縣長官藉口農民協會「係暴徒所組織」而且是「破壞秩序」的，因而想要解散這些農民協會。而蔣介石也「爲着鞏固北伐後方」，正進行大衆運動的壓制。

南方軍於一九二七年二月及三月向上海迫近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及上海總工會（那當時是和上海市商會會長虞和德及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者牛繩章所指導，由國民黨的地方底各組織互相協力的）組織了大衆底政治底罷工及武裝暴動。最初的兩次行動，雖說是依據了無產階級者比較廣泛的大衆運動的，（二月——依照英國報紙的證明——因着總工會的指令，計有二十萬人的勞動者進行罷工。）但還不會充分準備。三月的大罷工，是在二十一日十時，當白崇禧（蔣介石的參謀長）的軍隊正迅速迫近上海的情勢之中，由了總工會及共產黨的指令，同時爆發。武裝暴動勃發於午後二時，不多一會，武裝的勞動者們佔領了各軍隊所有的駐防地。北火車站地域，頑強的抵抗直繼續到第二天方才停止。因爲那地方有二千名山東兵士和白俄部隊，抵抗着勞動者。

但是，到三月二十二日，勞動者終將北火車站佔領，在白崇禧的第一及第二師開始進入上海的時候，都市已經在勞動者糾察隊的保衛之下了。然而國民黨左派及共產黨員，卻未能有效地利用人民運動的這個勝利。

由這武裝暴動所產生的上海政府是由勞働者——共產黨員的代表者、小資產階級及民族大資產階級的代表者所組織成的。可是，民族資產階級怠惰了那個活動，而準備和帝國主義妥協。

帝國主義又是帝國主義的手段，對於蔣介石及民族資產階級，加上了極強的壓力。

三月二十四日，英國及美國的軍艦在那前夜，對於被武漢軍所佔領的上海市，加以砲轟。四月十一日，也就是蔣介石改變的前夜，帝國主義各國聯合對中國發出最後通牒，對於三月二十四日在南京發生的各事件，要求中國方面負責。四月六日，張作霖軍隊對在北京的蘇聯大使館襲擊，大事搜捕。於帝國主義者要求民族資產階級投降的極強硬的壓迫的情勢之下，蔣介石雖然準備好反革命的改變，可是這正意味着關於解放運動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叛變。虞和德在上海爲蔣介石收集了二千萬元，而蔣就把那爲反革命底改革組織而加以利用。

一九二七年四月上旬，蔣介石把共產黨員與國民黨左派從自己軍隊的首腦部中開除出去。接着，他又逮捕由武漢政府所任命的軍隊內政治部中的活動份子，加以槍決。其次，

○ 當時的主持者爲中共黨員周恩來、羅亦農等。

○ 山東軍的指揮者爲畢庶澄。

他又命令第一師（師長謝持和勞動者團體有關）從上海撤退。

到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蔣介石的軍隊和由資產階級所收買的暴徒，包圍總工會解除勞動者武裝部隊的武裝。上海總工會代表，共產黨員郝慶良（？）被鎗殺了。工人糾察隊雖然失去了指導者，但依然繼續進行抵抗。（例如以大出版公司商務印書館為中心的戰鬥）。

到夜間，共產黨員雖然組織成抗議的示威運動，可是受到蔣介石軍隊的掃射。

四月十八日，蔣介石在南京組織了自己的「國民政府」。四月十五日，在廣東由李濟琛將軍進行了同樣的反革命底改變。

「蔣介石的改變，意味着從全國民底統一戰線的革命，開始轉換到多數的勞動者農民大眾的革命、農業革命。於是，後者對於帝國主義，對於豪紳及封建地主，對於軍閥及蔣介石的反革命底集團，強化而且擴大了鬭爭。」（斯大林：關於反對派 五五四頁）

而實際上，在被蔣介石·白崇禧·李濟琛等背叛者們的軍隊所佔領的地域中，對於革命底勞動者及農民，已經開始了苛酷的檢舉，然而在武漢政府的地域內，大眾底勞動者農民的各種組織，都依舊公然繼續發展，革命底運動愈加興盛起來。

蔣介石的四月改變之前，武漢政府已經進行改組了。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大會（三月十日十九日，武漢），議決對抗蔣介石的專權底傾向，為擁

護民主主義底權利而鬭爭，設置勞働部及農業部，召集各部人民會議，及提倡農村的農民自治，決定重行選舉被右派所奪取的全部國民黨委員會委員。大會最重要的議決之一，是使共產黨員參加人民政府。由中國共產黨員的中央委員會所推舉的蘇兆徵（勞工部長）及譚平山（農業部長，後來成爲叛徒），爲展開農民運動及勞働運動，爲武裝人民，爲建設共產主義者鬭爭的軍隊，並沒有利用所賦與他們的可能性。

一九二七年四月，汪精衛（汪兆銘）回到中國（他當時是國民黨的左派，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在蔣介石的行動之後，逃開廣東的），擔任武漢政府的首席。

四月十二日，在上海的改變之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依據共產黨員的主張，將蔣介石及其一派開除國民黨籍，議決採取關於對付在武漢政府的地域內的反革命者的各項政策。

然而，政府卻並沒有切實施行對於蔣介石的公開<sup>或</sup>是祕密的同道、國民黨右派、反動地主底將校及官僚，現實地從政府機關及軍隊中驅逐出去的方策。這一點上發揮出顯著的積極性的，是大衆底各組織、勞働者軍隊、農民自衛隊。

四月二十七日，武漢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對農民發表了一篇宣言，那裏面揭示出下面那樣的各條項目，作爲基本政策。

(一) 創立農村的選舉、自治。

(二) 解散民團、組織農村自衛隊。

(三) 減低佃租。

(四) 創設農民銀行。

(五) 承認接受地主土地的農民的權利。

然而，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所組織的所謂農業問題委員會，關於所謂沒收地主所有地的問題，長期間地得不到議決，於是，就是好容易決定了作「政治底」沒收（那是僅沒收對國民革命抱有敵意的大地主的土地）的時候，也不單沒有實行這個議決，甚至還不會把它發表出來。

與中國共產黨的機會主義底指導（陳獨秀·林修基（？））相反，中國共產黨員，尤其是在湖南省，組織農民，使他武裝起來。以前，對於連農民的要求減輕地租及租稅都未能辦到的，現在呢，依據根本底要求，尤其是在湖南省，有過地主所有地的沒收，農民依從佈告，集中土地，開始把地主驅逐掉。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在武漢舉行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大會中也聘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代表出席。

五月一日，在武漢舉行規模極大的人民示威運動，參加的人員計有二十萬人。當時武漢政府繼續進行北伐。那計劃——由了攻擊京漢鐵路沿線而與馮玉祥的軍隊相會合，以佔領北京。

五月三十一日，武漢政府的軍隊和馮玉祥的軍隊，爲了完成計劃，而佔領河南省的鄭州與洛陽兩地。可是，北伐軍的這個成功，也依然未曾阻止武漢的高級指揮官（基本是由地主出身的）恐懼農業革命的發展，而作急角度的右傾化。武漢政府的地域內，內部的資產階級地主底反革命抬頭了，於是到了五月，就開始轉向攻勢。

五月十日，四川省的軍閥楊森於佔領宜昌後不久，向距離武漢一〇〇——一二〇公里的地點進兵。

五月十六日，國民軍第十四師在夏斗寅指揮之下，背叛武漢政府而向楊森歸附，斷絕了武漢和長沙的連絡。夏斗寅開始壓潰農民各組織。共產黨員葉挺及賀龍依靠武漢陸軍大學生等指揮的軍隊及武漢勞働者軍隊的作戰，把夏斗寅軍隊擊退，成功了恢復和湖南的連絡。

然而國民政府不許完成殲滅反革命底暴徒，而使葉挺及賀龍停止行動。

五月二十一日，在長沙於連長許克祥的指揮之下，勃發了武漢軍的新的反革命底叛

亂，勞働者及農民各組織被摧毀了，共產黨員受到逮捕、處刑。

六月一日，南昌發生朱培德的「和平的」改革，進行了「肅清」軍隊及政府各機關中的共產黨員。

武漢國民政府對抗着襲來的反革命，而並不研究任何積極的應付方策。政府想由了讓步與限制大衆運動，來和軍人的反動部分及資產階級地主底各組織進行妥協。因着帝國主義者封鎖都市的結果，對於武漢發生的經濟底各種困難，大衆底勞働者農民運動的「無節制」，在要求斷然處置的該地資產階級及地主方面對於政府的壓迫影響之下，小資產階級底國民黨知識份子發生動搖，終至漸次地右傾化了。

共產黨指導部的陳獨秀·林修基(?)·及譚平山等，爲着斷乎展開無產階級及農民的大衆運動底軍隊建設而執拗地鬭爭，在軍隊內編成勞働者農民部隊，雖然如此，卻並不把小資產階級的動搖層吸引到自己這方面，反而被國民黨的右傾化中的上層部所吸引，限制了勞働者及農民的鬭爭。中國共產黨的中央委員及勞工協會指導部，解散了漢口的勞工糾察隊及共產少年團的各種組織。中央委員會對各農村地區發出指令，禁止農民的「無節制」，也就是禁止農民協會爲公開奪取地主所有地的農民鬭爭。

陳獨秀的共產黨指導部這種投降降底政策，使武漢的國民黨容易地獲得改革的勝利。

共產黨員退出武漢政府，他們之後對於武漢政府向資產階級土地主底反革命投降感到不滿的宋慶齡（孫逸仙未亡人）及鄧演達也從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及政府中退了出來。在武漢政府地域內，開始了對共產黨員苛刻的追究，以及對革命底勞動者農民各種組織的壓迫。

當時，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對張作霖將軍的「安國軍」發動了討伐軍。

南京軍一侵入山東，日本帝國主義爲着擁護北方軍閥的利益，公然進行干涉，於五月三十一日向青島進兵。對於日本的干涉的報復手段，開始了對日本商品的抵制運動。孫傳芳反攻的結果，到一九二七年八月，重又迫近了南京（佔領浦口）。

八月十二日，蔣介石辭去委員長職位。反革命底國民黨分裂後形成的各集團，到一九二七年末，甚至連形式底統一都不能達到。

一九二七年秋季最重要的各事件，雖是湖南省的勞動者及農民的大衆底騷擾（一九二七年九月及十月），葉挺及賀龍部隊的廣東省的騷擾及遠征，可是這些都是以農業革命爲目的的共產黨斷然趨向鬪爭的轉換，對於國民黨的反革命轉向到武力鬪爭，也就是中國共產黨證明在歷史底八月會議之後，所實現的轉換。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共產黨員指導之下在南昌成立的軍隊，經過多次的戰鬥，通過

江西全省，在九月二十四日佔領汕頭。然而爲着兵力不足與遠征組織上有許多缺陷的結果，（最主要的缺陷是企圖心的不足，沒有充分把農民導向徹底的農業革命的強韌性）。一九二七年十月，葉挺及賀龍部隊在汕頭近郊戰敗了。

這時期的最大事件，是廣東公社（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十四日）廣東省各縣的農民騷擾，軍閥相互間內部底鬪爭的尖銳化，與從廣東驅逐李濟的張發奎的改變有關的國家權力機構的微弱化，以及廣州市的勞働者運動的昂揚等，賦與了發生騷擾與佔領廣州市的可能性。（除去若干重要的戰略地點——東山及其他的軍械庫與軍需工廠等等）這騷擾的進行之中，組織成了以蘇兆徵及張太雷（他們在爲樹立廣東蘇維埃的鬥爭中，都英勇地犧牲了）爲首領的最早的廣東蘇維埃政府。頒佈了關於八小時勞働制、沒收地主所有地及將那無條件讓與農民、紅軍的組織等等，首次草創的命令。廣東公社成立後的第三天，便被受到帝國主義者們支持的軍閥所統一的軍隊所擊滅了。而且那反革命底軍人對大衆所施的窮追的慘酷，甚至可與被提埃爾、軍彈壓巴黎公社時的、極無廉恥的各種事實，互相比較。

當鎮壓廣東的騷擾之際，兇暴化了的軍人對在廣東的蘇聯領事館進行襲擊，殺死五個館員。固然蘇聯的活動家在廣東的騷擾中全然不會參與其事，爲全世界所公認的事實，但是，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南京政府卻和蘇維埃聯邦斷絕了國交。

廣東暴動的指導者犯着極重大的錯誤。那其中最重要的是：對民衆及敵軍內部的準備工作並不充分，對勞働者——機械工人的黃色工人聯合會員——的錯誤的戰術，在廣州市缺乏作爲暴動及權力機關而選舉的蘇維埃會議等等。

然而，廣東暴動固然有這些錯誤，固然它曾經在「退卻中作革命的後衛戰鬪」也仍然是「無產階級試行組織中國蘇維埃政權的英雄的企圖」，是「爲勞働者——農民革命盡過鉅大的任務」的運動。

① 提挨爾 (Louis Adolphe Thiers 1797—1877) 法國政治家、史家。曾爲律師及新聞記者。七月革命後，迎立路易·菲力普而組織內閣。二月革命後辭職，被拿破侖三世所追放，但當帝政沒落後，復組織臨時政府，與德媾和，鎮定巴黎公社的暴動，一八七一年任新共和國的大總統。後遭帝政派的反對而辭退。

② 巴黎公社 (La Commune de Paris) 普法戰爭結果，法國敗北，遂廢拿破侖三世，採用共和制。在這內亂時，巴黎市民曾武裝保護共和制，但到一八七一年因政府欲解除武裝，民衆即於三月十八日蜂起驅逐王軍，組織巴黎公社而且至同年五月止支配了巴黎。指導者中有第一國際的人士參加，以完全的自由、平等口號，訴之全國，但終被王軍所敗，民衆犧牲者達三萬人以上。這是社會主義運動史上有名的無產階級爭取政權事件。現在蘇聯將三月十八日作爲國家的紀念日。

## 文 獻

斯大林：列寧主義的問題 第十版，莫斯科 一九三五年。

同：關於反對派——「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 與孫逸仙大學學生的談話」 莫斯科·列寧格勒 一九二八年。

同：中國革命問題 爲宣傳家而作的小論 一九三二年。

同：關於中國（關於反對派） 莫斯科·列寧格勒 一九二八年 六一—六三六頁。

同：關於中國（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 中央委員會及中央執行委員會聯合大會中他的演說

——蘇維埃聯邦之國際地位與國防） 論文集：馬克斯主義與民族殖民問題 莫斯科 一九三四年。

同：關於中國革命的瞻望（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IKKI 中國委員會中的演說）莫斯科·列寧格勒 一九二七年。

同：關東方民族大學的政治任務（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八日 KUFV 學生集會中的演說）莫斯科·列寧格勒 一九三五年。

同：覆馬爾丘林同志的信 論文集：中國革命的問題·莫斯科 列寧格勒 一九二七年。

同：中國革命與共產國際的任務（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IKKI 等第一屆集會中的演說）

- 莫斯科 一九二八年。共產國際與聯共(布)與中國革命 根本的議決 莫斯科·列寧格勒  
一九二七年。[KK]關於中國革命的現階段的議決 莫斯科 一九二七年。共產國際執行委  
員會第十次大會的議決(一九二八年二月九日—二十五日) 莫斯科·列寧格勒一九二八年。  
A·V·巴克林：關於中國革命的武漢時代摘錄 莫斯科·列寧格勒 一九三〇年。黨學校教程  
參考書：共產國際的歷史 第三版 中國革命 E·育爾克編 莫斯科 一九三一年。  
A·羅左夫斯基：中國的革命與反革命 莫斯科 列寧格勒 一九二七年。雜誌「布爾什維克」  
「共產國際」及其他中所載各論文。



## 六一九二八—三五年的中國

南京政府的樹立與一九三一年九月滿洲事變前的該政府底國內政策。蔣介石的轉變及武漢的國民黨背叛之後，國民黨轉化作反動底資產階級——地主底集團的組織，分裂成許多互相敵視的集團了，那些反動集團之中佔據支配底地位的是軍閥。在徐州大敗北（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三日）的結果，因為蔣介石的勢力業已衰弱，以致廣西省的軍閥（李宗仁及白崇禧）成爲南京——上海地方的主人公了。八月十二日，蔣介石辭去委員長的職位到日本去。這樣，四月十八日，在南京組織的政府（張靜江·蔡元培·李石曾·西山派），事實上已不存在。八月，孫傳芳佔領浦口的威脅，促使廣西方面和武漢方面（唐生智·汪精衛·譚延闓·孫科等）的妥協。武漢方面主張承認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權威，以及召集大會，武漢方面指導者中參加南京方面的一部分（譚延闓·孫科），實行和南京方面在南京組織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專門委員會」（九月十五日）的議決。在設置的該委員會中掌握實權的，是和廣西派有密切連繫的西山派。

九月，「專門委員會」在南京樹立了（第二的）政府，可是，那並不會獲得武漢方面的

承認。由着該委員會的命令，基本上是由廣西派所編成的南京方面的軍隊，對武漢的唐生智將軍開始攻擊，於是，到十一月半，已經把武漢佔領下來了。

但是，與那同時，汪精衛在張發奎的支持之下，獲得廣東的政權，壓迫廣西派的李濟將軍。所謂互相敵視的各黨派間已無妥協餘地的事實，促使蔣介石回國，一九二八年一月初旬，使他有坐上南京政府的代表者及委員長的椅子的可能。形式上，汪精衛關於召集舉行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大會的提議，是成爲妥協的根據的。然而，廣東暴動（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十四日）以後，汪精衛在廣東也被奪去支柱，到外國亡命去了。

從一九二七年末到一九二九年中期，國民黨反革命陣營內的狀態，是由廣西派及蔣介石派的兩大黨派間的鬭爭，而被決定的。

一九二八年四月，南京重又開始北伐，於是在六月間，佔領了天津。六月四日，張作霖從北京回到奉天的歸途中，列車在奉天附近遇到爆炸，張作霖及黑龍江省總督吳俊陞炸死了。新聞的報道說：是不滿於張作霖的日本爪牙的行爲。張作霖死後，以他兒子張學良爲首腦的一派，在奉天派中佔支配的地位，主張和國民黨妥協。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奉天派承認了南京政府。

中國反革命的一時底勝利，伴同着所有生活領域中的反動，以及在極野蠻形態中的

規模空前的白色恐怖。（在一九二八年的一年之間，從革命底勞動者、農民及知識份子之中，出現了幾萬個人的犧牲者。）

革命的各要素都從國民黨退出或是遭受驅逐，代替的是反動底資產階級及地主混進到那裏面，這樣，到了一九二八年末期，舊軍閥的大部分都加入了國民黨了。在一九二五——二七年時期中被實施的減低地租百分之二五，往往輕視國民黨內下層組織的抗議而被廢棄。革命底勞動者組織的壓迫，伴同着對於革命時期中勞動者的經濟底獲得物的攻擊。國民黨在這當兒，利用了自己所包辦的「似是而非的勞動者」的各種組織。

一九二八——三〇年的時期裏，南京政府及國民黨發出許多改良的佈告（一九三〇年的農業法、財政改革、軍隊的改編與縮少、國民教育的改良、民法的修正等等）。

但是，這些方策，大部分都沒有加以實現而告終了。實施土地法的方策，雖是僅在一省（浙江省）之中得見進行，但這也仍然遭到地主的反對，而變成若有若無的了。軍隊的兵額及軍費，也依然不絕膨脹。

在南京政府的領土之內（實際上是五省）釐金雖被廢除，然而，代替的卻是更爲沉重的「消費稅」。

南京政府爲着填補增大的軍費，便與加重租稅同時，一方面，廣泛地利用發行國內公

債，可是那總額，到一九三二年初期，已經超過了十億銀圓，對銀行賦與高利貸的利率，致使中國商工業的地位爲之低落。

所謂南京政府連民族發展的初步任務都沒有解決能力的情形，是被表現在軍閥間鬭爭達到極大規模的一點上的。在揚子江中游·廣東省·及廣西省鞏固了地步的廣西派，和支配南京政府而以揚子江下游及上海·浙江爲背景的蔣介石一派之間的競爭，終於引起了戰爭（一九二九年四月—七月），於是，以廣西派的敗北而宣告終結。

同年，馮玉祥（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一月）·唐生智（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張發奎（一九二九年九月—一九三〇年一月），對於南京政府，興起了武力行動。其中尤其是張發奎的，從一九二八年以來，是依靠國民黨反對派的改組派，而獲得強化的。

一九三〇年四月—九日，進行着犧牲與參加者數量最大的軍閥間——馮玉祥·閻錫山及與他們同盟的改組派底北方連衡之對於蔣介石——的戰爭。這戰爭的經過，由於奉天派干涉結果，南京方面得到有利地解決。因爲奉天派參加蔣介石方面，在一九三〇年佔領了北京及天津地方。

南京與廣東的鬭爭（一九三一年）·實施新關稅率（一九二九年二月一日）以來頓形增大的關稅收入，與上海各銀行的密切連繫，發行國內公債等等，使蔣介石可能實行依照德

國教官所授與的方策，編成一聯新的師團，使自己軍隊的裝備爲之一新。軍事上及財政上的實權，實際上，是被集中在蔣介石以及不單與他有政治底連繫，而且在姻親底連結上也關係的宋子文（財政部長）和孔祥熙（實業部長）底掌握之中了。

北方的連衡敗北以後，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大會議決：在一九三一年五月五日召開國民會議，以及草擬臨時憲法。

這些方策，正使持有敵意的各集團對於南京，難以利用民主主義底及立憲底口號，同時，也將強化蔣介石的個人的地位作爲自己的任務。這個關於憲法的問題，正是造成一九二八年以來就結成同盟的蔣介石與胡漢民在一九三一年五月的分裂，以及扣留胡漢民的機緣。

國民會議在南京召集（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七日）了。該會議的工作，事實上雖是在於採擇臨時憲法案，可是那權力，卻集中在在政府代表者的掌握之中（議長及首長的任命權，宣戰及簽訂條約的權限）。

成爲對抗南京的新的行動的中心的，是廣東。

在一九三一年初頭，廣東省的實權，被集中在廣東師長之一的陳濟棠底手裏。

一九三一年春，他和廣西省各將軍之間簽結協定，那以後，這兩省就宣言不承認南京

政府。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四日—十五日，在廣東的從屬於蔣介石的黃埔軍官學校被解除了武裝。

同五月，在廣東包括汪精衛的改組派代表、和中央執行委員會中與胡漢民接近的一派——那中間，也有拋棄了蔣介石的孫科及陳友仁——舉行了會議。

五月二十九日，在廣東的第二個「國民政府」宣告成立。

廣東連衡和北方各將軍取得連絡。由了這個關聯，在七月的下半，馮玉祥底一個部將石友三試行過天津的奪取行動。廣東政府佔外交部長地位的陳友仁和日本政治家，夏期在東京進行交涉。

七月二十一日，廣東重又宣告討伐蔣介石。八月初旬，廣西軍越過湖南的境界。

南京與廣東的鬭爭，根本上是軍閥鬭爭的新的局面。在這鬭爭中，日本想利用廣東方面站在南京政府背後的美國對抗英國利用這個鬭爭，以強化在南京以及中國西南的自己的地位作為自己的任務。但是，對於南京方面之主要和上海大銀行資產階級及商工業資產階級的連繫，反映出了廣東方面小及中地主、都市的中資產階級及一部小資產階級對於這些集團底政策的不滿。

廣東派廣大的利用煽動式底約言及要求，（民主主義底改良，民族底對外政策）於是，那作

爲對於南京政府在上海發表的勞工組織法的行動，而在各勞働者組織之間，獲得顯著的影響。

廣東方面的行動在新的革命底高漲的各條件之下進行，而且，不外是想把革命底運動從國民黨內部的黨派鬭爭中分離出來。

**新的革命底發揚** 從一九二七年末到一九二八年，在好幾個省分中的農民運動，達到極大的規模（一九二八年，甘肅省及寧夏省，興起了回教徒的大騷亂）。可是革命運動的敗北，與此相伴同的革命底大衆底各組織的潰滅、勞働者及農民前衛的一大部分的肉體底勦滅，使這時期的革命運動，成爲沉滯的時期。

然而，中國共產黨使自己的組織適應新的條件，爲使自己布爾什維克化，爲使獲得大衆及組織化，終於完成了成功的鬭爭。在一九二九年，國民黨反動的政策，已經促使經濟情勢惡化，國內的階級底各種矛盾尖銳化，這樣，便爲革命底鬭爭的成長形成了地盤。

一九三一年，中國的經濟底崩潰，因了世界底經濟恐慌的影響與一九三一年的洪水，而格外深刻起來。然而，這洪水之有未曾有的規模與破壞力，實在是在於各軍閥進行掠奪底經濟的結果。工業崩潰的結果，在一九三〇年的整整一年，使土著的棉工業將幾十萬錠之多移到日本資本的手中。農民的生活狀態急遽地惡劣化了。資產階級及國民黨對勞働

者階級開始攻擊，這樣，從一九二九—三〇年之間，新的革命開始高昂起來。

勞働者運動的成長，是在一九二八年末起已經開始了的。勞働者階級的鬭爭愈加頑強起來，而在那水準上，帶上高度的性質。國民黨憑藉在反動精神下經過加工的孫文主義的意識形態，試想在自己的影響之下保有小資產階級底知識份子的大衆，可是那並沒有多大的效果。在知識份子之間，現在，馬克斯主義的勢力正在不絕成長。

在一九二七年終了，中華蘇維埃的最初的槓桿（廣東省海陸豐地方）以及紅軍的最初的部隊已經產生了。到一九三〇年末，已經可以數出擁有六萬二千紅軍的十九個蘇維埃地域。到一九三一年末爲止，紅軍擊破國民黨對蘇維埃地域的連接三次的攻擊，兵員是十四萬五千人。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舉行了當時已經包括三百個縣分的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大會。大會中選出臨時蘇維埃政府，併且採取了憲法法案、土地法，以及其他許多極重要的議決。

一九三一年九月滿洲事變以前的國民政府對外政策 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使在中國帝國的支配發生動搖。正因爲如此，一九二七年以降，帝國主義各國想在祇要不抵觸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根本底地位的程度，上，由於作些少的讓步，使南京政府的

地位穩固，而援助該政府彈壓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

南京政府與美國（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及英國（一九二八年八月九日）之間，完成關於消除南京事件（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的協定，同時，先由美國及英國而至其他資本主義各國，承認南京政府的地位。

一九二八—三〇年，南京政府簽訂一聯的新的條約，以代替舊的條約。那些條約之中的某些，對南京政府賦與重行檢討關稅率的權利。英國與中國之間，雖然簽訂了關於返還威海衛（一九三〇年四月十八日）、浙江的租界（一九二九年十月三十日）及廈門的租界（一九三〇年九月十七日）的協定，但同樣的關於天津的比利時租界（一九二九年九月三十一日）也曾簽立協定。因為在實質上，所簽訂的都是些並無重要意義的各地的租界而已。

英國雖然保留了以威海衛作為海軍根據地使用的權利，可是，威海衛之在於英國所有的意義，就是在以前也僅此而已。中國工業主要競爭者的日本對於承認所謂關稅自主（一九三〇年五月六日），都附加了訂定減低自己輸入品稅率的條件。南京政府雖在一九三〇年一月一日宣告撤廢治外法權，可是，卻並沒有把這加以實際施行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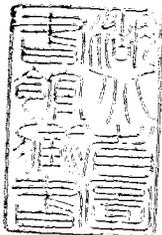
一九二八年四月，當南京軍向北方進軍的時期中，日本以自己的軍隊佔領了山東省，五月三日，勃發了所謂「濟南慘案」。——那到了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八日方始獲得解

決，那以後，日本便將自己的軍隊從山東撤退。

所謂南京政府依存於帝國主義，以及這時期對蘇聯抱有敵意的情形，顯現在冒險奪取中東鐵路以及其他，與一九二九年夏季在滿洲發生的反蘇底挑戰行為中。蘇聯的權利，依照哈巴羅甫斯克協定①而獲得恢復。

南京政府為獲得帝國主義各國，主要是美國及英國的支持而執行的該政府的對外政策，與中國資產階級的錯覺相反，不但不能削弱中國對於帝國主義的依存，甚至反而愈加增強起來了。

### V·克丘莫夫



① 哈巴羅甫斯克 (Khabarovsk) 為地名，在西伯利亞東部，當黑龍江與烏蘇里江之會流點，與海參崴間有鐵路可通。本名伯利屬吉林省，清割烏蘇里江以東為俄領，而改俄名，今屬蘇聯地方，一九三〇年，中蘇曾於此開會，解決中東鐵路問題。

## 譯後記

要把中國悠長而浩繁的四千年歷史，在十萬字的小冊子中，運用唯物史觀的觀點，加以相當具體扼要的敘述，嚴正而又正確地把握住每一時期的社會底發展的根本法則，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這部唯物史觀中國史，依照譯者的淺見，正是符合了這個條件的。本書原是蘇聯大百科全書第三十二卷（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版）收載的『中國』部門中關於「歷史」一項的全譯。正因為是把中國歷史作為百科全書的一部而寫作的，所以與其他單行本的中國史史書相比，就顯出了資料充沛而分析清晰、概括的優點。這不但對於讀者能獲得幫助，就是對於我們的史家們，也是有着可以借鏡之處的。

本書的執筆者：「古代」（第一章）部分是格魯綏，「中世」以降至一九一〇—三四年（第二—四章）為止的，是P·格利耐維契，那以後的（第五·六章）是V·克丘莫夫。

譯者所依據的是日本東京白揚社出版，大橋哲哉所譯的日譯本。其中有涉及日本帝國主義者對中國侵略行爲的地方，是受到刪除或是打「×」了的，可是那已由莫君爲我依

照原文補正了。此外，日譯本雖說是全譯，但在第六章的末後（正如可從目次中看到的那樣應該是到一九三五年爲止的），還是有將近十頁光景的刪除，因爲那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暴行愈行加緊，而中國的人民運動力量愈行強大的時期，這種記錄要在日本出版，當然是不可能的了。本來莫君允許爲我補足，可是他在兩年前爲着避免反動者的殘害，而匆促地避到歐洲去，以致沒有實行，所以這個譯本也還是殘缺的，譯者希望能在第二版中補足，得能完全。雖然這一點，在現在也可以由聯共（布）中央審定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對日本帝國主義者嚴明的指摘而暫時地滿足的：

「一九三二年，從日本方面加強了戰爭威脅。日本帝國主義者眼看歐洲列強和美國因經濟危機發生而完全忙於內部事務，於是決定乘機來逼迫防衛能力薄弱的中國，企圖把它征服，而成爲那裏的主宰。日本帝國主義者並沒有向中國宣戰，卻狡詐地利用他們親自造成的『地方事件』，像行竊似地把自己的軍隊開進滿洲，日本軍隊把滿洲全部佔領，以便準備方便陣地去侵佔中國北部和進犯蘇聯……」（三七〇頁。一九四八年，莫斯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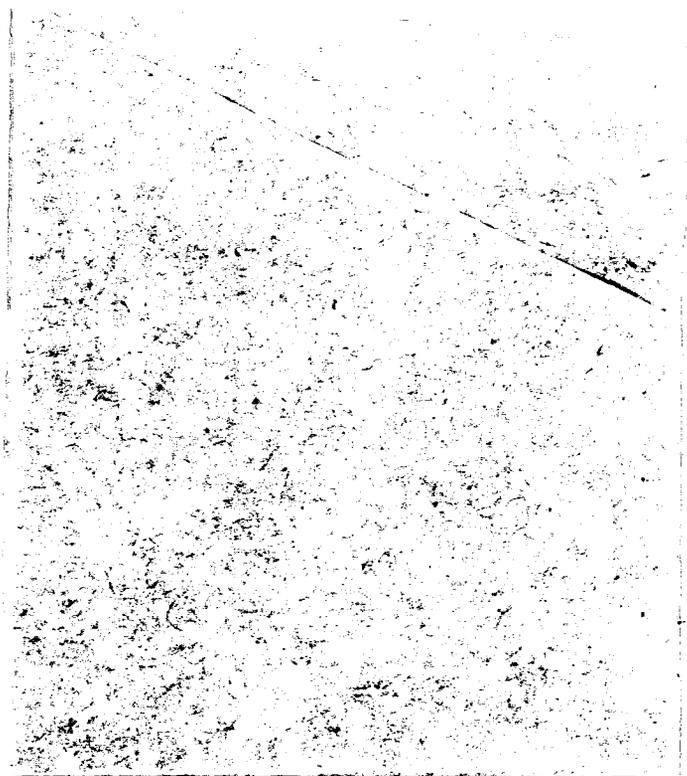
由於譯者不是專攻歷史的，所以對於人名、地名（尤其是中古時代的西域各國名稱以及蒙古人名等）的音譯，曾經參攷過許多各該時期的史書而寫定的，對於少數未能確定的，仍用音譯寫出，而在下面打上（？）號。而文中所引據的各種著作的文句，都不及一

一和原文對照，容或有錯。以上種種，誠心希望熱心的讀者指正，俾在第二版中改正，得臻完善。還有，原書中沒有註釋，現在頁邊所註的，都是譯者在供讀者參攷的意圖之下附加上去的。

末了，譯者衷心希望本書，對於讀者在正確地分析中國歷史的觀點上，會有所幫助！

費明君 一九四九、七、二三。

**007052**



蘇聯愛國戰爭……茅盾二·五〇	短篇小說譯叢……茅盾二·五〇	文憑……茅盾二·一〇	世紀的孩子……朱維基一·九五	浪花……范泉一·六五
----------------	----------------	------------	----------------	------------

紅樓夢……吳天二·九〇	姊妹花……顧仲彝一·八〇	朝辭風景……范泉一·八五	廬園集……孔另境一·九〇
-------------	--------------	--------------	--------------

永祥印書館  
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八月初版

唯物史觀中國史

——蘇聯大百科全書版——

譯者：費明君

發行人：陳安鎮

印刷者：永祥印書館第一廠

上海陝西南路二三八號  
電話：七二七九八

發行者：永祥印書館

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  
電話：九二二一三

